



加拿大(柯)让参

周恩来的 外交



Voice Of Marxism-Leninism
Group Of EBOOK

制作

〔加拿大〕柯比著

汪永红译

周恩来的 外交

東方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四月，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日内瓦机场迎接周恩来。



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第一屆万隆会议。



一九六五年周恩来在非洲之行中抵达坦桑尼亚，尼雷尔总统在机场迎接周恩来。



一九七一年七月，周恩来在北京会见基辛格。



中译本序言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国务活动家和举世闻名的外交家。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和国务院总理，他在新中国的对外政策方面，不仅是这一政策的制订者和奠基人之一，而且是这一政策的直接实践者。在几十年革命生涯中，他以他那令世人倾倒的绝世才华和完美的策略活跃于中国和世界外交舞台上，为加强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好、为反帝反霸事业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周恩来独特的外交风格和外交思想不仅一改旧中国外交上的屈辱形象，而且给世界外交界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他的外交思想和主张——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已成为当今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石。

由于周恩来在中共党史与中国现代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海内外从事周恩来研究的爱好者与专业人员日益增多。国外对周恩来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30年代中期，当时随着国共两党开始共同抗日，国共谈判中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和传奇人物周恩来引起了外国人的关注。随后周恩来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与西方记者及驻华外交官员过往甚密，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扩大中国革命的影响。因此，外国使馆人员写有许多回忆录，忆及周恩来此间

的外事活动。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引起了西方世界的震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重视研究中国问题，它们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同时，对周恩来研究也予以重视。

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国外掀起了周恩来研究的热潮，而且至今方兴未艾。

周恩来历任中国总理长达26年（兼外交部长8年），他不仅提出和执行了一系列正确的外交政策和方针，而且他品德高尚，为人谦和。在广泛的国务活动中和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上，他崇高的思想和品格给各国首脑和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成为外国领导人回忆录中津津乐道的人物。这些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作为外交家的周恩来的生动材料。印度尼西亚前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政治回忆录《我的历程》专列三章回忆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外交斗争。他称赞周是“伟大的外交家”与国务活动家。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回忆录和基辛格的《白宫岁月》以及美国现任总统布什回忆录《瞻望未来》，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和周恩来的谈判艺术均有不少论述。尼克松在《领导者》一书中将周恩来作为世界著名领袖专章评述，对周恩来评价甚高。他对周恩来的品行有一个总的评价，他说：“周是一个共产主义革命家和具有儒家风度的人物。……共产主义信仰使他能忍受政治上的挫折与生活上的艰辛；儒家风度的个人品德使他能在外交折冲中出类拔萃，并成为中国的敬爱的领袖；现实主义的机敏，使他能够准确估计内政外交之后的各种力量，……调解人的策略与礼貌使他在激烈分

于分裂国家时能保持国家统一。”*

海外学者盛赞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杰出功绩。海伦·斯诺在其著作《旅华岁月》中高度评价周的外交成就：“周恩来是天生的外交家，他毕生的事业就是如此，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他的基点在于联络，在于寻找共同基础与连结的纽带。”新中国成立后在国际舞台上取得的伟大成就都与周恩来分不开，他以丰富的经验策划中国的外交路线。谈到周恩来的外交生涯的起点，海外学者大致认为始于西安事变。此后10年中，周一直是中共对外的主要发言人。他在国统区与知识分子交往时彬彬有礼的风度以及与西方外交官的经常晤会，大大提高了他本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周恩来在他的一生中，无论是在国共折冲还是在建国后对外国的交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斗争艺术，使得那些反对共产党的人也敬佩他的人格与外交才能。他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人民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地位，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外交风格。《周恩来传》的作者迪克·威尔逊认为中国外交的胜利，是周恩来个人外交才能的成功。

《周恩来的外交》奉献给读者的就是周恩来一生中、也是世界外交史上最为重要的一章——周恩来的外交生涯。

本书作者柯让(Ronald C. Keith)是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多年从事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经过数年的潜心研究推出的这本《周恩来的外交》是系统地介绍周恩来外交思想及其风格的专著，是当今国

* 尼克松《领导者》，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59—260页。

外研究周恩来的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作者综观周恩来的整个一生，认为周的外交思想和风格的形成可追溯到他年轻时留学欧洲期间对当时国际局势及中国和远东事务的关注；他的战时重庆生涯促成并磨砺了他的外交风格和才华，也奠定了他的外交思想基础，尤其是他的“统一战线”思想；建国后的直接外交实践更使他的外交才智大放光彩并达到了炉火纯青。

作者认为，周的外交思想无疑是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但他同时还受到中国传统思想和古典战略的影响，并且他对源于欧洲的西方传统和现代国际政治理论也无师自通。“周的外交形成于盘根错节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之中”，而他坚定的政治信仰并没有影响他外交的理性实践，“他是一位为了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外交家，然而，他却被举世公认为一位完美的外交巨擘。”作者认为周恩来的外交实践，包括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非凡的调解才能，更多地反映了他的“现实主义”和“实事求是”精神，而不是他的对手和一些西方观察家所认为的“实用主义”。他的外交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而巧妙的结合，他的“现实主义”是从统战政治实践经验中形成的严谨而独特的思想体系。正是周恩来的“现实主义”外交才有尼克松的“北京之行”，也正是这种“现实主义”精神才使得周对国际政治作出了准确的分析。早在70年代初他就“高瞻远瞩地洞察到了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和中国国际政治联盟的延伸，为当今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作者极为推崇周的“统一战线”、“独立自主”和“和平共处”外交方针，认为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早期中苏关系、中

印关系、中美关系等是这些外交方针的突出实践。作者着力描述了周恩来的外交风格,对此就连他的对手也不得不为之折服。

此书现由从事中国外交和国际问题研究的汪永红同志全文译出并由东方出版社印行,这对于我们研究周恩来和中国外交及其有关学科是一项有意义的贡献。

当然,由于研究角度、掌握和选择材料、特别是指导思想体系的不同,作者有些观点以及他对史实的理解,是可以商榷的。在资料引用上,作者部分依据了西方的一些不确切材料,有的甚至援引了“文革”期间一些无可靠根据的红卫兵小报材料,这是不妥的。因此在出版中译本时,在个别地方略去未译。

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

林代昭

目 录

序论	革命事业中的“理性外交”	(1)
一	革命中成长的外交家 (1919—1949年)	(14)
二	冷战时代外交部的建立	(36)
三	“和平共处”与日内瓦——万隆会议	(70)
四	“和平共处”与中苏分裂	(107)
五	周恩来、尼赫鲁和“亚非团结”	(143)
六	文革中的“革命外交路线”	(183)
七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战略与 现实主义	(219)
八	周恩来的遗产:走向“独立自主 的外交政策”	(253)
	作者鸣谢	(281)
	译后记	(282)

序论 革命事业中的“理性外交”

外交活动一向被看作是欧洲外交界的事；然而，在中国革命纷纭的时代却脱颖而出出了本世纪最伟大的外交家——周恩来。周恩来外交显然是诞生于中国特殊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之中的，但其与生俱来就呈现出重要的国际意义。还在留欧求学期间，周就很有意识地注意当时欧洲的外交活动；成年时，作为总理和外交部长，他在欧洲的国家制度向非洲和亚洲地区扩展的新的国际形势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周恩来看来，欧洲外交语言和原则中有价值的仅仅在于主张在国与国之间关系中信奉民族自决、互惠和平等这几点而已。作为一位投身革命的革命家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他对欧洲外交中所采用的国际等级秩序原则常常深表不满，尤其当这些原则增强了殖民地的不平等和依附性时。他充分理解实力，但他极为感兴趣的却在于为贯彻原则而对实力的运用上。

周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显然是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不言而喻。但是，周对中国革命经验的理解会不会妨碍他的外交的“理性”实践呢？回答是，周恩来是一位为了革命事业而奋斗的外交家，然而，他却被举世公认为一位完美的外交巨擘。

周担任过新中国第一任外交部长(1949年—1958年2月),并担任国务院总理(从1949年直到他1976年1月8日逝世)。他在从事外交活动、制定和执行对外政策的过程中发挥并产生了巨大的建筑师般的作用和影响。由于他的领导,中国形成并发展了自己独特的“人民外交”和对外援助战略。周的“理性”外交即使在看来难以对付的冷战环境中也使得中国突破了美国的对华遏制。他卓越的灵敏性和政治上的弹性在后来野蛮的文化大革命环境中得到了考验,其非凡的忍耐力被证明确实是超群绝伦的。早在70年代初期,周就高瞻远瞩地洞察到了国际政治格局的转变和中国国际政治联盟的延伸,并且为当今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基础。

因此,周恩来的外交经历无疑是当代外交史上最为迷人的一章。不过,对周恩来整个一生进行学术上的研究既艰难又富有争论。除了少数例外,中国方面对他的评论也不得不越过悼词中仅对他作出的“将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的评价,而开始分析他的外交原则和实践。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特别是那些在传记中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个人崇拜”的因素,都束缚了中国对周的研究。

西方有不少周的传记,但这些传记常常将周的外交和对外政策加以一般地基本心理因素分析,并以此来解释他的错综复杂的政治个性。约翰·鲁兹在他的传记中提到,在冷战期间,西方新闻界对像周恩来这样的“神秘人物”着了迷,描述他的用词应有尽有:一位“舌剑唇枪的绅士”、“富有弹性的布尔什维克”、“橡皮共产主义者”、“中国的斯芬克斯”等等。

甚至在他去世期间,周恩来之谜仍引起了一些观察家们

的好奇，这些观察家们试图通过对周的性格进行心理分析，以获得对他的“实用主义”思想的解释。在最新的一本关于周恩来的传记中，迪克·威尔逊从周的感情和动机的难以捉摸的复杂性中对周的“理想主义和求实精神的奇妙融合”作出了分析。威尔逊得出了有趣的结论：周是“入乡随俗”，对不同的文明产生不同的印象。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从周的性格和举止中很容易看出他们自己所珍视的价值也在周那里得到了确认，这个事实突出表明了周作为外交家的非常成功之处。

周在原则发生冲突的困难场合中达致调和的能力可能与儒家的“中庸”传统有关。他的一些国外崇拜者们，尤其法国人，评论他的风度时将他看成是儒家君子的现代榜样。早在50年代，尼赫鲁就确信，古代中国悠久的文明传统最终将在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中体现出来。就连曾和周一起从事外交工作如今仍健在的人，也无不强调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周的外交战略方针之间是有联系的。

当然，周恩来对过去儒家的看法是复杂的。40年代早期，他曾斥责过蒋介石虚伪的“诚”，并且把蒋介石的“中庸之道”看作是一个完全浸透着“浓厚的传统的剥削阶级意识”的言不由衷的典型。然而，在1949年4月同“民主人士”的谈话中，他承认中国共产党的“自我分析传统”需要对过去儒家的有积极意义的特性进行研究。儒家所宣称的精英主义与党的群众路线是相冲突的，但是就连当今中国共产党的分析也表示，儒教对现代中国的政治领导和外交是有影响的。

例如，传说中的贤王舜乐于不耻下问，并乐于对自己所得到的不一致观点进行研究，以把握住两个不同的极端，以便在

制定政治政策中取其“中庸”。“中庸之道”信奉“和睦相处”，这显然与中国的现代外交有关联。不过，这种“中庸”观点与党的辩证法观点却是有矛盾的，党的辩证法观点认为所有政治现象中的对立面既有统一，又有冲突，这就排除了在复杂的政治现实中对原则进行灵活运用的哲学基础。这种灵活性以其在研究“客观”现实的过程中采用“实事求是”的方法而不同于“庸俗进化论”的观点。

一个更为实际的争论是周恩来在其对外政策中有没有采用过“实用主义”的实力均衡原理。基辛格相信周恩来对欧洲经典的实力均衡理论有一种直觉的理解。有些观察家将这种现代的实力均衡理论追根溯源到中国古典战略实践上。中国的传统思想和战略在周的外交发展过程中的影响不可忽视，但是对目前中国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得出的观点也不可不考虑。后者将周恩来“外交风格”中的“实际性”看成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性”。邓小平在1976年1月15日所作的悼词中说，周恩来“在国际事务中，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对这一点并不存在什么争议。

将周恩来作为一位中国人来进行性格研究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基点，但周恩来“外交”形成于盘根错节的中国现代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结合之中。如果说周在国际事务上的确是个“现实主义”的话，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是个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对他的外交进行全面解释应将其具有的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范畴这方面包括进去。诸如“工作作风”、“方针政策”这类概念，在周关于领导原则和相关

政策，以及对现实的观察和国内国际问题解决所采用的方法等思想的总的发展过程中是清晰明了的。解释这些特殊概念，需要仔细探讨一下中国的外交同中国共产主义一般政治原则及其实践之间的关系。

“工作作风”的概念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它典型地包括严格的自我约束标准、对“客观”政治现实要善于随机应变、在以“实事求是”的认识论为基础进行的政策制定和个人进行调查的过程中进行集体和民主协商。群众路线的“标志”就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在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

方针和政策，这两个词相互联系得十分紧密，以致于在日常用语中它们可以交替使用。这两个词在英语中被译为“政策指南”（Policy Guideline）。弗兰茨·舒尔曼主张将政策译为“特定政策”（Specific Policy），而将方针译为“总政策”（General Policy）。《辞海》也许更明确地区别了这两个词，它将方针解释为领导确定的理论构想，与“指导”相关；而政策则包含一系列工作原则，或“行为准则”，例如“外交准则”（Diplomatic Norms）。

尽管周恩来在西方被广泛地尊奉为一个完美的外交家，但也不能想象他的“外交”定义和西方国际关系教科书中的规范定义会完全一致。已故的海德利·布尔教授为外交所下的定义为：“通过官方代表并通过和平方式处理国与国，以及具有世界政治地位的其它实体之间的关系”。周恩来的确如此做了，并认为在国家间进行不懈的和平谈判是必要的，但他把“外交”看作是“战争的另一种方式的延续”。周曾经向一群年

轻但勤勉的外事官员们就“两种战争”的区别问题作过讲演。在结束时他说，“外交”与“武打”不同，它属于“文打”。

周最终还是探究到了世界政治的变化。他将“外交”看作是个高度政治化的过程，既不局限于“具有世界政治地位的实体”，也非仅限于“官方代表”。在反击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争取国际上更广泛的对中国的外交承认的整个斗争过程中，周一直注意国际舆论的威力。他的“人民外交”的根源可以在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初中期推行的统一战线政治的舆论宣传中找到。

对周来说，舆论宣传是外交活动中一个自然而正当的组成部分。在他关于“工作作风”问题的最早的一个指示中，他号召他在武汉的部属做到“五勤”。要求这些将来的外交官们做到眼勤，要多读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深入领会党中央的指示和方针；耳勤，要多听和广泛搜集多方面的意见和反映；嘴勤，积极地有效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批驳错误的东西；手勤，凡事要自己动手，决不可养成懒惰作风、依靠旁人；腿勤，要多走动，广交朋友，不能深居简出，等人上门。“五勤”后来被用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在看来很曲折很棘手的政治环境下，周所具有的达成调和妥协的非凡才能富有传奇色彩，西方很多观察家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观察他的外交。一些台湾学者根据他不断地进行调和而消极地将他比作能倒能起的中国的不倒翁。而且，善于玩逗熊游戏*的阿尔巴尼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曾对周恩

* 熊狗去咬穿着的熊，18、17世纪流行于英国，后被禁止。——译者

来的“摇摆不定的实用主义”深感不满。他说,这正好让美帝国主义占了便宜。周曾为霍查未能理解列宁的一段话而感到惋惜,列宁说:“妥协,再妥协”。周认为,霍查及像霍查那样的教条主义理论家并没有真正理解在处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天才思想。

周的“现实主义”形式上来源于毛泽东的关于矛盾和实践的辩证理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并非完全有意为周辩护,他曾公开对红卫兵谈过他对周明显的“和稀泥的习惯”的怀疑。但周的“工作作风”用毛泽东自己所要求的“实事求是”的矛盾理论来解释完全是无懈可击的。就个人而言,周对毛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心服口服。在外交和对外政策方面,和在所有政治活动方面一样,他的“方针和政策”明显地是根据理论与实践的相结合而设计出来的,这种结合在1949年前的国际国内统一战线政治理论中就已为世所公认。

在西方,外交事务中的“实用主义”似乎是指一种与某潜在的动态势力打交道的能力,这种动态源于国家安全处于进退维谷之中和在国际政治等级结构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时。从这种意义来说,“实用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未正式采用过。

在党的历史上,周的名字很少与“实用主义”相联系。“实用主义”是指被当作约翰·杜威和胡适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来理解的,它是与科学的批判的思想意识相对立的。不过,周的对手确想将他的“现实主义”说成就是“经验主义”,其意思就是以所从事的革命为代价,政治上倒退到过分强调事实。在30年代,一批所谓的反党托洛茨基分子反对毛泽东

的统一战线政策，攻击党务工作中存在着“经验主义”。在1941年的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和周恩来都一再强调反对“教条主义”，这是指在复杂的“客观”现实问题上硬套上一些主观片面而书生气十足的理论。

“经验主义”成为后来“文革”中指资周恩来的一大罪状。而且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里，他仍被含沙射影地比作“大儒”和“宰相”，被指控为躲避革命力量的锋芒而要滑头，被当作历史上的“反动”宰相司马光而受到指责。在历史上，司马光出于嫉妒而竭力反对当时中国最伟大的改革家之一——王安石。

1975年初，当时周病重在床，他的冷酷无情的对手将“经验主义”列为“主要危险”进行攻击。他们耍的小聪明被毛主席一眼看穿。毛表示，“经验主义”还是40年代早期党的整风运动中的问题，目前反对国内外的“修正主义”就已包括了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结果，周的这些顽固的对手们被当作辩证法学得不到家，需要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训练而被打发走了。毛严厉地呵斥他们“说话吞吞吐吐”。

对“经验主义”和党的“实事求是”的“正确”认识论之间的正确区分在1966—1968年动乱的“文革”极端思潮中遭到了破坏。当时，周成了仅有的能够逐渐使1968年9月以后的中国政治恢复到“实事求是”程序上来的人。

对周的“现实主义”的来源及政策本质作出的下述分析，是在设想党自身的分析传统中的理性范围一直占重要地位的前提下作出的。哈德利·布尔在对“外交”的论述中，对坚持革命正义和推行理性外交之间是否对立存有疑虑。不过，对

周恩来来说，这个问题就有可能另当别论了。作为党内的“现实主义者”，又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周恩来有实施“理性外交”的可能吗？

从他的现实主义来看，周实际上可能是个比毛泽东更好的共产主义者；然而，西方分析家则更常常认为他俩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将周看成是和毛对世界政治的偏激看法并不真正一致的温和人物。而这种看法却无法对周和毛在合奏中美和解之曲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合作得出解释。在另一方面，宋庆龄在评价周时，说他是个“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强调在“最大限度地扩大”中国和世界其它地区的关系上周和毛之间的真诚合作关系。

对于所谓的毛的激进主义和周的温和主义的实质，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革命”著作中有过论述。乔姆斯基认为，美国学者对于为什么随着尼克松的“和平之行”，人们已不再将北京看成是“扩张主义的、非理性的和仇外的”了，并没能作出认真的解释。乔姆斯基认为，西方报刊似乎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中美和解是得到了对“文革”负有绝大部分责任的激进领袖毛主席首肯的。乔姆斯基说：“西方报刊通常认为是以周恩来为首的‘温和派’将中国带出了严冬”。

因此，要理解西方这么多观察家将什么看作是周的“实用主义”，就要对1949年以后中国外交的现实主义的潜在倾向作出合乎时代的分析。从中国大量的文件资料可以看出，周恩来外交上的成功是离不开他的思想的。而这些文件资料表明，周的“方针政策”是以毛的意识形态为基础设计成型的，两者是一致的——毛的意识形态在中国被正式公认为是包括周

思来在内的整个一代革命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形成1949年后周的“工作作风”和“方针政策”的许多思想来自于1949年前为了民族存亡而开展的统一战线斗争。在统战斗争中，由于政治阵线的不断变更，党形成了自己的一整套理论体系。事实上，30和40年代的“外交”是由党组织来处理的。按周恩来的说法，宣传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及其国际意义是这种“外交”的主要目的。1949年以后，毛将1949年前统一战线政治的一些经验和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归纳，发展成为一套正式的意识形态体系，为新政权的外交提供了“理性”基础。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认为，马列主义关于外交事务是国内政治的延伸的观点是外交行为和对外政策决策的非理性基础。例如，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肯尼思·沃尔兹在其提出的国际关系意象理论中就集中讨论了马克思的关于战争是国内阶级斗争的对外表现这个观点。在援引查尔斯·比亚德关于对外政策是国内政策“不可避免的方面”这个结论时，沃尔兹指出，现代马克思主义无以复加地将对外政策贬成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

在西方政治理论中，“现实主义”常常认为，作为一个政治体系，国家间的国际关系是遵循特定系统规则运作的，这些规则超越了国内政治的独特前提。沃尔兹试图从冲突的个人行为、国内政治和由国家关系构成的复杂的国际系统相互关系特征来说明对外政策；然而，他似乎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有可能忽视它们自己在这个系统中的利益关系而去促进国内政治目的，这种看法引起学者们的争议。

与上述说法相反,人们可能注意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既强调国际和国内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间明显的外在联系,又强调它们之间隐含的内在联系。早在20年代,这种分析就认为,国际上世界战争的发展趋势和对国际问题的战略性看法影响了对显然有别的国家具体状况进行战术性的理解。周恩来在对“方针政策”的细致处理上表现出他对这种具体分析十分得心应手。

中国人擅长于采用一些独特的用词,但他们仍然热中于对国际政治进行现实的估价,这从其遗风中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一旦将中国的国际关系意识形态概念与它对各个国家的国内社会、经济和政治力量进行的综合分析联系起来时,就没有人会得出结论,认为有哪一位中国领导人或者周恩来本人在中国国力大小与他国相比较的问题上作不出明达的判断。麦尔文·戈托夫和黄逢模(音译)在对中国的危机处理实例研究中断定,中国在国际上的行为确实是国内政治分析的派生物。不过,他俩认为,重要的是,在与国内大事相关的情况下,中国人是怎么样作出预测和决定的。如果说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是立足于本国的,那么它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本书将按年代顺序对周恩来为实施现实而成功的外交所采用的“工作作风”和“方针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尽管中国国内领导层变动频繁,周始终坚持对中国的国际政策要有理性的和审慎的认识和规划。

历史表明,周恩来外交和对外政策最终战胜了美国的对华遏制。在中美关系改善而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周逐渐

形成了一种政策，这种政策来自于中国对自己曾遭受多重“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的认识。这政策植根于在国际关系中对“独立自主”思想观念的理解，正是在这基础上，周构想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将它作为国际行为的准则，并作为反对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一种战略。事实上，当今中国的“独立自主对外政策”的基础就是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和“方针政策”。

从古到今，外交家所面对的一直是由看来十分棘手的政治矛盾而产生的复杂情况，而外交，理想一点说，既需要有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广泛认识又要对自己的朋友和对手之类有足够的了解。周恩来信奉外交手段，但他同时也认为外交是一种显而易见的政治过程。他似乎赞成卡迪诺·黎塞留和弗兰西斯·戴·卡列雷斯观点：外交需要不断地谈判，“甚至于在当前尚无成果可自的场合下”也应如此。

周恩来具有著名外交家恩内斯特·萨道义爵士所称的那种“将聪明和才智运用于对政府间的官方关系进行处理之上”的外交才能和技巧。然而，周并非那种路易十四时代的外交家，他的外交和思想是在20世纪非殖民化形势下寻求独立的过程中自然成型的。

周的外交是否充分发现和重视了各国国家利益相互明显的一致性这个现实主义问题呢？基辛格对于为达到这样一种理想的一致性而采用“实用主义”是很重视的。他告诫尼克松总统，处理事情“不要基于意识形态，而要着眼于对双方利益的评估”。基辛格认为，在关于上海公报的谈判过程中，周和他的这个外交信条不谋而合，他描述当时他们之间的亲密工作

关系时说：

当然，周和我是互相利用；说穿了就是外交的目的，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使双方的目标一致起来，只有那些不懂行的人或不可靠的人才自作聪明，以为能够长久地愚弄对方。在外交政策上切不可忘记：你是在同一些人循环往复地打交道，……猜人只能得逞于一时，却损害整个关系。讲信用才能使国际秩序得以巩固，哪怕是在敌人之间也是如此；搞小动作决不能持久。周恩来是很了解这一点的。因此我们虽不能做到目标一致，却能做出类似的分析，那就是在当前这个历史时刻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来利用国际上的均势使之对我们双方都有利。

周在谈判中表现出的机敏的伸缩性使他没有受到基辛格的“国际均势”观念的约束。作为中国革命事业中的一位“外交家”，周认为，灵活机变的伸缩性在获得战略目的或“不可动摇的原则”方面是不可或缺的。他的这种看法是在革命经历中所得到的根本教训。在1949年以前，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得以生存显然得力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理论，这种理论与极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互相冲突的。在周的外交实践中，他并不致力于在美苏之间制造出一种“国际均势”。

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包括第三世界多边主义、同超级大国又合作又斗争和推动多极化的发展以反对两极化等，都可以在构成周恩来外交风格和实质的“方针政策”中窥见得到。

一 革命中成长的外交家 (1919—1949年)

关于“外交”，已故的哈德利·布尔曾认为，在任何一般谋求正义的情况下，它不可能得以成功地实施。由于革命显然是为了谋求正义，这在一种讲究实力等级次序并且各民族国家之间不断竞争这样的国际环境中，实施外交在概念上就出现了一个二难推论。哈德利·布尔的说法一点也不离奇，因为“革命”——它意味着大规模的社会变动和依据意识形态进行社会改造——常常与理性的正常程序形成对照。

然而，周恩来是在革命事业中从事外交工作的。作为一名外交家，他的成长过程给我们提出了几个有关问题：周作为个人是怎样研究国际关系现实的？他著名的“现实主义”的理论渊源是什么？他的国际政治特征概念是怎样形成的？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根据周的游历、个人政治生涯和智力成熟过程，来对他的现实主义的发展以及他对现代中国社会和世界政治相互变化的认识的各个发展阶段按时间先后进行分析。

周是在日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20年代早期在欧洲，他又进一步对列宁主义有了一个较深刻一些的领会，列宁主义明显地拒绝为突出无产阶级的重大革命作用而去迎合欧洲社会民主的潮流的观点。他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来源于将对外政策

和外交看作是国内阶级矛盾的延伸这一列宁主义基本观点。

周赞成列宁关于必须克服“左派幼稚病”的观点，而且他高度评价列宁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问题上的通情达理做法。20年代早期，周寄回国内一系列报道，分析介绍了当时欧洲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国际时事，其中包括欧洲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凡尔赛和约的国内国际意义；国际联盟的缺点；作为一种所谓的均势的延伸，中国对正在进行激烈竞争的欧洲霸权主义者来说所处的地位；以及太平洋地区爆发世界大战的潜在趋势等。作为在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心的党的高级组织者，周赢得了共产国际的重视。

1924年周回到国内，迎接他的是极其复杂的第一次统一战线的非常时期。周负责处理早期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关系中的许多事务。在试图调解党内敌对各派以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各派之间矛盾的频繁活动中，他显示出了处理难题的能力。在30年代，周逐渐调整了他在欧洲形成的关于中国无产阶级作用的观点。与“左派幼稚病”相反，他为“外交”的作用进行辩护，认为可以通过外交手段区分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势力，从它们那里获得一些让步，以便保护中国共产主义在内地的根据地。

1936年11月西安事变期间，他的个人外交达到了革命现实主义的新的顶峰，这种现实主义在40年代早期党的整风运动中正式成型，它主要表现在“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上。周还在日常研究发展统一战线“两手策略”上和毛紧密配合。在毛的影响下，他成为一名坚定的中国马列主义者，也正由于此，人们可以发现周在外交事务中所体现出来的最重要的现

实主义理智成分。

当时，周大大超越了党内“国际主义”派脱离实际的抽象理论框框去领会“马列主义现实意义”。为了一成不变的日常实践而放弃基本的意识形态革命目标，这是不可能的。由于明确强调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中国的实践本身则变成了基本的意识形态。毛和周共同抨击了党内的“教条主义”并摆脱了30年代早期的“左派幼稚病”，根据中国的特殊的矛盾理论对国际国内政治进行新的认识。他们对实践的强调主要在于党对中国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重要性的强调上。他们欢迎苏联可以给予的援助，但他们最为关注的是组织依靠国内资源而进行自力更生的革命运动。

周的工作作风和分析手法使在延安的美军迪克西观察组成员感到惊奇。和国民党大不相同，中国共产党显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状况有非常现实的了解。事实上，使美国人相信确实如此正是周恩来“外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约翰·谢伟思对共产党人的分析能力感受是如此深刻，以致于他情不自禁地将他们的分析手法与西方社会科学上采用的严密方法相提并论。谢伟思至少深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是现实主义者，因为他们是中国人。换句话说，他们以一种明达的中国观点来观察现实，这种观点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机构中常被用来指责国民党目光短浅地依赖外来援助和机会。

在重庆谈判的年代里，周表现出色。他的外交针对目标是美国人。他的外交实际上使国民党官方外交相形见绌。周和毛协调一致地采用“两手策略”，在政治斗争中始终谋求赢得“中间势力”，孤立国民党顽固分子，精明地应付着“打打谈

谈”的令人灰心丧气的局面。

下面着重介绍了在1949年前对外事务中，周恩来现实主义发展的各个阶段。周恩来现实主义的根源基本上出自于中国的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这里包括了毛周各自观点之间不断发展着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成为他俩在政治上终生合作的基础。没有毛的革命观点这个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要素，周对国家利益就不会有一个现实的评估。而他的现实主义根源绝大部分存在于党在意识形态上对革命实践的强调上，他的个人工作作风则形成于“实事求是”的延安传统。

旅欧时期的周恩来

（1920—1924年）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在上海登上波尔多号轮，踏上了通过苏伊士运河到马赛的路程。在此之前，他积极参加了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五四运动，并起了主要作用，后来又由于领导学生运动而被捕入狱。

作为《天津学生联合会会报》的一名编辑，周以飞飞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周对五四运动的焦点指向自由婚姻和传统家庭制度很感兴趣，但他更热中于写文章揭露在上海的日本棉厂和英国纺织厂外国资本家对廉价的中国劳动力的剥削。

像当时许多爱国学生一样，他将目光转向了国外，以寻找对中国国力衰弱和遭外国的屈辱占领这种令人绝望的状况的解释。作为一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新手，他迫切希望在马克

思主义理论中找到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相关的中华民族危机的解释。不像自称为“绿林大学毕业生”的毛泽东，周是在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咖啡馆、街头和工厂里接受革命教诲的。

在欧洲的头两年里，他偶尔投宿于巴黎靠近意大利广场的戈德弗鲁瓦旅馆。周当时受雇于天津一家天主教报纸《益世报》，为它撰写关于欧洲社会福利问题和工人运动的连续报道。

最近发表的《旅欧通讯》和《周恩来同志旅欧文集》提供了大约56篇文章，它们选自于天津《益世报》，另外11篇选自《觉悟》——天津《新民意报》的增刊。这些文选为人们提供了周对近代欧洲和中国的比较和相关发展的解释，它们还提供了周对欧洲对外政策和外交动态的评论，这些对外政策和外交动态显然源自于其国内的社会和经济危机。周还为读者发回了欧洲危机的潜在原因及其对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地位的影响的时事分析。

周的巴黎通讯集中于中法借款谈判的幕后活动及交易。周就中法间为了支撑行将倒闭的中法实业银行和向中国割据的军阀运送军火、提供资金而安排的秘密交易进行了淋漓的揭露和抨击，他谴责秘密借款是对“民主时代”的亵渎和破坏。威尔逊作出的“条约公开”的诺言变得昭然若揭了。

周从战后国际经济秩序的更大的范围来看待贷款问题，他警告他的读者们，法国在德国战争赔款问题上采取的报复行为将导致严重的国际矛盾。周恩来本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社会和经济破坏感到震惊，他将为了战争而增加军事开支的恶性循环同严厉的战后赔款政策联系了起来，他严

厉批评国际金融组织玩世不恭地为外国战争做财东。

周预言，赔款问题将在德国人中间引起强烈的抗拒反应。他还反对关于债务国无责任感的说法，认为债权国谴责像中国、土耳其和埃及这样贫穷的债务国，说他们将外国资金滥用于军事目的是说不过去的，因为债权国本身就是战后帝国主义竞争的根源，而帝国主义正在给欧洲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周认为，债权国批评债务国是要获得对债务国资金控制权的秘密计划的一部分。周预言战后的军国主义和赔款将酿成更大的失业、商业中断、通货投机、原料短缺、生产障碍和“民族之间的愤懑和抗争”。

周道出了欧洲政治家思想的潜在危险。赔款被当作是对战后剧烈资金短缺作出的一种反应而合理化了，周将强大的战胜国所持的这种观点描述为：“协约国感受穷困，乃自取其咎于德”。他得出结论认为，赔款促进了战后军国主义化的步伐，因而战胜国主张：为了防止我们自己免受敌人的报复，保证获得我们应得的赔款，我们不得不要有一个强大的军事力量……，周愤慨地谴责“资产阶级”通过获取赔款“夺国民之食”。

周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论推定，欧洲为了在殖民地世界获得垄断地位而进行的竞争将变得更加激烈，他还将国际军国主义化和债务与日本在同日本关系中的谈判地位联系起来。1921年9月，周报道了伦敦英国帝国会议对英日联盟协议的审议。这个地区对中国利益攸关，中国将“……受此种盟约种种苦痛”，周为此深感痛惜。他预言，帝国会议决议将阻止不了在太平洋上面临的冲突。他为中国外交未能作出有效的

反应而感到震惊。周认为，日本宣称不干涉欧洲事务，其目的只是为日本对将由此而发生的英、法和意之间的不和进行干涉提供保障，他警告说，自充为一个置身事外的“斡旋者”的日本正在夺取向欧洲人解释东亚事务的主动权。

周对华盛顿会议的分析同样集中于太平洋大国之间利益存在着难以处理的冲突这个现实，他认为，尽管大国间在海军力量限制方面达成了协议，日本表示满足于在太平洋上取得“平等影响力”这个地位，这只是假装出来的而已。周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华盛顿会议这段时期归结为“为恢复势力均衡而进行疯狂的斗争”的时期。

在一篇论述战后民族主义的评论中，周断言，取得胜利的协约国提出“民族自决”的口号仅仅是口头上说说而已。例如，尽管德国在西里西亚公民表决中赢得了胜利，但西里西亚还是有一半划归了波兰。周承认欧洲国家边界十分复杂，他认为，即使是自卫也可能很容易地导致对其他民族自决权的侵犯。

周对不久前在山东损害了中国主权的德国帝国主义的甚嚣尘上很反感，但他对德国战后所陷于的处境表示同情。作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实主义者”，他担心在德国出现“左派幼稚病”，并且推测共产党任何企图在德国夺权的举动都将促成国联的入侵。他注意到了普遍呈现的主张在欧洲进行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偏激狂思想，而他认为，在德国有必要避免采用激进的手段，而要去鼓励德国人口的大多数去支持共和政体。

这种现实主义应放到周对列宁的崇拜这个场合来看。周

认为，列宁的观点是反对社会民主思想的，但他赞同列宁关于应该消除“左派”思想的观点，这些“左派”思想拒绝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就周看来，列宁在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和对英德作出的外交表示这两方面是绝对正确的。这实际上就是“灵活性和原则性的高度结合”——这种结合后来成为周自己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的终生信条。

周对在右派势力盛行、社会民主党变节、中间等级与帝国主义的结合日益加强的欧洲进行革命的前途并不乐观。俄国无产阶级的“雄心壮志”使他受到鼓励，而同时中国人民的缺乏雄心又使他灰心丧气。在一期党的杂志《少年》上，他抱怨中国人民普遍缺乏对在现代社会发展中无产阶级特殊作用的认识。就是这样，他还是拒绝接受那些较为自由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的情况落后得不可救药了，需要允许资本主义和外国投资在中国经济中不受限制地发展，由此来一番自发性的转变。

周也认为无产阶级力量十分脆弱，但他并没有由此而无视无产阶级在现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周不明白为什么中国有头脑的人对工人问题这么不感兴趣。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关系并不为人所注意，周认为：“我国的饥荒部分出自于气候，而部分出自于人民无力促进自己的发展。这就意味着无法逃避灾害，一旦灾害降临，我们只有坐以待毙”。

尽管如此进退两难，周对在中国向资本主义让步还是持强硬立场。他理解列宁新经济政策提出的理论基础，但在当时他认为，通过外国投资和借用外资而使企业在中国扩展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赞成暂停外国宗教和文化机构在中国的发

展。他热诚地希望取消私人资本，并极力主张无产阶级不要为外部世界提供的资金表面上的利益所迷惑。早在这些年代里，周就从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方面来思考问题了。

在欧洲，周把自己的政治观点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在这里，他不仅获得了非常珍贵的有机的经验，而且还磨砺了他的分析能力。在对国内和国际政治相互关系的分析中，他想到去欧洲政治表面上的理性，以捕捉到影响欧洲社会的各种潜在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综合因素。周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家，他是一个抛弃了“左派幼稚病”的列宁主义式的现实主义者。

周恩来与中国的“左派幼稚病”

（1924—1935年）

周对欧洲的政治和外交事务洞察明细，然而，他从欧洲观察中国就难免有点抽象了。在26岁时，他作为一名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返回中国，他在共产国际享有声誉；不过，回到国内后他才发现，国内的政治状况远比他在欧洲所看到的马克思关于劳工和资本的读物中所阐述的要复杂得多。

周一回国就投身于第一次统一战线的错综复杂的政治中去了。周正在上海和汪精卫就加强共产党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应采取的方式进行最后协商之时，蒋介石突然于1927年4月12日采取暴力在上海、杭州、南京和宁波大肆屠杀共产党。1927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周脱颖而出进入政治局，成为一名党的高级领导人。他是从1927年起

直到1949年连续不断地在政治局工作的仅有的一名高级领导人。国民党“左派”先发制人地于7月中旬将共产党从它的队伍中驱逐了出去。

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失败成了中国共产党内和共产国际内部激烈争论的一个问题。1928年夏，一个新的中央政治局由斯大林和他的最新助手布哈林亲手组建。显然，斯大林挑选了三个“左派”候选人，其中包括周恩来；而布哈林指定了三个“右翼”候选人。随后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就由此而呈现出在革命方针上极端的勾心斗角的特征。

1930年8月，周从莫斯科回到国内，在组织对所谓的“立三路线”的错误进行评价中他担任了主要角色，“立三路线”曾经过分强调无产阶级的作用并在错误地认为党已获得了全国的支持的情况下建立以城市为基地的党的力量。在党的六届中央全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周发表了他的著名的“少山”报告，这报告意外地对李立三作了温和的处理。作为斯大林最初指定的三位“左翼”之一的周恩来，可能怕丧失对以何孟雄为首的右翼势力政治上的主动性，而不想使最初班子中第二位成员过于丢脸。周的报告以谈李立三的方针政策而闻名，然而，在报告中，周还展开谈了国际关系。

周的报告大纲有意识地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给共产国际第十六次大会的报告中阐述的理论调子相一致。对于当时萧条的国际局势，周是从美国的经济危机方面来阐述的。大国的军备竞赛，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剧烈的竞赛，表明了世界有爆发战争的趋势，帝国主义中心和殖民地之间的更为尖锐的矛盾被认为增强了印度、南美、越南

和中国的民族反抗。

周与布哈林唱反调。在周看来，布哈林的关于“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印度处于非殖民化过程”和“美国是个例外”等论点是要人们放弃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积极的国际联合。因此，这个错误路线是“取消主义”的一个例证。布哈林也许犯了资本主义思想错误而不是现实主义错误。

周回顾了中国军阀混战导致政治经济危机不断扩大的来龙去脉，以及它们对农业生产、工业发展、通讯和国内商业所产生的破坏性影响，重申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与帝国主义活动的地方特性有关。关于革命形势，周谈到了各帝国主义势力之间在中国的竞争，正是这种相互竞争排除了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在中国取得绝对主宰地位的可能性。

周特别提出，既然在中国共产党苏维埃革命和军阀政权的反革命之间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中国共产主义何以能够同这些地方帝国主义进行谈判交涉。周一方面强调在方针原则上作出的任何妥协都不能证明是适当的，他还警告要警惕出现“左派幼稚病”。周想用这些方式从苏区清除外来军事势力并且想赢得外界对苏维埃政府法律上的承认。周还列举了列宁坚决主张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以拯救不堪一击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免于崩溃的例子。周指出，“每个党员都应该明白这一点”。

1931年1月初，政治局对李立三路线又作了更为辛辣的揭发批判，认为立三路线实质上是丧失了原则。周恩来本人对自己在第三次全体会议早期的领导工作作了适当的“自我批评”，但他仍保留住了政治局中的位置；并且他还强调进行独

立分析的重要性，他坦率地认为，批评李立三是为了“……不仅复述国际的路线”。

1931年，日本试图打破几个欧洲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实力平衡，周当年在欧洲作的最坏的预感居然成了现实。尽管周对“左派幼稚病”表示过担心，党仍基本上未能利用国内相互竞争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也未能通过建立反对30年代中期日本入侵的统一战线来扩大社会支持的政治基础。在这段时期，周和毛就军事方针问题发生了争执。毛对红军的控制权甚至于丧失给了周。周后来指责了在共产国际的错误建议下未能给予福建人民政府支持。而且，共产国际还以其不愿承认中国国内若干帝国主义之间有重大差别而使中国共产党人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在遵义这座小城里，溃逃的红军于1935年1月5日暂时停顿下来，以对军事上的失误进行总结，这种失误导致中国中部的苏维埃政权的崩溃。周承担了在党的军事方针上采取“进攻路线”的责任，毛成为权力很大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席，周担任该委员会的副主席。周的正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终于让位于毛对中国“客观”情况的切切实实的解释。他自己逐渐抛弃了在苏联的影响下形成的对中国革命道路的看法。在这方面，周可能无意公然反对共产国际，但军事上重大失误这个经验教训却使中国共产党经受了一次政治洗礼，它增强了在评价中国自身特殊的国内国际状况过程中进行独立分析的重要性。

1936年的统一战线外交

1936年12月，周恩来赴西安与蒋介石谈判，这次算得上是周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最出色的表现了。蒋介石欠了中共“累累血债”，但周和毛采用了一条“和平解决西安事件的方针”。苏联人施加压力要求释放蒋，但中共根据对在西安出现的不同政治结盟的评价作出了自己的决定*。周把个人感情放到一边，调动蒋的自私心理。他甚至于向蒋保证，他将以个人身份来担保蒋当时在莫斯科学习的儿子蒋经国的生命安全和生活愉快。

西安事变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谋求孤立国民党政府内亲日顽固分子、加强同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之间已有的联系的一次统战外交实践。曾在早期对福建人民政府的支持问题上动摇不定的“左派幼稚病”这时已失去了信用。而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于1935年夏赞成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样一来，中共再也不必在共产国际反对“从上层建立统一战线”的禁令下而绞尽脑汁了。

同蒋的谈判是以中国革命恢复在“抗日运动”中的功能为前提条件的，蒋不能为了捞取自己政治上的优势从组织上操纵这个运动。按周的话来说，“和平解决”结束了“对外事务上的退让政策”，并且有希望出现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各种阶级力量的重新联合”。资产阶级阵营中的“左翼”（西北军也在其

* 中共和苏联在对张学良二将军所作的分析上有分歧。——版注

中)已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结果更多的“中间派”被争取到反日统一战线上来了。这个方针的有效性在1937年7月7日日本对华北的突然侵略中得到了验证。

在西安事变之后同蒋介石政府进行的一系列谈判过程中,周在武汉建立起了国际宣传组,它成为中共最早的外事机构。这个国际宣传组是为了促进国际上对中共统一战线政策的认识和理解。它的职责之一就是翻译并传播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著作。周本人频繁地会见西方记者和知名人士,这反映了一种谋求有益的国际舆论的愿望。

王炳南谈起过周对这个组的领导。周十分强调外事工作中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并且敦促他在武汉的属下打破国民党对外事的垄断。周积极主动地同那些反对日本的英国人和美国人保持着可能的协作关系,并且希望西安事变会导致国民党结束在对外事务上迁就退让的政策。周对在武汉的同志们说:“抗战要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但我们也还要妥为利用国际的有利条件,否则便会陷于万劫不复之境”。周和他的组织者们努力开展同外国记者和外国使馆的独立交往以建立不依赖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外交联系。“外交”,尤其当针对美国的公共舆论时,要结合“宣传我党的政策”。后者成为1949年后周的“人民外交”的前奏。

重庆谈判的“方针政策”

1938年12月,周恩来到重庆,除了其间在莫斯科6个月之外,随后的7年半绝大部分时间他都呆在这儿,同国民党进

行极其艰难而危险的谈判。在这段时期，周灵活地运用又合作又斗争的两手统战“方针政策”，使之适应谈判桌上出现的紧急情况。

他在这里磨砺了他那有名的“工作作风”——强调整定的意识形态信仰、对“客观”的政治现实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段并因地制宜地进行相应调整。透过不断变化着的统一战线联盟织成的错综复杂结构，周和毛一同摆脱了30年代的“幼稚病”，根据中国特殊的矛盾理论来理解国内和国际政治。

这个时期在意识形态上自觉地强调“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与在国内国际政治中信奉现实主义是紧密相联的。毛泽东用“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教条主义”，他说，我们所说的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指的是有着具体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是运用于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具体斗争中的马克思主义……这种“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意味着中国的现实主义——这后来成为周恩来外交的精髓。

党的方针政策，正如它在“实事求是”实践中所显示的那样，意味着具有在统战政治上又合作又斗争的二重性。在这个统一战线内部，各力量结构是典型的三边型而不是双边的。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在任何由两个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构成的一定政治均衡体系中争取“中间势力”。周恩来根据这个观点，在50年代中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50年代里强调以该原则作为联合社会主义和中立主义力量反对美国的“战争政策”的战略手段。

周在莫斯科期间，正值苏德签订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和苏日军队在外蒙古和满洲边界一带发生严重冲突时

期。当时周认为他个人有必要在共产国际面前为中共在华北改变革命路线进行辩护。显然，“领导同志”对毛和周变得“太脱离工人阶级”而深感忧虑。

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毛试图为中共支持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而作出艰难的解释，他声称斯大林的政策是为了打破张伯伦和达拉第企图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毛责备那些“糊里糊涂”的党员们，让他们想一想，英国方面、法国方面、波兰政府方面总之是有点自取其咎。他宣称，西方不支持苏联这意味着他们从政治上将民主国家和法西斯国家混为一谈。苏德协定暂时限制了中共自己区分帝国主义的能力，结果丧失了利用“中间势力”的好机会。

在这段时间里，党发动了一场意义重大的内部整风运动。毛直接将矛头指向党内“国际主义派”中斯大林的前门徒，以进一步强调他的关于中国具体实践的重要性。周于1940年3月从莫斯科返回，重新担负起他的重庆谈判重任。他全心全意地赞成在延安兴起的对“自力更生”的强调。周指责蒋介石企图依赖外来势力来解决他所面临的国内政治和军事问题。蒋基本上是在依靠“外国进行战争”。蒋完全缺乏“自力更生”精神，在处理日本入侵的方法上，蒋是个十足的摸鱼的“盲人”。

“自力更生”的概念在其相关的国内国际含义上十分复杂。它包含了中共基本的群众运动意识形态内容。它突出了植根于一种新的国内政治中的民族意识，这种民族意识用当时的话来说就是中国人民站立起来，摆脱奴隶枷锁。

“自力更生”在汉语中由两个词构成，前面词的意思是“自

立”，而后面词的意思是“变更生活”。周在宣传中将“凭自己的力量创造新生活”同国民政府谄媚地依赖外来势力与日本人作战进行对比。这种观点不仅仅具有宣传上的意义，因为周在重庆谈判中的方针看来主要地衍生于这样的前提：他认为国民党领导人除了“消极不抵抗方针”外决不会再采取别的政策，这样一来，出于当时的政治或军事原因，他们将仅仅是在有名无实地支持抗日战争。

周的重庆谈判可分为“两个三”阶段，即“三次反共高潮”和“三轮谈判”，它们突出地表明了中共不依赖国民党方面以及相关的不受统战谈判的约束。当时国民党方面深受当时军事斗争兴衰的影响，不过，中共参加谈判的基本宗旨是双重的，即争取国内“中间势力”的支持以孤立国民党右派、争取国内的合法地位和国际上的声望。

毛泽东强调，根据“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一致性”原则而作出适当的“让步”，这在曲折的革命道路上完全是积极因素，而不是消极因素。

自1941年2月份之后，所谓的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教条主义分子”由于过于依靠苏联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并且采取了对国内革命起相反作用的方针而日益遭到抨击。周加入了毛的抨击行列，这样一来倒顺利地避开对经验主义的指控。周将“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和“中国化”看成是完全一致的。和毛泽东一样，周欢迎解散共产国际，他坦白地说：“……中国共产党将要更负责地更独立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通过“整风”运动，周正式形成了他自己的“工作作风”。在这方面，政府工作和外交工作之间一般没什么区别。在专心

重庆谈判期间，周写下了七条“修身要则”。

周强调勤奋学习和“抓住要点”，人们可能会将周看作是个忠告其弟子要区分“本”和“末”的传统型学者；不过，他的观点却是源自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客观现实”看作是矛盾和综合不断变化阶段的一部分这种辩证认识之中的。根据再度被提起的群众路线，他特别强调对通过观察而得到的知识进行归纳的重要性，使习作合一，“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周总是自觉地调整他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特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在同某些团体和公众邂逅相遇过程中，他能很快适应他们的特征。他具有惊人的适应能力，这不仅仅表现在适应社会中的差异性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同外国人相处方面。周突出地表现出了他所具有的“不同的文明不同地对待”的特点，这使得他的外国客人在他面前感到非常的轻松愉快，毫不拘谨。

周一再表明他恪守意识形态原则，他同时还强调对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自知之明的重要性。这对他在后来与大国进行的谈判中出现紧急情况时非常有帮助。周赞成与群众过“集体生活”，健全身心健康和自我完善，而这些和毛泽东关于这方面的观点极其一致。他对意识形态原则性采用的启发式的强调在他的工作作风的定义中十分明显，他的这种工作作风强调通过自觉遵守纪律和中国的独特实践，对客观现实采取现实主义态度和灵活性原则。

周的外交手段引起了美国人的注意，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坚持让蒋委员长同意向延安派遣美军军事观察组。恐怕是因为这个观察组要在“匪”区开展

活动，所以它被戏称为“迪克西观察组”^{*}。毛和周不失时机地利用了这个观察组对国内和国际所产生的和可能产生的意义和影响。1944年8月18日，党作出一项指示，将这个使团的意义描述为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

约翰·谢伟思随使团的先遣组到达延安，他广泛而详细地描述了他的所见所闻。他早已对蒋介石“轻率”的对外政策提出过批评，尤其批评它的疏远苏联的政策和正开始令美国政府反感的“讨价还价、欺瞒和讹诈的伎俩”。

谢伟思报告中谈到了中国共产党根据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实践精神”所进行的领导工作，谢伟思认为，中共的这种特色肇始于他们“经常作自我检查和自我批评”。他常常觉得，中共领导人对来自党外的建议很冷淡，但他们确实在党内坚持进行严肃的争论。谢伟思得出结论认为：“这种政策考虑是建立在客观、科学态度的基础之上的。”事实上，他认为这种“考虑”是很可以同西方社会科学的要求相比较的。谢伟思感受深刻的是他们自觉的“实事求是”的方法，这表明共产党领导人不仅在他们的思维上比蒋更为现代化，而且他们对中国政治和社会状况的理解也比蒋更为现实。

周恩来想在对外事务上建立起中共的独立性，他还想同华盛顿有更直接的关系。华盛顿方面的积极态度将赋予中共谈判者在同国民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谈判中一些影响。中

* 迪克西 (Dixie) 源出美国内战时期一首流行歌曲，意思为南方各州。——

编者

共在外交和宣传上的成功可从蒋的个人感叹中部分反映出来，蒋对“外国人对我们的军事和政治事务纷纷提出批评”牢骚满腹。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结束之前，国共双方未能达成任何实质性的协议，周所称之为“第五阶段”的谈判始于1945年晚夏。这阶段的谈判，他相信，在性质上不同于过去的几个阶段，因为这新一轮谈判是面向全体公众的。它包括了来自其他政党的“民主贤达”，它还包括了作为“调停者”的美国。这次谈判极其漫长而复杂。

谈判中，双方都竭力设法让对方为战争继续打下去承担政治责任，这为从社会上培养“中间势力”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当敌对的两方迫不及待地趁日本人投降之机在全国各地争取军事和政治上的优势的时候，他们的谈判陷入了僵局。双方都想得到美国的支持，双方都想取得国内和国际政治舆论上的宣传优势。由于美国的调停是以苏联将兑现它在协定中作出的对蒋的许诺从而斯大林不会直接介入中国内战为先决条件的，这使得共产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

中共领导提出一项令人感兴趣的建议，表示有可能让美国经济进入中国，以此来力求与美国人的交往。谢伟思报告说，应将中共领导人理解为中国的现实主义者，他们并不打算教条地在中国搬用苏联的模式，不过他们也认识到美国是“太平洋地区最强大的国家”。不仅中国的外交使团强调美国处于援助中国、振兴中国经济的地位，就连斯大林也向杜鲁门的使节哈里·霍普金斯强调了这一点。谢伟思可能对中共愿意欢迎美国投资的程度夸大了一些。

1946年1月10日，周向重庆发送了一条密件，提出他和毛可以前往华盛顿非正式地拜访罗斯福。也在同一天，毛在一次党的会议上作了如下的讲话：

我们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赖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

争取“中间势力”是周恩来外交和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一种“又独立又团结”的双重战略必然与这个战略组成因素所具有的双重特性相关联，从中共的观点来看，它既可以是矛盾的和摇摆不定的，也可以是富于进取性的。周策略上的灵活性和意识形态原则上的坚定性使他谈判桌上的对手刮目相看。一位国民党高级谈判代表心怀妒意地这样描绘周的谈判技巧：

他改变他的方针十分巧妙，以致于常常被你忽视。当然他也作出妥协，但只是在最后关头才作最低限度的而且是微不足道的妥协，以使谈判进行下去。当后来你再研究他的讲话时，你才发现在重要问题上他一点儿也没作出任何实质性的让步。

周对“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再三强调意味着他不打算看到中国依赖于美国，他也不打算允许美国资本对中国的经

•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6页。——译者

济进行自由地入侵。在这一点上，他引用毛的话说：

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有了区别，就有斗争。

区分这些“差别”对周的国内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来说是缺一不可的。和毛一样，他认为党应该认清世界事务中决不只有一种帝国主义，这同在国内地主和资产阶级中有着不同的派系一样。根据“……敌人的阵营是在不断变化着的”这个事实而进行复杂的“区分”是必要的。

由于美国对国民党的军火援助有增无减，周对美国的调解失去了信心；不过，他和毛却使谈判得以延续，以便在国内获得政治上的优势。党内有些人担心一旦爆发国内战争，美国可能站在国民党方面进行干涉。周坚决主张毛应亲自去重庆进行谈判，不然的话会进一步增强由于日本投降而国民党已取得的威望。周的外交使团当时抓紧时机积极活动，使国民党丧失声誉并争取“中间势力”。毛和周甚至打算放弃华中八个“解放区”以便谈判得以继续进行下去。毛解释说：“有时谈判是‘针锋相对’，有时不谈判也是‘针锋相对’。”

周说服党接受了全国军事力量重组方案，这方案规定中共保留10个师的兵力，而国民党保留50个师。周认为美国提出的装备60个师的新国民军的建议是企图在政治上取得对中国事务更大的控制的一个花招，但他认为，谈判中的中心因素是对中共控制下的地方政府的承认，而这些地方政府将依

赖于他们自己的“人民军队”而不是国防军。

拒绝谈判将疏远“中间势力”。周自己曾引述马歇尔牢骚满腹地对叶剑英说过的话，大意是周将军并非“为了谈判而谈判，而是出于宣传的目的”。周承认马歇尔“说对了一部分”，他指出，谈判是“揭露国民党在处心积虑地准备战争从而教育人民的一种方式”。在组织联合政府的一些关键细节方面，国共两党互不相让，周关于蒋确实想诉诸军事手段的看法不幸而言中了。

1947年，蒋军进攻延安，迫使中共政治局暂时退守陕北。当时党的中央外事组建立了，但周和毛的军事事务太忙，他们无暇顾及外事组的工作，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48年5月，当时中央委员会机构在西柏坡重新找到了一个安定的立足之处。

当时周对美国影响战争进程的能力不屑一顾。他重复了毛的观点，指出美国将不可能用原子弹来对付一场农民战争，他注意到美国已不遗余力为蒋装备了45个师并提供了40亿美元的援助。周断言：“美国还可以再提供多少？美帝国主义可能很富有而且很慷慨，但向美国要钱的国家很多。”周还断定，即使国际上允许美国政府这么做，美国可以抽出来应付冲突的军队最多也只有20万人左右。他反问道：“对中国来说，20万人算得了什么？”

1949年4月，在同希望签署一项和平协议的南京求和代表团的最后时刻的谈判中，周清楚明白地申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周指出，中国在“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上是没有调和余地的，但他同时表明：“我们愿意同所有平

等待我的国家进行合作”。中国将欢迎外国的援助,但这种援助要在承认中国的民族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周保证:“至于将来实现和平之后,我们将着手从实际出发现实地处理事情。”至于外交承认问题,周对此并不着急,新中国决不会为了获得迅速承认通过让步而放弃平等原则。

二 冷战时代外交部的建立

在一篇纪念周恩来外交事务工作的文章中，中国外交部理论研究组写到：“他培养了一支革命外交队伍。他为新中国创造并发展了无产阶级外交风格。”事实确实如此，周恩来本人就曾将50年代初期外交部的组建工作称作为“另起炉灶”。

1949年9月30日上午，周来到中央外事组办公室，向他的未来外交官们宣布，从现在起，他们将以官方身份正式处理对外事务。周强调，新中国的外交将贯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革命原则。新中国将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换句话说，也得有“新的外交”和一种全新的外交风格。在一个根据自己的具体实际建立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制度下，沿袭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惯例是不可能的。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带给中国的漫长而苦难的经历使我们懂得，要毫不含糊地拒绝前“国民”政府的“奴性外交”。就连苏联的经验，即使它对我们有益，也并非完全适合于新中国的“具体马克思主义”实践。周的讲话在中央外事组引起了巨大的振奋。

中国人将“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但外交关系的建立并不是要靠对“帝国主义”妥协让步来取得。周恩来宣布，所有外国政府的使领馆（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除外）不再享有外交特权。这些使领馆所属国家的政府必须宣布在平等的基础上

承认新中国政府。而且周强调，只有在有关国家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关系的情况下才与他们进行建交谈判。这样一来，美国坚持承认对国民党的财政和条约义务并且坚决要求中国政府保证不加入苏联的正式联盟，这就被看成是对新中国国家主权的挑战，是根本不能接受的。

另起炉灶

“另起炉灶”需要建立相应的新的行政和人事机构。在人员召集方面，周恩来依靠那些在30和40年代曾从事过中共非正式外事活动的人员。当年，就连中共处于“非法”的地位时，中共也曾曾在国民党政府的官方外交之外设法从事外事活动，以争取国际承认。因而，周可以从过去从事党的统战工作的人员、军官和新闻记者中罗致人员。

早在当年设在武汉的“长江局”工作期间，周就开始招收培养非正式的外交官了。这些“外交官”们勤勉地运用周的“五勤”工作作风与外国官员和新闻记者打交道。设在武汉的国际宣传组是当时中共第一个外事组织。它与八路军总部相互联络，八路军有一个国际情报组。

后来在重庆又建立了一个规模更大一些的组织。在重庆谈判的早期，桂林和香港也建立了相应的机构，但后来由于1941年1月爆发了皖南事变，这些机构都相继关闭了。1947年11月，所有中共谈判代表和随同干部都被从重庆、上海和南京紧急召回延安。中央外事组成为1948年5月党中央迁往西柏坡后建立的唯一正式机构。

王炳南的经历——他关于周恩来的文章是有关周的外交活动的一个重要来源——算得上是新中国外交部高级人员中的一个典型。和周一样，王曾留学欧洲，他后来参加过1936年同张学良的谈判。王是当年西北群众运动指导委员会的领导人。1938年之后，他在重庆八路军联络办事处的外事处担任领导工作。重庆谈判期间，他是南京中共代表团外事委员会的副秘书长。王后来成为1947年建立的中央外事组的副主任。1949年10月，他被任命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

新中国外交部的人员中，曾同马歇尔使团打过交道的人要比1949年前以非正式外交人员身份工作过的其他人员多。50年代早期，外交部人员要求不太多，因为当时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还相对较少。由于面临着美国对“红色中国”的遏制，新中国争取外交承认的工作进展十分缓慢。

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就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作了一篇报告，其中按建交时间先后顺序列出了下列17个与新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朝鲜、捷克斯洛伐克、波兰、蒙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阿尔巴尼亚、缅甸、印度、越南、丹麦、瑞典、瑞士和印度尼西亚。英国、挪威、芬兰和荷兰在报告期间正在和新中国进行着建交谈判。周没有提到南斯拉夫，南斯拉夫于1949年10月5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一项通报中曾正式表示要与新中国建立关系。

根据1949年10月公布的国家临时基本法规定，外交部在新政府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它是不隶属于政务院三个高级办公室中任何一个的唯一的部。由于周身兼总理和外交部长

二职，所以他在外交事务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尽管出于从组织上加强新成立的外交部的力量方面考虑，一开始就将最佳人员留在了北京，不过，在随后的十来年里仍有许多部门的正副领导被派往国外担任高级大使职务。

“外事系统”的组织工作有受到苏联影响的痕迹，这一点也不奇怪。例如，负责外语、出版和分配的机构就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和文化部的“双重领导”。而另一方面，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内设立典礼局则反映了中国的传统。

早期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环境下曾倡导推行民众外交，而中国人则在统一战线国际政治中创造并发展了他们自己独特的民众外交形式。甚至于在1949年之后，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仍作为影响国际舆论和外国政府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而保留了下来。为此，新的国家行政机构专门建立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一个处理对外文化关系的委员会。这些机关和外交部之间的人员流动十分频繁。1950年10月份外交部机构及其高级人员概况列表如下。这些机关作为外交部的附设机构负责处理“人民外交”，“人民外交”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美国人却从冷战的角度对它进行解释，认为它的存在恰恰进一步证实了“北平”对常规外交不感兴趣。

1950年10月外交部机构及人员概况

部长：周恩来	副部长：王稼祥 李克农 章汉夫
办公厅主任：王炳南	副主任：阎宝航 董越千 赖亚力
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	副司长：徐以新

亚洲司司长:沈端先

代司长:乔冠华

副司长:陈家康

西欧非洲司司长:宦乡

副司长:温朋久

港澳司司长:柯柏年

国际司司长:董越千

副司长:龚普生(女)

情报司司长:龚澎(女)

条约委员会

主任:章汉夫

委员:刘泽荣 梅汝璈

专家:何思敬 张锡伯

叶进新(音) 卢殿和(音)

对外政策研究委员会

主任:周恩来

副主任:乔冠华

秘书:杨刚(女)

顾问:梅汝璈

礼宾司*司长:王卓如

副司长:沈平

* 礼宾司与中央人民政府中的礼宾局局长为余心清协作共事。

资料来源:英国香港总领事馆《当前背景》1950年10月23日第18册,第1—2页。

从附图外交部的机构分类可以看出,同一“系统”中兼职程度很高,由于当时能在新国家高级行政岗位上工作的有经验的人员一般较缺乏,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而其部门分类既根据地理区域划分,也根据业务职能的不同来划分。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关系的特征,外交部负责处理所有国家同国家之间的关系,而中央委员会的国际联络部负责处理党与党之间的关系。

“独立自主”与中美、中苏关系

1949年10月公布的共同纲领正式确定了现有的对外政策取向，主张进行广泛的对外交往，随之周恩来于10月份呼吁国际社会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承认新中国。1949年11月15日和1950年1月8日，他分别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和联合国大会成员打电报提出这项呼吁。

为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的席位，美国政府设置了重重障碍。美国冷战宣传机器还千方百计想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参与国际组织并承担义务的诚意产生怀疑。例如，它认为中国承认越南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是故意和法国作对；中国同英国就建交谈判进行的外交争执也被认为同出此理。

然而，周对于恢复中国在联合国权利的问题是极其严肃认真的，这因素在后来关于朝鲜问题的谈判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美国政府声称，如果联合国安理会7个成员都投票赞成接纳中国为其成员的话，它将不否决。但这一点对中国人来说并不感到欣慰，因为他们一直认为联大只不过是美国的“表决机器”而已。

中国的“独立自主”外交方针主张不考虑社会和意识形态因素同各国进行广泛的外交往来，但美国对中国抱有敌视态度，而中国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又“一边倒”的情况下，要做到这一点几乎不可能。甚至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欧洲事态的发展就成了一个既定的事实。

毛泽东于1949年6月30日进一步明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将采取“一边倒”的政策。毫无疑问，美国在中国内战期间向蒋介石国民党提供的大规模物质援助是造成中共“倒”向苏联的根本原因。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在仍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政策的情况下会“倒”得多远。

西方曾广泛推测，毛泽东弄不好的话会成为另一个铁托。美国国务院情报机构在1948—1949年期间对中共政策中教条上的利益和实际利益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曾作过分析，并且推测了在中国出现铁托主义的可能性。英国外交部曾根据这番推测试图说服美国政府尽快在法律上承认共产党中国政权。苏联人想在中国的东北捞到特殊利益的企图更激起了人们对中苏利益上不相容性的考虑。周恩来本人也有这种考虑，他尤其对苏联无视中国的独立而感到气愤。

1948年，在西柏坡发生了一场严肃的争论。尽管中共领导主张各国根据自己的具体实际推行“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还是同意了斯大林对铁托的指责，认为铁托脱离教条的做法是在搞“民族共产主义”。他们丢弃了自己词汇中的“中国化”，但他们并没有改变自己的“人民外交”的定义以迎合东欧式的“人民外交”——1948年季米特洛夫将它称作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直到1949年6月，苏联专家才确认中国的“人民外交”具有和东欧国家“人民外交”不同的地位。

东欧的民族主义相对于远东的民族主义来说，具有更加不祥的政治意义。刘少奇将“铁托集团”同“民族保守主义”相提并论，但在强调“各国完全平等”和通过在建设社会主义的

“不同的具体道路”上各民族的“自愿联合”达到“世界大团结”上，刘给中国留下了广泛的选择余地。

近来中国的编年史强调，“一边倒”的想法产生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并且认为它并没有导致“完全依赖或彻底从属，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动性。”周和毛的确“一边倒”了，不过他们仍然在寻求尽可能多的外交和商务上的选择自由。冷战所形成的“两大阵营”使得中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只局限于苏联和东欧，但毛和周都一致主张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做生意”。

1948年11月，尽管同美国的敌对日增，毛还是指出，中国将同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中共希望在战后处理和同日本签订和约方面同苏联进行合作。周恩来外交十分重视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上所达成的协议，强调有必要就有关战后日本问题签署联合协定。中共希望承袭国民党政府“五大国”之一的位置。然而，到了1949年5月，美国单方面取消了日本的战争赔款，而且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决定建立一支15万人的防卫军队。7月初，朱德要求让新中国参加远东委员会，并且呼吁召开外长联席会议。

4月17日，周恩来发表声明，表示决不会为了获得既迅速又轻而易举的外交承认而向帝国主义妥协，不过中共领导层仍希望“同所有平等待我的国家进行合作”。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讲话中提出了“一边倒”，这个调后来被广泛引用。当时，毛泽东是针对那些认为“不要国际援助也可以胜利”的干部们说的。毛指出，奴性十足的国民党依赖美国的援助，这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不相容的，不过，

苏联的援助却是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提供的。

在50年代早期,中国国内就“一边倒”和相对来说采取与美苏“等距离”外交方式可能带来的相对好处问题进行了争论。对内宣传材料和干部学习材料都是针对反对1945年中苏条约和苏联在内蒙古的地位的思想的,以及一些对苏联的对华政策抱敌对情绪的思想的,纠正认为苏联对华政策和美国对国民党的政策一样是为了谋私利的观点。就连对1950年2月签署的中苏友好条约,国内还有人反对,他们认为它将使中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场。在非党人士中,甚至有人推测在签署得到众人欢呼的友好条约的同时,中国同苏联还签订了秘密妥协文件。

两个排他性的“阵营”的建立使得主张采取“两手战略”、争取“中间因素”的中国的“具体马克思主义”的实施受到妨碍。新中国外交政策一次最重要的总结是在《共同纲领》中。在关于外交承认问题上,第七章重申了中共1948—1949年的政策声明。第54条指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并提出保障中国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重要性。

第55条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处理前国民党政府所承担的条约义务上将是有选择的,而第56条则表明了中国政府就有关相互承认进行谈判的愿望。后面的条款要求外国政府首先断绝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关系,并且要求承认建交是以“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为前提的。周恩来在早期领导外交部所进行的一系列谈判中,都反复强调“平等互利”,这反映了要维护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以反对过去“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特权的耻辱的通商口岸制度的愿望,但这种

表述后来也出现在1950年中苏条约里。

中国对外政策立场上表现出的灵活性被英国人发现了。英国外交部1949年8月就“中国问题”向美国国务卿提出建议：

鼓励在中国出现较少的反西方倾向的唯一希望是给新中国政权以时间，让其既认识到在其克服经济困难上获得西方援助的必要性，又认清苏联帝国主义同中国民族利益有着固有的不相容性。

英国对周恩来10月1日委婉地提出的暂时搁置双方对形势看法上的分歧于一边而先建立“非正式关系”的愿望作出了反应，美国政府对此感到很苦恼。10月5日，英国作出的和解性答复引人注目地没提到关于英国在中国获得外交权利的任何正式先决性条件。美国只是在10月11日才收到英国答复的文本，而且更令美国吃惊的是，英国进一步于1950年1月6日从法律上正式承认了新中国。美国作出的反应不仅是拒绝承认，而且更肆无忌惮地四处活动，以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在联合国中的席位。美国政府在采取一项最终表明是徒劳无益的遏制政策，而这时的中国人却去了莫斯科，同斯大林就友好条约进行谈判。

中国的“自力更生”与中苏同盟

斯大林承认了北京新政府，不过他对毛泽东和中国革命仍疑心重重。回想往事，毛泽东说，事实上他领导的中国革命

的胜利是“通过违反斯大林的意志”而赢得的。他说：当我们的革命取得成功时，斯大林说我们是冒牌货，我们没和他争。而一旦我们打抗美援朝战争，我们的革命（在他的眼里）就成为名符其实的了。毛后来在一次党的会议上说：“我们想签订一项中苏睦邻友好条约，但他不想签。我们要求归还中长铁路，他也不愿放弃它。不过，还是有办法从虎口里得到一片肉的。”

毛亲自去莫斯科是冒了很大风险的，因为他对斯大林的慷慨大度没有把握。在途经正值寒冬的西伯利亚的时候，他病了。他的列车于1949年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车站的欢迎仪式极其简单，随即毛就被带到斯大林的一间郊外别墅去恢复健康。

当日下午6点，斯大林亲自率领苏共政治局全体成员欢迎毛泽东。斯大林勉勉强强的宽宏大量里透出一丝冷淡，他说：“你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而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斯大林似乎是指过去就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问题同中国人所进行的争论。他对中国的“指导原则”有怀疑，他担心“……中国会走‘南斯拉夫道路’”。北京的新政府里包括了其它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这使斯大林怀疑中国的政治发展会不会转向“亲英和亲美路线”上去。

在一座不太相宜的破旧的大都会饭店里，毛泽东设宴宴请斯大林，以回报对他的欢迎。宴会还是“针锋相对斗争”的另一种机会。他到达莫斯科两周后，塔斯社透露，毛坚持呆在莫斯科，直到他在“对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问题上”获得满足时为止。不过，毛避免自己直接参与起草友好条约，声

称这是政府间的事，要由周恩来和苏联外长维辛斯基来进行实成性的谈判。

毛去列宁格勒进行了一次观光游览，返回时正好迎接1月20日到达莫斯科的周恩来。在莫斯科火车站上，周发表了一个简短演说，既提到了“斯大林元帅正确的国际政策”，又提及了毛泽东主席坚定不移的“与苏结盟”的方针。

苏联人对周的戒心可能较少一些，因为周曾一度在莫斯科享有很高的声望。在他同维辛斯基的谈判中，助手有王稼祥——他后来成为中国驻苏大使、李富春和叶季壮。伍修权 and 赖亚力负责文件和有关资料的准备工作。根据伍修权的叙述，条约最初的文本是由苏方草拟并提出的，这点和毛的说法是一致的：

1950年，我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争了两个月。在相互援助协定、中长铁路、合营股份公司和边界等问题上，我们采取了两种态度：一种是当对方提出建议而我们不同意时，我们就争吵；而另一种是，如果他们一步不让，我们就接受他们的建议。这是出于对社会主义共同利益的考虑。

对苏方提出的条约文本，斯大林不愿意作大的更动，但周还是谨慎而细心地逐条、逐句、逐字地斟酌、推敲、修改。作为一项军事同盟条约，其意义包含在关于双方有义务反对未来日本在亚洲的任何侵略的第一条里。周坚持这条的用词要强烈一些，因此，在“……签约的另一方得以援助”的字词中将“得以”援助改为“即尽其全力”给予援助。

与友好条约同时谈判签订的还有关于租赁和管理长春铁

路、苏联在大连和旅顺的军事基地以及苏联人在北京和东北控制的各类财产等协定。对周来说，这些是主权问题，但苏联方面争论说考虑到美国正在重新武装日本并且对日和约谈判又前途未卜，所以，苏联保留东北的这些防御设施十分重要。因此，有关中长铁路和苏联在东北的军事设施的协定规定可以继续维持现状，但不得晚于1952年底。

苏联人说他们继续管理东北的设备将有利于中国，因为中国缺乏经营管理和技术能力，但很显然，对苏联来说经过长春铁路到符拉迪沃斯托克要比用他们自己的远东铁路方便得多。

根据第二项协定，苏联将向中国提供一笔总数为三亿美元的贷款，年利息为百分之一，中国利用此项贷款购买苏联的机器设备及其他器材。数额并不惊人，这也许只是毛泽东希望得到的十分之一。第三项协议是有关各类财产问题，这些财产都是苏联在东北和华北从日本人和清朝政府手里获得的。这个问题很敏感，因为中国对苏军“掠夺”东北的工业设备的行为记忆犹新。苏无憾地将这些财产移交给中国，以此显示出他们为时已晚的慷慨大方之气概。在1950年2月14日友好条约及其附属协定签字仪式上，周发表了讲话，他突出强调了中国人民对斯大林元帅这种友好表示的兴奋之情：不过他没有提到中国是否接受外蒙古的独立。

中苏谈判进行得十分艰巨，但这些谈判为周恩来提供了增强新中国作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新地位的一次机会。周在条约措辞中突出了“平等互利”原则，而苏联领导——尽管他们有所保留——还是承担了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义务。

条约中包含了一条关于中苏新关系原则的特别声明，这一点看来很重要，这是苏联在处理与东欧国家关系的措辞中所没有的，它尤其突出在“平等”词语的运用上：

缔约国双方保证以友好合作的精神，并遵照平等、互利、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及不干涉对方内政的原则，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与文化关系，……

这种措词与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应以互相利用的、平等的自愿交往为基础的观点是一致的，它是1953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出的先声。

对中苏签订友好条约，美国人是以对华实行禁运和封锁来作为答复。但不管怎样，中苏条约还是使中国新政权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国际声望，它使西方关于苏联控制了中国东北的谣言不攻自破。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在1月12日对全国记者俱乐部的一次讲演中曾说：整个地区，包括满洲、外蒙古、蒙古和新疆，从中国“分离”并且“归附”苏联，这“在任何外国同亚洲的关系中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最重要的实际问题。”艾奇逊的这个说法与他在3月15日的第二次讲话中将中苏条约看作是共产党中国依赖于苏联的象征的看法是一致的。3月20日，周恩来辛辣地揶揄了艾奇逊这种想当然的假设，认为他这是在找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以“欺骗一部分对于美国侵略政策还缺少经验的人们”。

中苏谈判很值得研究。周恩来的助手伍修权后来写道，当时的中苏关系在总的方面是以社会主义团结原则为前提的，但也存在着“矛盾”，“当时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总的方面是

平等互利的，同时也是既讲友好又有矛盾，既讲团结又有斗争的”。

中苏经济关系的细节性谈判从1950年2月到4月继续在莫斯科进行。3月27日签订的协定有：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工作条件的有关规定和关于在中国新疆创办中苏合营石油公司和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以及民用航空公司的协议。周的谈判代表们在中苏新贸易关系细节问题谈判上颇费周折，苏联方面的谈判负责人米高扬讨价还价得很厉害。在货币协议上他们无法取得进展，因为苏方十分不合理地将卢布对人民币的比值定得过高。当然，公开发表的声明还是热情的，大肆宣扬了中苏间永久的、牢不可破的社会主义兄弟友谊；不过，中国的谈判代表们对苏联的信誉感已大大打了折扣。

同斯大林达成协议，在美国人看来并非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摆脱了危险。中国领导可能错误地以为中苏条约将建立一个更为安定的环境使得他们可以专心于国内“经济恢复”工作。杜鲁门1月5日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将不再承担防卫台湾的义务。这项声明对亚太地区战略形势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中共正集中注意力于解放台湾，甚至将它作为最为优先考虑的事情，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提出了一项军人复员方案。

朝鲜战争与中国的“自力更生”

一般认为，毛泽东对北朝鲜1950年6月的计划事先并不知道。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这令中国人大吃一惊。

当时，中国人正忙于准备进攻台湾，而杜鲁门得知朝鲜半岛爆发了战争后就完全改变了他1月5日声明中表明的中立立场，并且命令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制止中共计划中的攻台方案。

周和毛极其严肃地关注着朝鲜半岛军事局势的发展。联合国军投入朝鲜半岛直接威胁了中国东北工业腹地的安全，而当时新政权对日本重新武装以及国内外对西藏解放发出的威胁又十分敏感。6月28日，周发表了一项声明，谴责杜鲁门下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行为，认为这乃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周同时进一步敦促联合国接受其政府在联合国的中国席位。8月20日，他请求马立克以安理会主席的身份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关于朝鲜局势问题的讨论。8月26日，他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向他提供了参加联合国大会的中国正式代表团成员名单。代表团将由张闻天率领，成员包括李一氓、周士第、孟用潜和冀朝鼎。随后，周于8月30日打电报给联合国安理会控诉美国侵犯中国满洲领空。9月8日，中国在一篇广播中坚持联合国安理会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安理会关于美军在朝鲜问题的讨论。

新中国建立才仅仅一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被卷入了一场国际危机，这场危机威胁到了刚刚赢得的解放战争的胜利。遭受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急需重建，党还得深入到广阔的“新解放区”去进行组织工作，正当这时，却突如其来地出现了战争。

麦克阿瑟重新夺回汉城，北朝鲜军队迅速溃败的局势引

起了中国共产党内短暂而激烈的争论。

毛泽东来回踱步了三天三夜，考虑着最后的决策。他最后决定赞成干涉，而党内那些不赞成干涉的人认为，干涉会打乱国内经济复兴。《人民日报》在解释这项决定时说：

如果我们竭力避免敌人进攻的任何借口，利用这个空隙来进行和平建设不是更好吗？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以为已经发起了进攻的敌人会允许我们有和平建设的时间和环境，……

周作出的外交反应是可以想象的。从战争宣传的角度上看，他的外交行动体现了这样的观念：“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另一方面，在同国民党打交道的过程中，周就强调“说到做到”的重要性。在政治混乱的危急关头，说话算数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是最好不过的了。

作为总理，周出于现实主义的考虑需要集中注意力去争取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加快“经济复兴”的步伐，但要他让麦克阿瑟欺负中国的软弱这办不到，“不能听任帝国主义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同美国作战可能付出的代价周十分清楚，但他支持毛的立场。他提醒他的干部们说：“如有必要，我们必须作好从沿海省份撤到内地的准备，并把西北和西南变为筹划一场持久战的基地。”

尽管如此，周还是进行了最后的外交努力。在当时形势下，缺乏国际承认是极其令人沮丧的不利条件。10月3日，周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他奉告说，中国将立即介入朝鲜战争。但他暗示有调和的可能，中国表示如果美国军队——将

其与南韩军队区分开来——越过三八线，中国就一定要管。

印度驻北京大使潘尼迦充当了中国同美国接触的外交渠道。有关中国立场的信息从他这里通过印度外交事务总秘书吉伽·巴杰帕伊爵士传到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劳氏，然后再传到美国人那儿。周的这项重要的预先警告也传给了英国在北京的外交使节。对周传出的信息华盛顿无动于衷。

美国人往往用冷战观点来分析中共“战略上藐视敌人”的思想。他们很容易将警告当作是种宣传而置之不理。美国人还对印度的外交有怀疑，认为它承认了“红色中国”，而且潘尼迦大使在华盛顿被看作具有同情中国共产主义的思想。另外，潘尼迦就在最近还说过中国不会卷进朝鲜事务。

杜鲁门总统将周恩来的警告当作是一次宣传企图，想影响联合国正在进行的投票。美国军事情报则推测中国的介入是不可能的，它分析说，中国共产党人害怕同美国交战，中国国内相应的反共势力正在发展，中国在联合国的外交努力相继失败，以及如果介入战争的话将有可能依赖苏联的援助并且将使满洲的控制权丧失给斯大林等等。

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使杜鲁门极为震惊，在他的私人信函中，他大骂“常胜将军”麦克阿瑟，1950年10月麦帅在威克岛向他狂妄地保证过，说中国人决不敢出兵。周恩来说到做到，但他并没有通过向美国正式宣战来扩大战争，而派遣志愿军入朝也回避了行使中苏友好条约第一条义务的必要性。正如在下列美国情报报告中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未给斯大林施加采取行动的压力：

苏联人……认识到，……正是中苏同盟才给苏联提供了一种左右为难的选择：要么任北朝鲜政权失败和毁灭，要么公开地动用苏联军队进行干涉——而这样一来，苏联认为很可能导致世界大战。

中国人自己对中苏友好条约能否制止美国考虑入侵中国大陆也不是绝对地有把握，而这种行动在美国外交和情报界被普遍地假定作为一种仅有的选择。不管怎样，美国在积极考虑支持中国内部“有生的”颠覆中国政府的游击战争。^{*}

周恩来推迟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但在50年代早期，他还是谋求保持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完整性，这使得工农业生产恢复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当卷入朝鲜战争使得许多珍贵的资源被用到了新的战争上时，战争引起人们重新重视在迅速发展的与战争有关的群众组织和运动中出现的爱国主义，而私人企业在“五反”运动中通过合营化过程被更快地强力夺取。作为总理，周不得不作出保证，就是在战争时期，政治强化和“经济恢复”工作也是在继续进行的。作为外长，对国外的批评他据理驳斥，如艾奇逊，他认为朝鲜战争将恶化已处绝境的中国国内经济和政治局势。

周不愿美国妄议中国的经济事务，也不愿美国妄加理解中国谋求地区和平环境的愿望，他们认为，这种愿望表明中国

* 当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告诉英国大使，美国将不促动联合国发起“一场反对大陆中国的游击战或颠覆的运动”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却提出“向中国国民党有生的游击力量提供所有的秘密的实际援助”。——原注

愿意为此而作出重要的战略妥协。在一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年的情况报告中，周说：

很明显，中国人民在解放自己的全部国土以后，需要在和平而不受威胁的环境下恢复和发展自己的工农业生产和文化教育工作。但是英国侵略者如果以为这是中国人民软弱的表示，那就要重犯与国民党反动派同样严重的错误了。*

敌人的确在战略上被“藐视”了，而且“前车之鉴”也清晰可见了；不过，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25日的介入使之在联合国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冷战一个劲地向东亚扩展，这使得争取更广泛的外交承认、建立新的外交部的一切工作更为艰难。正当联大在进行紧张交涉之际，中国人民志愿军向北朝鲜的最初推进突然单方面中止了。一些分析家对这点作出的分析是有点道理的：中国领导象征性地“打了警告性的一枪”以考验一下美国的决心，并迫使美国政府对麦克阿瑟提出的对北朝鲜发动全面攻势的建议进行重新考虑。

安理会的辩论出现了端倪。还在周恩来发出警告之前，联合国安理会就于9月29日决定同意邀请北京政府在10月15日以后的某个时间就美国及其在台湾的地位问题提出陈述。美国在台湾海峡部署第七舰队，以及美国飞机可能是误炸了朝鲜—东北边界这两件事可能给中国提供了一些宣传上

* 引自周恩来《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参见《周恩来选集》下，人民出版社，第13—14页。——译者

的优势，他们可以以此来断言美国在朝鲜的潜在意图是为了下一步对中国共产主义新政权发动进攻。

1950年11月8日，联合国安理会接受了英国的一项提议：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派代表来讨论麦克阿瑟关于中国介入朝鲜问题的特别报告。英国方面甚至提出了一项在北朝鲜建立一条缓冲带的可能性建议。周拒绝了这项邀请，说联合国在朝鲜的地位是“非法的”，但他接受了9月29日关于参加讨论美国和台湾问题的邀请；他派遣伍修权作为特别代表前往纽约。

杜鲁门1月5日的立场和周恩来将朝鲜和台湾局势联系在一起为中国试图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争取道义上的优势提供了机会。伍修权在安理会上重申了作为“代表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权利。他对安理会作出的议事日程安排感到不满，“控诉武装侵略台湾”案由于美国在程序上要花招而“形式不完整”。伍修权预示，没有中国“合法”代表的参加，联合国不可能“解决任何重大问题，尤其有关亚洲的问题”。伍然后警告联大不要将台湾移交给联合国“托管”。

根据周的指示，伍修权将朝鲜局势同美国“侵占台湾”紧密联系了起来，突出强调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协定”和杜鲁门本人1月5日声明中国应得的合理要求。美国说什么由于没有签订对日和约而使得台湾地位未定，伍认为这是十分“荒谬而滑稽可笑的”。伍严厉地提请人们注意美国“最高司令部”的下列观点：“在台湾问题上持坚定立场”将有90%的希望阻止中国的入侵，“……因为中国人尚未准备好同美国力量

进行面对面的较量……”。中国领导很反感将其立场看作是由于恐惧和软弱激起的。至于美国方面声称美国采取的行动是为了保护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伍反驳说：“到底是中国的武装力量侵略了美国的夏威夷，还是美国的武装力量侵略了中国领土台湾？”伍为美国声称它“未曾侵略中国的领土”感到奇怪，他反问道：“好得很，那么，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

实际上，是中苏友好条约才使得美国不敢将战争扩大到中国大陆的，但这不一定是北京方面的看法。当时，印度外交人士竭尽全力向美国方面解释中国的动机。外长巴杰帕伊向美国方面转达了潘尼迪的看法，认为中国领导很敏感地相信，美国已继承了日本军国主义的衣钵，通过在朝鲜和台湾建立滩头堡来对中国进行侵略。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劳氏还向美国方面表达了他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人确实担心美国企图“将他们的新生政权扼杀在摇篮里”。

12月14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决议，决定成立“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成员包括五届联大主席纳斯诺拉·安迪让（伊朗）、莱斯特·皮尔逊（加拿大）和贝内格·劳（印度）。由于印度不愿显得太过于接受美国对小组的影响而损害中印良好关系，而美国又想通过一项联大投票表决以标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朝鲜的“侵略者”，这使得达成一项为大家所接受的原则声明十分困难。中国的外交使团强调，任何停火建议都必须伴以重要的政治协议。军事和政治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

* 见伍修权《在外交部八年的经历》，世界知识出版社，第55页。——译者

无疑使周恩来想起了40年代重庆谈判的艰难。而在这里，中心问题是美国在玩弄“先停火后谈判的诡计”。

1950年1月17日*，周恩来复电“朝鲜停火三人委员会”，指出任何形式的停火都得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和正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谈判同时进行。周并没有对联合国没提到中国的合法代表地位就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而耿耿于怀，他直接了当地指出：

先行停战的目的，只是为美国军队取得喘息时间。因此，不管谈判的议程和内容规定得如何，如果不先行谈判规定好停战条件然后停战，则在停战后再举行谈判，可以无休止地讨论下去，得不到任何问题的解决。 **

正如所料想的那样，周坚持，这类实质性谈判必须将美国从台湾撤出的问题包括在内，但他进一步建议在中国举行美、法、苏、英、印度、埃及和中国七国会议。印度外交使节向英国人指出，周1月17日电报中的立场显示了某种动向，周在其早期关于朝鲜内部问题应完全由朝鲜人自己来解决的立场上已有所松动。周主张召开一次七国会议，这更广泛的会议中甚至包括了一些与“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协定”中有关规定没有关系的国家。

印度总理尼赫鲁本人也帮助从中调停，他呼吁周恩来作

* 应为1951年1月17日。——译者

**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二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译者

出声明，表示愿意立即举行不带先决条件的谈判。而周1月28日答复说，在目前联合国大会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提案悬而未决的情况下作出这样一个声明，这无疑是在联合国对我们作出的无理的诬陷性指责面前的一种软弱表现。

第五届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于1951年2月1日以44票赞成、7票反对、9票弃权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案。2月2日，周就此发表声明，严厉驳斥这项决议案。所倡议的七国会议只得胎死腹中。在提到中国1月17日的建议没得到应有的反应时，周再次指出，联合国大会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参加，而且在僭越安全理事会权限的情况下通过这项决议，它理所当然是非法的。周知道，由于这项决议案在安理会遭到了苏联的否决，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就转向由联合国大会来通过，在联合国大会上亲美势力占了上风。周引用印度代表对联合国大会第一委员会辩论的描述，说他们是“不停火，不谈判，也不和平解决”。

美英倡议起草对日和约更进一步增强了中美之间的敌对情绪。从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得到和约草案的一个副本后，周于1951年5月22日向苏联驻华大使罗申递交了一份照会，指出中国对草案的看法和苏联的看法“完全”一致。由美国发起的这项对日和约公然违背了波茨坦协定中已达成的关于由美、英、苏、中和日共同缔结对日和约的国际协议。新和约的“中心目标”不是别的，而是要“重新武装日本，以便继续和扩大在亚洲的侵略战争”。

周强调，一个独立的日本在亚洲地区和平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一年以后，周又发表了另一项声明，指出，由于继旧

金山对日和约之后，日本和台湾又签订了日台“和约”，所以，旧金山对日和约已更难以接受了，这两项和约共同“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构成了军事威胁”。日台条约显然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地位的挑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发表的声明明确指出，其法律规定将“……适用于现在为人民共和国管辖以及将为其所管辖的所有领土”。

在关于中国参加和约谈判的问题上，日本首相吉田茂倾向于持独立立场，他曾希望推迟完成一项搁置处理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草案。然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却迫使他签订和约，也不顾英国人的反对，英国人将美国在这件事上的“做法”看作是“为了追求暂时的国内政治目标……而不顾在国际领域造成长期后果所表现出的内心虚弱的另一个例子”。

不管感不感到惊奇，在朝鲜停火建议上中苏之间显得几乎没有什么协调。其中有一点令人感到很反常，苏联驻联合国大使马立克1951年6月23日在联合国突然宣布一项新的“停火和停战”建议。在这项建议中，对经常提到的中国将停火与地区政治问题相联系的立场，马立克只字未提。他只是建议，作为“第一步”，交战双方先实行“停火和停战”，以便双方共同撤离三八线。英国最初以为马立克一定事先同中国方面协商过，大概中国方面不愿让人看出同这项建议有公开牵连，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朝鲜战场上的“交战国”。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竭力想从安德烈·葛罗米柯那儿探听出点眉目来，葛罗米柯只是谨慎地解释说，马立克所指是从“临时性的军事停战”方面来说“进入和平谈判阶段”，这样一来，这个地区的军事指挥官们就可以开始议定军事停战——

仅限于军事上的，而不涉及到政治和领土方面的问题。当美国大使柯克要求解释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时，葛罗米柯毫不隐讳地说他还不知道中国政府对马立克声明持什么态度。他说，如果美国想打听清楚的话，可以去问中国。

就是到今天也还是不清楚苏联人是怎样、何时向中国人提出这个问题的。不管怎么说，这项倡议很及时。4月11日，麦克阿瑟——他在中国家喻户晓；他想将朝鲜战争推进到中国东北——突然被解职，这戏剧性的行动是对杜鲁门1951年1月4日声明的进一步确认，在那项声明中他宣布，未经美国国会和联合国的同意将不对中国大陆的任何地方进行轰炸。与此同时，朝鲜半岛军事局势又大致恢复到了中国军队最初介入时的状态。敌对双方盘踞在三八线一带呈胶着趋势，这条线直到1950年1月一直平静地为双方所对峙，当时中国方面警告美军不要越过的正是这条纬线。

马立克倡议令人感到意外，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指中国传媒对它作出的反应太缓慢，直到7月3日中国方面才切实考虑这项倡议的实质性内容。不过，《人民日报》6月25日发表的社论基本上还是表示支持这项倡议的。社论主要针对美国军事指挥部有无能力保证李承晚接受停战要求这个问题。也许正如美国驻苏大使所说的那样，马立克在试图“施巧计”为中国介入朝鲜遭遇的困境解围。葛罗米柯作出的解释中的“交战各方”包括了“中国人民志愿部队代表”，美国将军奥马尔·布雷德利认为这是一种让中国人“保全面子”的方法。

伍修权根据他在莫斯科的亲身经历曾说过，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利益有总的一致性，但也存在着“矛盾”。在朝鲜战

争期间，中国政府不得不在朝鲜负担比苏联大得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中国处于反美“第一道防线”，而让苏联“处于第二防线”，这是被中国所接受了，他们认为这对于避免一场全面战争和美国可能的核子报复是有必要的，但苏联运往朝鲜战场的军火太少，中国对此感到很不满。斯大林是中国的盟友，而友好条约也是个必要的威慑因素，但斯大林显然拒绝给予中国大量的武器，否则，中国很有可能在朝鲜战场上获得对美军的决定性的胜利。

中苏之间的“矛盾”还在于中国对北朝鲜党的渗透远胜过苏联，以及毛泽东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日隆。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理论所作出的贡献已成为印度共产党内在《印度共产党宣言》问题上发生争吵的诱因。中共主要的理论发言人陈伯达在1951年6月甚至声称，毛泽东的“中国革命理论”是东方革命经验的结晶，它具有“普遍的意义”。莫斯科的理论家对此作出了反应，告诫不要将中国革命当作“僵化的制版”和有害的“偶像”。

北京介入朝鲜战争所付出的代价要比莫斯科付出的高得多，但在后来讨论有关朝鲜问题、制定有关政策和战略决策方面中国理所当然地拥有较多的发言权，而且作为他们在战争中作出牺牲的结果，他们在亚洲共产主义事务中有着相当可观的影响力。

中国在朝鲜尽了他们的本份。英国驻北京的高级外交官意欲向美国方面详细说明中国政策形成的潜在动机。他们认为，中国的愿望是在亚洲扮演一个更为重要的角色，而他们基本的着眼点却在于国民经济建设这个国内事务上。在谈到这

两点时，约翰·哈钦森爵士再次提到了早期迪克西观察组曾有过的一些远见卓识。中国领导人取得革命的成功并没有受到苏联多少重大的恩惠。他认为，中国领导人的确自我标榜为马列主义者，但在另一方面，他们一点也没有依附于苏联领导的打算。和美国人的看法相反，哈钦森觉得苏联在北京的影响并不明显。

哈钦森分析得很得体。作为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懂得，“一边倒”并不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苏联对自己国内事务也自顾不暇，他们没有充分的物质能力来帮助重建中国的经济。他们的影响力主要集中于中国的大规模基本建设方面，但是，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苏联的影响力就不平衡地分散到了经济领域几个目标上去了。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在西方冷战宣传中被大大夸大了。不管怎样，中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依靠着自己的国内经济资源和组织经验。

在1961年10月23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三次会议上做的政治报告中，周恩来对他的政府的对外政策作了总结。他将中苏友好条约看作是反对试图将世界投入到全面战争中去的美日和约、美—日双边军事协定、美国—菲律宾防御条约和1951年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三边安全条约，他警告美国不要试图利用朝鲜局势所造成的紧张来扩展其遏制政策。尽管如此，他还是乐观地认为，美国对盟国所承担的沉重军事负担将有助于“帝国主义阵营”内部裂痕的产生。周欣喜地发现，美国 and 英国统治集团之间的裂痕正在出现。他再

次指出，新中国首要关心的是为复兴中国经济和社会而斗争。周表示拥护和平共处，“……我们认为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关于朝鲜谈判，周指出，“马立克先生的倡议”和“世界舆论的压力”已迫使美国走向板门店进行停战谈判。他再次谴责美国控制联合国，他指出，联合国已“……成了美帝国主义的一个工具”。周相信，1951年5月18日联大通过的、由美国一手策划的关于中国“侵略”了朝鲜而对中国实施禁运的决议案已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当时，中国外交部不仅反对这项将中国的合法代表排除在联合国安理会之外通过的决议案，认为它是“非法的”，它同时还将“帝国主义”概念作了延伸，因为美国政府为了“美国武器商”的利益，妄图通过取得对原材料的垄断来“打乱世界市场的正常关系”。

在10月23日的报告中，周指出：“帝国主义者的‘封锁’和‘禁运’，正好被我们用以……缩短我们在经济上获取完全独立自主的过程”。周强调了他将来外交的重大主题，那就是：亚洲自决和独立。

朝鲜停战谈判无限期地拖延常常归咎于斯大林拒绝作出让步，但有的分析家认为中国的立场“令人费解地起着反作用”，它顽固地坚持继续打下去而不顾这场战争会使中国经济建设付出多大的代价。这种看法还认为中国“屈从”了斯大林。要是中国方面认识到了马立克的最初倡议有意回避了潜在的、难以处理的原则性问题的话，它就不会显得这样固执了。

而美国方面则通过战俘自愿遣返问题使得谈判进一步复杂化——战俘自愿遣返是一个对中国主权和社会主义正统性

提出重大挑战的问题。朝鲜问题大体上一直对中国的主权问题有着非常特别的含意，因为它涉及到国际社会在联合国对中国承认的问题。在致联合国大会主席莱斯特·皮尔逊的一封信中，周恩来对由印度提出而得到美国支持的决议案的合法性提出异议。他声称，授权给一个扣留战俘的国家，让它采用强制手段不让个别战俘返回自己的祖国，对此在日内瓦公约中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按照周的说法，被俘“战士”受到“他们的敌人的强制处置”，所以任何代表他们表示本人抗拒遣返的声明都是在“敌人”的操纵支配下作出的。由此看来，美国坚持的“自愿遣返”是荒唐而不可置信的。

当板门店谈判在战俘问题上陷入僵局时，中国不失时机地抓紧国内基本建设。周恩来于1952年8月再次赴苏联，而苏联又一次表明了它们十分困难。周好不容易使苏联方面作出了一点点让步，包括发表一项联合公报，该公报发表于9月15日，宣布将长春铁路移交给中国。公报还宣布苏联继续使用旅顺港的海军设施。周后来指出这是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延长使用的，以此来作为反对美国对中国东北发动进攻的保障。

1952年12月31日，周在哈尔滨签订了将苏联在中苏联合管理长春铁路中的权力移交给中国的最后文件。周称赞苏联的慷慨行为是“完全新型”的国家间关系的表示，在世界外交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在中国转向五年计划并从“经济恢复”时期过渡到“大规模基本建设”时期的过程中，苏联给予中国的援助几乎微不足道。

1953年2月4日，周恩来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届四次会议作报告，他再次驳斥了美国关于中国对朝鲜的介入

延缓了中国国内社会改造和经济复兴计划的宣传。他还谈到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这个论题。他重申了1948—1949年宣布的对外政策：“凡是愿意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发展贸易关系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是不会予以歧视的。我们相信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

在谈到美国阻碍朝鲜谈判问题时，周根据正在变化着的国际关系格局，对外交政策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以便统一战线的“两手战略”得以灵活运用。他概括地论述了美、英和法帝国主义之间在亚洲和非洲的矛盾，并且谴责了美国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企图。周和毛一样辛辣尖刻。对美国肆无忌惮地进行“新武器试验”，他猛烈地予以抨击：“他们的两颗原子弹正是投在亚洲的，他们的第一批细菌弹也是投在亚洲”。至于朝鲜局势，周再次斥责了美国在联大控制投票，篡改印度提出的“自愿遣返”提案，然后塞给联大投票表决。

接着在3月份，周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周受到了极高的礼遇，在执绋人中，他是唯一的非苏联人。苏联领导集团中的权力竞争者们都希望能得到毛泽东的佑助，他们都充满了对毛泽东的尊重，但毛没去莫斯科。他仍对1949年底的莫斯科之行有着辛酸的回忆——这次访问至今尚未得到苏联高级代表的回访。既然毛在斯大林生前可能与他有齟齬，那么在他死后送灵上，毛就可以摆摆架子了。不过毛还是称赞约瑟夫·维·斯大林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

在苏联新领导对事情不大清楚的情况下（但也许是受到了苏联人的支持），周恩来于3月30日发表了一项声明，打破

了朝鲜停战谈判中的僵局。根据朝鲜停战协定第三条规定，周作出了让步。这样一来，未宣布同意遣返的战俘将交由中立国家监督委员会处理。

朝鲜敌对行动的停止和斯大林的去世，标志着中国外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周恩来的外交虽然未能使得朝鲜停战和更广泛的地区政治问题直接联系起来，但毅然参加朝鲜战争重振了中国的声誉。中国对美“帝国主义”作出的反应包含有外交和实力的复杂关系，但中国的确以公认的亚洲强国的身份出现了。中国当代编年史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从根本上说不可能妥协于“一边倒”方针，这一点总的看来是正确的。

周恩来已开始着手创立一种新型的外交风格，它着眼于列宁的社会主义国家间非相互利用关系的理想主义观点；然而，对在同苏联谈判中出现的明显的“矛盾”，他却又能作出现实主义的反应。尽管美国竭力对华进行遏制，周还是在冷战的亚洲砌起了他的“新炉灶”。

三 “和平共处”与日内瓦—— 万隆会议

中国人民志愿军介入朝鲜战争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地位大大加强。中国外交使团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成为举世注目的焦点。周依靠外交手腕迎击了来自于由美国在背后撑腰的国家的威胁。由于他在日内瓦的出色表现，他在亚洲赢得了巨大的个人声望。1955年春，世界的注意力又再次集中于周恩来在万隆施展的干练的外交手腕。在万隆，他成功地将中国的解放和亚洲的民族独立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粉碎了冷战遏制阴谋。

美国的盟国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参加有关朝鲜停战问题的“政治会议”的谈判，美国要加以阻止很困难。在答复柏林四国（美英法苏）关于召开一次朝鲜和印度支那问题会议的协议中，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指出：“我们坚持拒绝给予它任何地位的提法，也拒绝给予它任何威信和声望的增加。”实际上，1954年2月19日的柏林公报授权召开日内瓦会议讨论恢复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和平，公报包含有明确的防止误解的声明，确定邀请参加或举行会议本身并不能被“认为意味着尚未给予的外交承认”。杜勒斯拒绝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五大国”中的一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作为一个“被邀请”而不

是“邀请”国参加会议。这样一项否认在周恩来在会上所起的中枢作用面前显得黯然失色。

杜勒斯成功地将一些中立国排除出了会外，但用这种方法对付周恩来无济于事。在这次多边谈判中，周出色地发挥了他的长处，将英国和法国的现实主义同美国遏制政策坚持的强硬的意识形态区别了开来。最后，关于朝鲜问题最终达成的更大范围的决议还是婉转地提到了周所起的作用，尤其因为美国在联合国的盟友不准备接受在政治解决中降低联合国的作用的做法，周的外交使美国在亚洲处于守势。周在朝鲜问题会议上提出的最后建议的失败使他个人感到很沮丧，但在朝鲜问题会议结束后的几天里，周却比莫洛托夫先一步，掌握了在印支问题会议上的主动权。尽管杜勒斯耍尽了拖延的花招，周还是使会议达成了停火协定和关于印支问题的决议。不论是在谈判会场里面，还是在外边，周的外交构成了有效的统战攻势，这种统战攻势谋求亚洲的“中立主义”和他的“和平共处”的马列主义观点相结合。

举行这个会议其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1953年7月27日，各交战国签订了朝鲜停战协议，协议里含有一条重要的但不明确的条文，拟定举行一次“较高级”的政治会议。中国在举行这类政治会议上的立场表现于周9月13日给哈马舍尔德^{*}的电报。周对美国坚持举行“两边”会议的立场提出抗议，认为这样的会议将使会议桌两边交战双方隔桌对抗。周支持联大作出的邀请苏联作为“中立国”参加计划中的会议

* 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译者

的决议，但他主张召开“圆桌会议”，这样就可以包括诸如印度这样的关心此事的“中立国家”。南朝鲜非常担心同共产党政府举行的任何谈判，在联大辩论中它竭力反对“圆桌”会谈，它指出，过去的经验表明，共产党可以在谈判中操纵“居中调解的各方”。

周强调的中立，是对非交战者而言的，这一点在随后举行的谈判中表明非常重要。周可能是希望避免召开一次能将联合国当作同中国交战的一方的会议。然而，联合国军事干涉朝鲜和它通过的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列为“侵略者”的决议案使得在朝鲜实施国际监督的方案变得复杂了。就中国方面看来，作为美帝国主义在朝鲜的军事扩张，联合国的所作所为本身就是“交战的一方”。联合国至少算得上是一个靠不住的——不说怀有敌意的话——论坛，它一直拒绝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

正在蓬勃兴起的向“中立化”发展的民族解放倾向有利于中国积极参加国际谈判。周恩来对印度的“中立主义”尤其感兴趣，这可以从印度参加了有关朝鲜停战和战后问题的谈判这种不寻常的方面来进行解释；不过，周也还广泛地对整个地区性的协商感兴趣，这将获得更多的机会使得作为“中间势力”的“中立国家”相互作用。

甚至于还在斯大林逝世之前，早在1953年2月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作的报告中，周就宣布了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和平共处”原则。后来，“中立”的印度成为中国向美国的遏制政策进行挑战的外交实践的关键。周的秘书和翻译浦寿昌叙述说，周第一次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在1953年的

除夕会见一个印度代表团的时候。当时周声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这五项原则事实上就一直指导着中印关系。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中国同印度签署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议，这是在一项国际协议中第一次显著提出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周不赞成联合国在朝鲜承担集体安全义务，反过来突出强调“中立国”的国际作用。在日内瓦朝鲜问题会议上，周自始至终拒绝接受由联合国——它尚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在朝鲜扮演监督的角色。

举行日内瓦“政治会议”是1954年1月25日至2月18日在柏林举行的“四国会议”期间决定的。英、法、美当时完全一致地拒绝了苏联提出的签订“全欧集体安全条约”的建议。不过，在美国的盟国中间，缓和亚洲紧张局势的期望在增长。法国想从印度支那日益艰难的军事困境中脱身。英国看到了由大英帝国向英联邦转变的趋势，并且接受了“科伦坡国家”关于亚洲民族独立的请求。

杜勒斯勉强同意召开一次关于朝鲜和印支问题的会议，会议将包括作为“被邀”国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杜勒斯还私下偷偷向南朝鲜发出了邀请。但南朝鲜不相信杜勒斯是否真的“在柏林赢得了一场巨大的外交胜利”。杜勒斯写信给李承晚总统，认为从他正在进行的“组建印度支那坚强的反共前线”的努力来看，参加这次会议十分重要。但早产的日内瓦会议将损害他为建立这条“前线”争取盟邦的支持所作出的努力。

在日内瓦，由于不首先给予外交解决以机会的情况下，英国人不愿意加入新的地区集体防务组织。不管怎样，中国出席日内瓦会议给杜勒斯带来了极度的不安。前来参加这第一次国际性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有200人，由周恩来率领，而苏联代表团成员为160人，北朝鲜代表团为60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范文同到达日内瓦时几乎无人注意，但周恩来4月24日下午4时到达机场时却轰动了整个新闻界。

中国驻瑞士领事温朋久在城外七公里的韦尔苏士一座庄园为代表团的领队安排了极为豪华的膳宿设备。从中国国内运来了价值连城的古董和家具陈设品，以装点华贵的房间和走廊。在国内一直主张生活节俭的周恩来，这时也遣权达变，以此适应国际社会的关注。

4月28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当杜勒斯发表讲话时，中国代表团要求发言，然后周恩来第一次登上国际讲坛发表了一个小时的演说。周强调亚洲国家和平和自由的愿望。他抨击了美国在亚洲建立集团政治的企图，将它描述为亚洲独立的最大障碍。他还阐述了他的政府在国民经济重建和伟大的社会革命中取得的成就。

在概述他的国家执行的对外政策时，周抨击了美国视中国为“侵略者”的做法。他的概述（见下文）是后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公式的雏形：

中国政府和人民一贯主张和平，反对战争。我们没有侵略别国，我们将来也不会侵略别的国家。我们尊重其它国家人民摆脱外来干涉、选择和维持自己生活方式和国

家制度的权利；我们同时也要求其它国家对我们也采取同样立场。*

周以中苏关系为例，认为中苏之间的友好合作就是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的。

亚洲的独立是朝鲜问题初期讨论时的主要议题。周4月28日讲话的剩余部分谈到了亚洲独立的问题。周坚持认为杜勒斯的讲话是和亚洲的繁荣直接对立的。杜勒斯头一回不得不同中国人在国际论坛上迎头相撞，对周的初次发言他岂只是感到愤火。4月28日，杜勒斯将他的反应用海底电报发回国务院。一开头他就将周的发言描述为“不仅在词藻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标准的中共死板教条的宣传货色”。他声称，周所采用的方法并不“复杂”，这是“有预谋的在亚洲蛊惑人心的宣传”。在他随后于4月29日发回的文电中，杜勒斯承认莫洛托夫和周恩来的发言“……使我比以前更加感到有这样的可能：美国对印度支那的任何形式的公开干涉都将招致中国公开干涉的还击，从而导致在亚洲的全面战争”。

4月30日，杜勒斯在艾登的别墅同艾登进行了会谈。他告诉艾登，对美国来说不得不去听这样“恶毒”的攻击真让人恼怒。杜勒斯想知道为什么英国还不对共产党的指责进行反击，他率直地告诉艾登他很想“针对共产党的花招去痛击他们一顿，并且支持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地区的民族主义”，但他说他只好克制住自己这么做，以免使英国和法国在殖民地世界

*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译者

感到为难。杜勒斯感到很恼火，因为他怕在日内瓦会议上带来不好的后果，已推迟了与台湾签署相互防务条约决定的作出。

他们两人回顾了在这次会议中关于朝鲜问题双方合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艾登指出了在南朝鲜选举方案问题上的分歧以及制止科伦坡会议国家——包括缅甸、锡兰、*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在印支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困难。

5月1日举行了限制性会议，当周恩来和北朝鲜代表南日轮番抨击美国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时，莫洛托夫泰然安坐。周批评杜勒斯的备忘录缺乏“具体的建议”，没有列出“歧见”。在对北朝鲜提出的在选举前三个月所有外国军队撤出朝鲜的建议进行的紧张讨论中，周同法国外长乔治·比道尔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比道尔在提到周顽固地拒绝承认中国在朝鲜参加了战斗时，挖苦地问道：“既然没有派去中国人民志愿军，那么叫他们怎么撤出来呢？”周避而不答，然后突然要比道尔在他可怜的记忆中搜寻一下，看是否还记得朝鲜停战协议已由联合国司令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双方签订了。此外，周一再告诉代表们：“这次会议和联合国无关”。

周在日内瓦会议上的主要对手是约翰·福斯特·杜勒斯，而联合国问题对坐在会议桌旁各方来说都是名誉攸关的事。杜勒斯继续策划在东南亚建立集体防务体系。尽管在他的盟邦中有一些不同观点，他还是使西方代表团注意中国拒绝承认联合国是保证朝鲜集体安全的力量和政治解决朝鲜问

* 即今日的斯里兰卡。——译者

题进行国际监督的合适机构。

杜勒斯利用联合国问题使得突然终止朝鲜问题讨论变得合理化。在这幕戏中，“中间势力”不打算接受一项将大大削弱联合国道义权力的妥协方案。而且，杜勒斯有他自己优先考虑的事情。他所关心的是李承晚和蒋介石两位总统在反抗共产主义的地区斗争中的作用。杜勒斯拒绝“向李承晚施加压力”，并且正如下列从高度机密的美国日内瓦代表团备忘录节录中表明的那样，支持李承晚和蒋介石最终要比争取欧洲盟邦的姿态更重要：

鉴于我们迫切希望建立一个强大的反共阵地——特别是在印度支那——以及我们很可能还要插足那个地区，而这可能会卷入一场同共产党中国的冲突，我认为遵循这样一条路线很重要，那就是要使我们亚洲的反共盟友保持住信心，而不是让他们看起来我们好像为了赢得西欧国家的支持而在反对他们。

周恩来承认需要某种形式的国际监督，并且他再度强调了他的由“中立国家”参加监督的建设性观点。杜勒斯不想让“中立国家”“乱糟糟地挤在”日内瓦会议上，而他对联合国的支持同美国在联大居优势地位和美国在安理会中享有否决权是联系在一起的。

在5月7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黄华谈到了美国在联合国介入问题上发动的攻势。在回答新西兰外长克里夫顿·韦伯关于周抨击联合国在朝鲜的活动同他希望获得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不相协调的看法时，黄华反驳说：“废除过去通过的非

法决议恰恰是为了维护联合国的声誉……”。黄华说，由于联合国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案作为解决问题的基础已失去作用了，日内瓦会议就不得不“另想它法”。他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完全赞成联合国宪章，1945年，作为中共代表的董必武出席了旧金山会议，并且在宪章上签了字。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的最初发起者之一。

美国副国务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告诫杜勒斯，共产党可能在打算提出一项替代性方案，那就是，作为接受联合国在朝鲜选举中的监督作用的交换，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的申请。而杜勒斯对黄华5月7日的讲话只是将它当作中苏之间在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上观点一致的另一次表示。中苏代表团都在试图“制造共产党中国是一个大国这样的印象”。

杜勒斯指示他的代表团不要怂恿会议就中苏分歧进行推测。也许当他记下这句话时他想到了印度政府：“断言中国政策具有独立性只会使亚洲人怀有妄想，认为与共产党人相比，共产党中国更算是亚洲人吧……”

莫洛托夫想使美国人确信，理解中国人的关键在于他们的亚洲特性。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后来对莫洛托夫说，在会议桌上同苏联人坐在一起要比同中国人坐在一起感到更轻松一些，他认为中国人“毫不让步”，并且缺乏“克制”。莫洛托夫告诉史密斯，中国不仅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国家”，而且“……中国总归是中国，她绝不会成为欧洲人”。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史密斯对中国人的看法发生了变化。王炳南在回忆录中说，史密斯对杜勒斯下的不许同中国代表握手的命令

感到不快。尽管杜勒斯设置了种种限制，史密斯还是向周做出了友好的表示。

贺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并不是像被外界妄加推测的那样是一种妥协的“迹象”，它仅仅是对周恩来关于联合国问题立场的再次陈述而已。周赞许了联合国宪章，特别是它的国家平等的条文，但对于受美“帝国主义”所左右的联合国的“非法”行为他是不接受的。这一点周在5月22日会议关于朝鲜问题的讲话中再度提到，在这次讲话中他赞成由一个中立国家委员会来监督朝鲜的选举。周提到联合国宪章，指出，美、苏、法、英和中国对维护国际和平负有“特殊的责任”。周希望中国成为“五大国”之一；另一方面，他对于“和平共处”的解释使各国平等的概念得以具体化。在接受联合国宪章的同时，周也接受它存在着的矛盾。

朝鲜问题会议的结局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6月的头几个星期里，周就努力争取巩固那怕只有一点点的一致意见。在6月9日印支问题会议和6月11日朝鲜问题全体会议上，周建议“以我们大家都共同具有的观点作为推动会谈的建设性基础，同时在那里有分歧的地方找到解决它们的方法来”。这是周后来在万隆宣布的“求大同存小异”公式的前奏。周可能一直在仔细琢磨着后来宣布的这个公式，以使它可以运用到所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去，但随着事态的发展，它几乎独独运用于中国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上。^{*}

* 作者1965年11月15日采访了章文晋，他是日内瓦会议和后来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在采访中，章强调指出，这个方针并不适用于日内瓦会议上的各大国。——原注

杜勒斯告诫其代表团当心共产党的统战诡计。实际上，周恩来精到巧妙的外交妥协才能常常被美国人忽视。另一方面，中国代表团已敏锐地了解到了美国在联合国的盟友之间的分歧。杜勒斯对这次会议的总的态度是：对会议本身不必大惊小怪；它只不过是一次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安抚和对国际宣传媒介的争取罢了。杜勒斯看不出在中苏之间有什么可资利用的分歧的地方，因为他确信共产党国家都是铁板一块的。

6月14—15日，16个盟国代表团团长谋划出了终止朝鲜问题会议的策略。他们强调必须维护联合国采取“集体行动”的权利和为朝鲜选举提供国际监督。盟国的这个花招在6月15日第十五次会议上表演得并不精彩。史密斯承认，共产党对盟国的方针早有所料，所以他们“严阵以待”地乘机利用盟国的这种金蝉脱壳之计取得了最大限度的宣传优势。

共产党方面以调和的口吻谈到有必要就从停战向南北朝鲜统一过渡达成某种协议。周起立发言支持莫洛托夫提出的发表一项朝鲜问题会议宣言的建议。他呼吁通过一项决议，委托与会各国继续努力以达成一项谈判解决方案，而不是将通过艰难谈判所取得的一些共同点白白扔掉。周建议决议的措辞可以淡化一些，不明确提出时间和地点，而只仅仅声明这个问题将“通过谈判由有关国家分别解决”。这样一来，要说共产党方面的不妥协是导致朝鲜问题会议终止的原因，这是说不过去的。

关于周建议通过一项决议问题，他同比利时外长鲍尔—亨利·斯帕克发生了争执。斯帕克发言说周的建议没有必要，

因为它在朝鲜停战协议条款中已不言而喻了。周举起他代表团的指示牌要求发言，在发言中他驳斥了斯帕克的观点。周确信，停战协定中没有要求日内瓦会议国家寻求一项朝鲜问题解决方案这样的条款。

停战协定第四条无疑可以作广泛的不同解释，因为仅仅提到举行一次将由双方选定的代表参加的“较高级别政治会议”。在周看来，不管怎样，要求会议参加者通过发表一项声明表明一下他们对未来谈判的一般性意见，这只不过是小事一桩。

使史密斯感到恼火的是，斯帕克固执地要进一步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提出既然周的建议并未明确包括在停战协定中，那它就得要遵守16国发表的关于朝鲜问题谈判的宣言的精神。周反唇相讥道，他并不如此认为，因为16国宣言是个“单方面的声明”。在美国人看来，周是在引诱斯帕克“上钩”，表明了既然与会国在精神上有这样程度的一致性，那么他们就应该在共同声明上也取得一致意见。

史密斯将军不想争论下去。他拒绝了整个建议，他声称这个会议并非永久性机构。联合主席之一的艾登接口说也没有正式的投票程序来保证这样一项建议。他无精打采地提出，尽管没有通过一项决议草案的会议机制，但代表们作的陈述将都在会议记录里记录在案。

对周恩来说，朝鲜问题会议的闭会令人痛苦而沮丧。英国方面向美国报告了6月16日周和艾登进行的会谈情况。艾登说周对朝鲜问题会议的结果感到震惊，他尤其对拒绝接受他提出的最后建议感到心绪烦乱。从拒绝接受他的建议

中，周看到了一种阻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未来朝鲜问题谈判的动向。艾登向周再次保证事实并非如此。在1971年7月19日的一次采访中，周谈到他自己对拒绝接受他的建议的看法：

我们说……我们至少应该定下举行另一次会议的日期。那时，有几个国家的外长被说服了，如比利时的斯帕克先生，他是照联合国行事的。当时的会议主席是艾登先生，那时他有点儿拿不定主意，并倾向于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会上坐着位派头很大的代表，他挥挥手表示反对，结果就没通过。你们可能知道他是谁：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先生的代表史密斯先生。当然，这也许并非他个人的看法，但他这是在执行命令。他什么话也没说，他无话可说。他只是挥了挥手。

杜勒斯并不想在日内瓦会议上达成什么实质性协议；周恩来却这么想。印支问题远不及这样棘手。对周来说，这是个亚洲问题，在外交攻势——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它得到了有效地处理。法国在奠边府的惨败是会议期间一个有利的插曲，法国变得更急于从越南脱身。他们面临的选择余地降低到要么让美国进行积极的军事干预，要么通过谈判脱身。英国由于担心美国狂热地和共产主义作对会产生没有限制的后果，所以它希望在日内瓦会议上设法找到一条避免印支战争国际化的办法来。当时联合国尚未直接卷入印支战争，这样它就不能像处理朝鲜问题那样立即凭自己道义上的权威和特权来对侵略国家采取集体行动。

既然英法的态度相对含糊，美国采取联合行动的能力就受到了牵制，而周的培植“中间势力”的能力得到了加强。

印支问题会议中最引起争论的是中国同越盟的关系。西方作出的调查已表明，中国在会议上提出的一项解决方案更有利于他们自己在亚洲的和平动议，而不是附和谴责越盟在东南亚所进行的战争努力。在中越关系恶化的70年代中期，越南方面指责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上出卖了他们的革命运动，说他赞成老挝王国和柬埔寨王国政府的中立地位。他们声称，周赞成将老挝、越南和柬埔寨分开解决是受到了一种秘而不宣的吞并东南亚计划的驱使*。这种说法的前提是极其言过其实的，它既误解了中国的目的，又曲解了胡志明对当时国际政治作出的反应。

毫无疑问，中国对印支战争国际化的可能性极为关注。他们刚刚以牺牲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和解放台湾的代价参加了朝鲜战争。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避免“第一线”苏联的卷入，而苏联的卷入有可能激起美国对中国东北的入侵。不过，在日内瓦会议召开之前的一次莫斯科会议中，周恩来显然和赫鲁晓夫打过招呼，说中国无力再承担像在朝鲜那样代价巨大的义务了，因此，中国将不派军队去越南。

作为总理，周要负责国内的经济的发展；而作为外交部长，他又要集中注意力于代价小而效率高的外交战略方针，即在

* 为了回答越南1979年公布的所谓的“白皮书”（《过去30年中越关系的真相》）中的这个观点，中国方面援引了曾作为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日内瓦会议的黄文欢的话说，日内瓦会议上，中越两代表团之间合作密切。——原注

阻止美国对华遏制的同时增强中国在亚洲的国际地位。而当时正是贯彻这样战略方针的大好时机。苏联人正处于领导集团的内部争斗之中并且正在谋求普遍缓解同美国的紧张关系。此外,随着斯大林的逝世,毛泽东已成为共产主义世界中最主要的人物。在争权斗争中幸存下来并有希望成功的苏联领导人都想得到毛的支持。在日内瓦关于朝鲜问题会议上,周基本上是支持莫洛托夫的,但在印支问题会议上,他显示了独立自主政策的主动性,这次转过来轮到苏联支持他了。

有一篇关于中国和印支问题的文章很有说服力地总结了当时中国在印支问题上的立场。在军事上,印度支那的情况和朝鲜不一样。中国的东北既是中国的战略大后方,也是中国的工业腹地,因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可以获得相对先进的通讯和供应系统优势;而跨越边界向越南提供军事支援,其后勤供应则要比抗美援朝时困难得多。

另外,根据苏联的资料来源说,中国避免印支冲突国际化还有外交上的原因。防止美国纠集的同盟扩展到印度和印度尼西亚,这在战略上来说是必要的。胡志明在这方面的立场并没有文件记载可以很好地证明,但可以说,在中国和苏联都不愿承担主要义务的时候,亲美联盟结构在亚洲的发展与北越的利益相冲突。据赫鲁晓夫说,就在日内瓦会议开始之前,周告诉他,胡志明自己对越盟能否在印度支那赢得军事上的胜利没把握。在胡志明1953年9月2日拒绝谈判和11月28日又答应同意谈判这段时间内某个时候,越南领导层内部的方针路线一定发生了一次重大的改变。

不管怎样,越盟5月7日夺取奠边府法军指挥部给日内

瓦会议打了一针很强的清醒剂，而越盟领导并不想让他们已经在战场上赢得的东西再通过外交失去。不过，法国战败造成的燃眉之急局势却增加了美国使其冲突国际化的可能。

日内瓦会议印支问题的讨论开始于5月8日——刚好是法国旗帜在奠边府降下后的第二天——持续到7月21日。参加会议的代表想法各异。美国用不着去协调15个盟国。艾登和莫洛托夫联合担任印支会议的主席，参加会议的代表团来自美国、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国、英国、越南民主共和国以及法兰西联邦中的两个国家：老挝和柬埔寨。就胡志明的代表席位设置问题会议发生了争吵，不过史密斯将这说成是“法国无先决条件地接受谈判所带来的有点儿不可避免的结果”。在5月8日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史密斯预告性地反对中苏联合提出的让越盟参加印支会议的邀请，说它有悖柏林会议的决议。保大政权只提出要求一个观察员身份，但却得到非出席不可的选择。史密斯还要老挝和柬埔寨方面出席会议，这样一来中国和它的越南盟友就不可能自命拥有为亚洲人说话的专有权了。西方盟国拒绝接受自由高棉和老挝爱国阵线代表的证书，周和莫洛托夫也不固执己见。

参加会议的代表团都意识到法国国内日益剧增的赞成达成一项解决办法的压力，而共产党代表团根据法国的军事溃败而指望提出苛刻的条件。在5月12日举行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周广泛地提到了法国殖民主义的问题，表示中国人民希望在印度支那看到在朝鲜那样的停战。

随后，周引用了印度总理尼赫鲁3月24日在议会中的讲话，在这次讲话中，尼赫鲁将印支战争看成是一场“反对殖民

主义的运动”。他为乔治·比道尔未能认识到这一点感到遗憾，接着他又叙述了在这场战争问题上法国国内社会出现的日益分裂局势。显然，尽管法国人民基本上已经把这场战争看成是一场“肮脏的战争”，法国“统治集团”内部的“主战派”还是不敢放弃他们的殖民主义政策。周直言相告比道尔，作为法国殖民主义的代表，他不可能擅自提出停火条件来。比道尔反驳说，他用不着周来给他上法国政治课。

不过，5月12日，周主要关注的还是美国提出的亚洲联盟体系，在回答美国的“亚洲人打亚洲人”战略方针时，他提出在亚洲“和平共处”。他详尽地论述了“五项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认为：亚洲国家应该互相尊重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而不互相干涉内政；应该以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而不使用武力和威胁；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各国之间的正常的经济和文化关系，而不容许歧视和限制。只有这样，才能使亚洲国家避免新的殖民主义者利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空前灾难而获得和平和安全。*

同印度就西藏问题成功地达成一项协议使周的日内瓦会议采取的战略方针更加活跃。在1953年12月31日至1954年4月29日这段时间内，印度一个代表团在北京同章汉夫副外长进行了谈判。4月29日发表的公报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

*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8年版，第62页。——译者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法。

这项协议的达成正值4月28日至5月2日在锡兰举行的科伦坡会议时期。周在日内瓦特别留意科伦坡国家对英国的影响，并且在5月14日早晨同艾登的会谈时告诉艾登，在同印度达成的关于西藏问题的协议中，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则都体现在它里面了。艾登精明而狡猾，只要有可能他就设法缓解“五大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提到“五”这个字会很合周的意，但他坚持认为承认中国为“大国”并不是印支问题解决的先决条件。

英国人担心在东南亚会爆发一场与在朝鲜所看到的并超过其规模的可怕的大战。5月17日，英国首相丘吉尔告诉下议院，在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尚未公布之前，他的政府将无法就英国参加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集体防务体系问题做出决定。

法国受到国内巨大的压力，而英国想给谈判一个机会。对周恩来来说，利用伦敦和华盛顿之间的分歧的时机已成熟。不过，在认为老挝和柬埔寨的军事政治局势不同于越南这一点上，英国和美国至少还是一致的。他们的立场是，越盟入侵了老挝和柬埔寨，而在这些国家里并无大的民族主义运动。

周强调三国的情况都一样，因为法国殖民主义所造成的基本政治问题是一样的；不过，在承认他们毕竟是在处理三个不同的国家——这三个国家民族独立的状况当然是不一样的——这方面，他向英美的立场靠近了一些。事实上，王炳南已在5月18日就告诉了法国：“我们不是到这儿来确认对越盟的看法的，我们是来尽全力重建和平的。”

周在印支三国国家情况不同问题上所作的保留为他5月27日提出的停火建议铺平了道路。周向印支问题第七次限制性会议提出的六点建议“使会议发生戏剧性的转变”。周曾打算将各代表团提出的意见大纲汇集在一起，提出一项综合建议，以争取其他代表团。

周的建议包括：立即在整个印度支那停火，在日内瓦和在印度支那的军事指挥官进行接触，暂停向这个地区引入新的军事人员和武器，成立联合委员会和仿照朝鲜停战协定模式成立中立国家监督委员会，参加日内瓦会议的国家共同保证不得违反停战协定和关于交换战俘及被扣押的平民的协议。建立由“中立”国家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这一点是由苏联在5月14日提出的。周声称，在日内瓦会议所有各方参加对提出的协议进行集体保证这个问题上，他和英法的观点一致。他说在这点上没人提出什么反对意见。但就美国人看来，这当然是信口雌黄。

周还表示对比道尔5月24日提出的“非军事区”建议感兴趣，他认为这可以作为有关各方之间直接讨论的问题。他建议中的第三点没有明确提到美国对越盟撤出老挝和柬埔寨一事的关注，因为他的措词只提到暂停未来任何引入“各种新的部队和军事人员以及武器和弹药”。周主要关心的是排除美国对印支的军事干涉。不过，他5月27日的建议为5月29日达成的呼吁整个印度支那同时停战的9国协调打下了基础。

会上提出的建议引发了一场关于“中立”的定义问题的争论，与会代表团都在为哪些国家可以作为建议设立的中立国

监督委员会中的“中立国”而勾心斗角。史密斯5月31日抨击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朝鲜中立国监督委员会中的行为谈不上“中立”。他认为,根据定义,“共产党”国家不可能是“中立的”。当时代替莫洛托夫参加会议的葛罗米柯加入了争论,他反驳说,对方也与此同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位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倒谴责起他的愤愤不平的美国同僚来,他提醒说:“意识形态是一回事,为维护和平而进行合作则是另一回事。”

6月2日,法国外长心怀叵测地引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一段话,大意是中国不会在同美国和苏联关系中选择中立。就在那天上午,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史密斯将军也提到了一份国务院的文件,标题是“通过和平进行战争”。他当时并不准备公布这份文件,但他说这份文件是用周恩来的一句“极其重要”的话开始的,这句话说的是作为“停战的策略上的必然结果”,建立“联合政府”在政治上是必要的。

周认为,比道尔坚决主张管制委员会成员完全“客观”不带偏见会起相反的效果,因为如果越盟不能确信自己的成员地位的话,它是肯定不会赞成这个委员会的。6月9日,他向会议表明了他自己的态度,他说,据他根据朝鲜停战协定和国际上的流行用法所知,“中立国”的意思是指没有直接参与敌对行动的国家。

周推论道,要是“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被当作这种定义的基础的话,那么所有的国家都不得算有资格。周对法国发了脾气,他指责法国人在唱双簧——一方面参加会议,一方面又怂恿美国立即干涉以挽救法国在印支的处境。

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当选为法国总理的前一天,也

就是6月15日，这天朝鲜问题会议也闭会，周又试着采取了另一个大的步骤。他私下告诉艾登，他理解英国在老挝和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因为这影响到他们在马来西亚的地位，而且他还告诉艾登，如果美国不在印支建立军事基地的话，他准备“照印度和缅甸的式样”承认老挝和柬埔寨为独立国家。

周还对艾登说，要是所有的外国军事力量都要从印支撤走的话，使越盟同意撤出老挝和柬埔寨并“不难”。周选择的时间很关键，因为美国一直在考虑退出印支问题会议，才发生了朝鲜问题会议终止的这样令人担心的先例。

随着孟戴斯—弗朗斯的当选，周又有了一个新的人物可以做工作了，因为法国新总理在选举中作过保证，要在7月20日之前就印支问题达成一项解决方案。周在承认老挝王国政府和柬埔寨王国政府问题上刚刚表现出的灵活性可能使会议的破裂得以避免。他将“中立”概念突然延伸到这些国家与他的在亚洲“和平共处”的倡议是一致的，而且也潜在地分散了那些国家对美国的东南亚集体防务建议的注意。

6月21日，周邀请老挝和柬埔寨的代表同范文同一起赴宴。宴会上，范文同非常高兴，因为他不仅答应了越盟“志愿军”撤出老挝，而且显然还接受了法兰西联邦在老挝领土上的基地继续存在。当时中越所谈论的“中立化”是要排除美国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军事基地以及使这两国不参与计划中的美国集体防务体系。

周恩来战略方针中的下一个重要步骤是会见法国新总理。由于法国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拒绝在法国会见孟戴斯—弗朗斯的任何建议。不过，还是在瑞士的伯尔尼安排

了一次会晤，孟戴斯—弗朗斯则以要在这儿礼仪性拜会瑞士总统作为掩饰。

同过去和艾登的会晤一样，周在6月23日的这次会晤中，并没有通过特别要求法国承认其政府及其在联合国的地位来给美国任何说词。他爽快地向孟戴斯—弗朗斯通报了他宴请越盟、老挝和柬埔寨时的情况。他还抱有同情地谈及了法兰西联邦。

双方都有翻译，但周的法语应酬能力以及他早年在巴黎留学生活对他在这番关键性的会谈中很有帮助，这次会谈达成的一致意见为在后来三周内达成的第一阶段军事解决方案解除了一些枝节性问题。孟戴斯—弗朗斯认为在政治解决的第二步上，越南的选举不应太过于仓促，对此周抱有同感。周没有特别提起法兰西联邦在老挝和柬埔寨的基地，但他极力主张越盟和它的南方同胞进行接触，就像目前越盟和老挝、柬埔寨之间进行的接触一样。在孟戴斯—弗朗斯的要求下，周答应帮助劝说越盟加快谈判速度。

就印度支那问题做交易对周来说易如反掌，但也不一定。6月28日，丘吉尔和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集体防务计划将继续进行，而不管日内瓦会议的结果如何。

为进一步完善外交攻势，以反对美国一手策划的集体防务体系在亚洲的扩展，周于6月24日离开日内瓦对印度、缅甸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短时间的访问。周想赢得亚洲“中间势力”的支持，因此有必要对新德里和仰光发起主动攻势，阐明中国的立场。缅甸总理吴努先前曾向印度总理尼赫鲁通

交了一份函文，表达了他对中共在中缅边界的活动以及中国支持老挝和柬埔寨境内的越盟军事活动的关注。正是在这次日内瓦会议半休会期间，周建立了作为中国对外政策准则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尤其适用于渴望独立的亚洲国家。

在新德里举行的三天会谈期间，周和尼赫鲁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重申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双边关系的基础。6月28日的这项声明有意要影响日内瓦会议的进展，因为它对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印支三国的“中立”地位作出了明确的保证。长久以来印度就一直在反对美国的遏制政策，主张中国积极参与亚洲事务，并赞成符合尼赫鲁的亚洲“和平区”愿望的印支中立化。

对担心中国的侵略这一点，周于6月27日在新德里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发表了一项声明作为回答。他明确指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这同中国自己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说法是一致的。尼赫鲁后来在8月22日对国大党作的一次报告中谈到了周访问新德里所产生的影响，他指出周的访问使印度和中国靠得更近了。

周6月27日关于革命不可能输出的声明对缅甸来说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意义，尼赫鲁要求周在返回中国之前去仰光会晤一下吴努。根据吴努12月2日在北京的讲话来看，周6月份的访问对缅甸的对华政策确实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吴努坦诚地说：

在周恩来来仰光之前，我不知道将怎样对待这位特殊的客人。……我们深感恐惧和不安，不知道我们要与之打交道的这位到底是个执拗的人呢，还是个傲慢的人，或者

是个脾气暴躁的人。但是，一见到他就发现我们所有的顾虑都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他和我们的关系中可以看得出，他的行为举止看不出像一位大国的总理，而像是一位兄弟国家的总理。

毫无疑问，由于尼赫鲁的热情引见，周去了仰光。自然，周对亚洲国家的历史敏感性十分清楚，他在缅甸对缅甸人民在历史上表现出的民族“气节”表示赞赏。

杜勒斯只看到了周恩来身上的“共产党人”这一面。而法国人则醉心于他的儒家君子达官般的品质，亚洲人在周身上也在寻找这种品质，这一点也不奇怪。在中国，共产主义因素只是相当近代的事，中国古老传统里的高尚因素总是有希望得到重新估价的。既然有怕回复到中华帝国向外征服的历史模式去的担心存在，那就得对中国传统中的积极因素也要有一种历史的认识，这种历史传统因素将“霸道”和“王道”区别了开来。实际上，吴努强调的是中国历史上的对外侵略，而这是发生在非汉人皇帝统治时期的。

儒家的典型特征在于，它正是将国与国关系中粗暴的武力使用同道义上民族气节的表现相对照，这突出地表现在统治者内部贤明的对外政策上。这种道义标准——也指导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在严格的社会礼仪原则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这种概念被置于指导统治者之间关系的标准之上。

根据兄弟友爱建构成的国家间的关系可以恰当地用来比喻中緬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没提到中国是“五大国”之一，中国外交反而突出强调大小国家一律平等。这里有个重要的问

题,那就是尼赫鲁和吴努两人是否都不是将周当作一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来看呢?周6月29日签署的中缅公报将“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和他信奉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联结在了一起,但他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是个中国的马列主义者。

周这次访问中最为困难的是他从7月3日至5日同另一位马列主义者胡志明在中越边界附近进行的会晤。周的外交攻势已帮助胡志明明确了自己的选择。中苏在日内瓦会议上的立场鲜明地支持避免印支战争国际化的解决办法。毫无疑问,周告诉了胡志明可以和孟戴斯—弗朗斯达成一项和解,这项和解将防止反越和反华的集体防务体系的形成。周已经在推动老挝和柬埔寨的中立化,而且他业已促进了印度和缅甸倾向“中立主义”和“和平共处”。除此之外,在日内瓦会议上英国和法国正显示出对杜勒斯持某种程度的独立立场,因此,赶在美国方面作出反应之前立即采取行动十分重要。

即使已取得了奠边府的军事胜利,胡志明还可能反对他盟友的战略方针,并且仍然要冒美国介入从而使战争国际化的风险吗?采取强硬手段将会在亚洲招致孤立。周和胡7月5日发表的公报除了一般性地表示需要和平解决印支问题之外,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不过,在1954年7月15日越盟党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胡志明认可了这种可资代替的方法,因为在提到党内“左倾背离分子”时,他说:“……有些人陶醉于我们不断取得的胜利,想不惜任何代价地继续打下去……他们热衷于采用军事行动而轻视采取外交手段……他们向敌人提出的条件过分苛刻令人难以接受。”后来,周在8月11日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作的报告中指出,在中越边界会谈期

间，胡志明的确赞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适用于越南同老挝和柬埔寨的关系。越南对这些原则的赞同清楚地表明在1955年7月7日中越一项联合声明中。

中国关于五项原则的历史记载历来突出说明越南是第一个对中印和中緬根据五项原则签署的联合声明作出反应的国家。事实上，越南的反应是继中国—苏联、中国—印度尼西亚、苏联—南斯拉夫及波兰—印度联合声明之后作出的。

另外，周去见胡志明不是没有动机的。1954年夏的边界会晤含有经济援助的考虑。周从同胡的秘密会晤一返回，中国就同越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三项贸易协定。

当周7月12日返回日内瓦时，面对他的形势要比关于朝鲜问题会议时的形势更积极一些。杜勒斯因受到艾森豪威尔的压力而在生气；没有盟国的支持，美国总统不愿在印度支那单枪匹马地干。英国和法国极力要求杜勒斯升级其参加日内瓦会议代表团的级别，并要求史密斯回到会议桌上来。当周7月13日同孟戴斯—弗朗斯会面时，法国领导人向周打听胡志明现在的想法，周的回答耐人寻味：“每方都得向对方靠拢几步……这不等于是说每方迈出相同的步数……”三天后，周向艾登透露越盟领导将接受一项协议，包括在十六度纬线分割，而十七度线划界待后解决。这种立场给会议带来了新的契机。

在周对印度、缅甸和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旋风式访问之前，日内瓦会议就选择适当的“中立国”参加印支国际监督委员会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莫洛托夫提出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和巴基斯坦，艾登提议让五个科伦坡国家参加。7月18

日，周最后建议印度、加拿大和波兰，正如艾登所说的那样：“从那时起，纠缠不清的争吵一下就开始理清了。”

不过，日内瓦会议并没有解决美国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基本的棘手的现实问题，所以，签署条约和为会议达成的协议提供保证的会议参加国的问题只能舍此求彼，既未提出，也未解决。杜勒斯自始至终意识形态至上，而且冥顽不化，而周恩来倒既忠实于意识形态又灵活有余。杜勒斯坚持他在柏林提出的限定条件，美国方面最终只是发表一纸声明，表示美国将不阻挠其它与会国已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在后来詹姆斯·赖斯顿的采访中，周承认他自己在这点上没向美国提出挑战：

当时我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有我们越南朋友，在国际问题方面没有足够的经验。当时美国代表被允许在文件上不签字而只作个声明，表示他们将不干扰协议。但事实表明并非如此。一个拒绝在协议上签字的国家怎么会真的不去妨碍协议的实施呢？

美国在日内瓦会议上反华外交所表现出的意识形态顽固性最终导致日内瓦会议以这种形式结束。会议中出现的稀奇古怪的体态语言也预示着会议最终将一无所获。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王炳南回忆说，史密斯在这一点上感到很尴尬。临近会议结束时，周和自己的翻译在一次聚谈中认出了史密斯，他知道杜勒斯下令严禁这种接触。周却有意走向史密斯并伸出手去。史密斯见状赶紧从嘴上取下雪茄烟，这样他就显得两手都不空着——一只手拿着雪茄，另一只手端着

咖啡。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史密斯心情已平静了下来，他向周走过去并大方地表示他十分敬佩周的外交才能，周回答说：“我们可没拒绝同你们接触啊。上一次不是我主动向你伸出我的手了吗？”由于不能握周的手，史密斯便摇了摇周的臂作为友好的表示。

在日内瓦会议上，周在反对杜勒斯的外交上获得了相当可观的分数，但他最终仍未能制止得住美国亚洲集体防务体系的推进。艾森豪威尔领导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8月8日至12日作出结论说：日内瓦会议达成的协议是“灾难性的”。9月8日，美国及其盟国在马尼拉联合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

就在东南亚条约签订之前，中共猛烈炮轰临近大陆的国民党控制的岛屿，这也许是向亚洲国家提出警告：不要背上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沉重义务。随后，蒋介石政府12月2日在华盛顿签订了台美防御条约。这些事件引起了中国的强烈关注，他们认为美国试图构筑三条战线侵略中国，其中以东北亚的朝鲜为中心，东边为台湾和日本，东南亚有老挝、柬埔寨、越南、泰国、菲律宾。

尽管如此，周还是通过不承认美国对亚洲事务的全面参与设法消减美国这野心勃勃的如意算盘的意义。他发起外交攻势，指责美国对日内瓦协议毫无诚意，因为马尼拉条约公然将其防务范围伸进了中立的老挝和柬埔寨。9月23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指出，美国未能赢得科伦坡国家的支持。马尼拉条约只包括了三个亚洲国家，而巴基斯坦、泰国和菲律宾这三个国家几乎就是美国的附庸。

周针对美国的遏制政策发动的“和平共处”攻势在日内瓦会议之后又获得了新的契机。10月12日，中国和苏联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宣布将五项原则运用于他们同亚洲各国的关系之中。在尼赫鲁1954年10月下旬访问北京和随后12月初吴努的访问期间，周还进一步巩固了他1954年夏印、缅之行所获得的成果。此后，五项原则的发起者就认为是中国、印度和缅甸。

吴努在北京举行的告别宴会上，周和吴努之间的交谈极其诚恳。吴努回想起了周6月份访问仰光之前他的顾虑。后来他很宽慰地得到了周的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不干涉缅甸的内部事务。后来他设身处地地站在周的立场上考虑时他承认，中国可能对缅甸的政策感到了不安。他说，缅甸是个小国，她不可能去干涉中国这样强大邻国的内政，但是，缅甸倒有可能通过扮演“傀儡”角色和为外国海军及其它军事活动提供关键性的战略地带而惹“麻烦”，吴努保证缅甸将不会成为这样的“傀儡”，也不接受“单方面的援助”。

对吴努作出的保证，周恩来用外交方式表达了他的兴奋心情。他说：“两个不同社会制度又相互接壤的国家在头几次接触中有顾虑和不理解，这是很自然的。”周相信，中缅友谊一定会战胜挑拨离间分子的阴谋诡计，尽管两国大小不等，但五项原则将指导两国的关系。此外，两国还在国籍问题上达成了谅解，国籍问题一直是亚洲国家政府和北京之间发生摩擦的一个根源。周敦促海外华侨遵守缅甸政府的法律以及社会风俗习惯。

科伦坡国家对中国建设性地参与地区政治日益增长的兴

趣，在12月下旬茂物作出的邀请中国参加即将在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的决定上明显体现了出来。中国参加4月18至24日的万隆会议成为对美国遏制政策的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外交挑战。

当代中国史学特别强调美国对即将召开的亚非会议可能产生的战略意义表示的恐惧之情，并且将1955年4月1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的神秘爆炸描述为妄图通过暗杀来阻止周恩来参加会议。当时，这架从印度航空公司租来的飞机在香港启德机场作飞行准备时，有人在机翼中安放了炸弹，11位乘客——包括中国准备出席会议的外交人员和新闻记者——在北婆罗洲海岸上空遇难。幸运得很，周在最后时刻改变了他的行程，以便去仰光同缅甸、印度和埃及政府领导人举行会前高级领导人小型会谈。在他5月13日作的关于万隆会议报告中，周简单地提到了飞机是被国民党暗藏的特务爆炸的。

但根据1968年红卫兵的一些无确切根据的材料，这件事可能要比周的说法复杂得多。在哈尔滨发现的一项材料认为，“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是在美国中央情报局1953年建立的五人暗杀小组的帮助下策划的阴谋之一。

苏联对万隆会议表示热烈祝贺。美国没有打贺电，不过，根据中国方面的材料，美国派去了一支70人的“记者”团，到处散布毫无根据的谣言以扰乱会议。万隆会议是周恩来参加的第二次国际性会议，但它与第一次完全不同。这次没有“五大国”因素，会议的主要角色是来自29个亚非国家的代表团。会议参加者们都为将殖民国家排除在外而感到高兴。不过，冷

战还是渗入了大会辩论之中。

在会议进行的第二天，周将正式发言稿放在了一边，根据他在午餐时草拟的补充提纲作了即席发言。正式发言分发给参加了会议的代表，它概括地提出在亚非国家之间关系上采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强调亚非国家都有受殖民主义剥削的相同的历史经历。然而，周的即兴发言谈到了会议第一天发生的剧烈争论。一般来说，周很注意将自己在国外的活动向毛通报，但这一次没有时间同北京商量了，周首先在“求同”的基础上确立了中国的立场。他放弃了要求会议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或台湾问题达成决议的打算。事实上，1955年绝大部分时间，毛都将精力集中于国内的工农业政策上了。

4月18日，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提出在和平事业中需要“各国的道义暴力。”锡兰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在发言中指出苏联是殖民国家之一，而且土耳其和伊拉克的代表也在会上大肆谴责共产帝国主义。泰国代表旺·威塔雅康亲王认为五项原则缺乏鲜明的定义，他拒绝支持“和平共处”，但他认为其它几项原则可能同国际法惯例是一致的。他特别为泰国决定参加东南亚条约组织以对中国干涉泰国内政进行“自卫”作了辩护。

在4月19日的即席发言中，周充分表现了自己的耐心和解精神。他建议采取一项“求同存异”的妥协方针。这个方针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的组织基础。在谈到周在50年代早期对中国外交实践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时，马列和王林在一篇文章中回顾道，周把国家比做人，在说明国家之间的政治差别时周指出“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这对国家和民族来说

也一样。

正如周在日内瓦向艾登和孟戴斯—弗朗斯表明的一样，在万隆会议期间，周也一再强调中国来参加会议不是要迫使会议就大家所公认的难题——如承认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等——达成协议。事实上，1月15日在雅加达发出的中国参加会议的邀请明确宣布，参加这次会议并不意味着参加国之间的现有关系有何变化。

周郑重宣布，他不是来谈论不同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的，他是来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出共同的基础，并且讨论争取民族独立和主权的经济意义的。他向大会代表指出这样一个事实：亚洲的共产党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都是经过艰苦的斗争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因此，他们在支持五项原则上有着共同的利益。周断然否认有任何在亚洲挑起宗教纷争、干扰他国内政的意图。他还抛弃中国的传统政策——即中国政府对海外华侨所享有的特权。周呼吁东南亚国家就双重国籍问题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谈判，以找出一条解决办法。在万隆会议期间，周事实上就这个问题同印度尼西亚进行了谈判并签署了关于印尼华侨身份的协议。

周的发言和表现出的姿态受到了与会代表们拍手称赞，但在讨论有关“和平共处”的含意和民族国家结盟的权利问题上，大会政治委员会发生了争吵。尼赫鲁被某些观点激怒了，是周独挡难局推动了会议向调解方向进展。

伊朗代表的讲话引起了尼赫鲁的反感，他以非同寻常的强硬词语说伊朗代表的发言是一篇“充满了愤怒、仇恨和蔑视

一切的傲慢”。他还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同土耳其代表大吵了一顿，尼赫鲁将北约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主义保护者之一”。一谈到北约，他就感情冲动得不可收拾，他说北约在告诉印度要求取得果阿时该怎么做时所用的语言“粗俗而傲慢”。会上对“和平共处”的用词有人屡屡表示反对，声称“那个词儿危险！”对此尼赫鲁感到十分失望。他反唇相斥道：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人或反共人士，在这个世界上你照样可以干成一些积极的事情来。尼赫鲁并不认为“和平共处”的用词是属于“共产主义的”，他对巴基斯坦总理建议的用词提出质疑。巴基斯坦总理指责说，“在辞藻的掩护下”，存在着一种意欲将条约中的观点偷偷塞进国际政治中去得到保证的企图。

周恩来也感到愤愤然，但他却以和解的方式来推翻对手的指责。他仍不失在西安和蒋介石谈判时的本色。在他作出的深思熟虑、很有分寸的答复中，他从中国的立场上泛泛而论了这些问题，并不带有恶意地特别点出代表们的具体立场。既然有些代表对“和平共处”心存疑虑，他就不再坚持一定要保留这样的措辞，他建议用“和平相处”来代替。周的立场是：“五项原则的措辞可以修改，原则的条数也可以有所增减，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寻求我们的共同的愿望。”就这样，周最终还是设法将“五项原则”的许多内容都溶和进了会议的“十项原则”最后草案。后来，毛泽东对赫鲁晓夫不无自豪地说：万隆会议声明基本上是由周恩来起草的。

会议进行期间，周受到两次重大挑战，但面对挑战，他显得老练持重。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提出对会议最后公报中的文化合作部分进行讨论，并坚持要么去掉“殖民主义”的提

法，要么将它改为包括共产“殖民主义”和西方种种“殖民主义”。为了支持这种观点，有些代表要求在“殖民主义”之前加上“各种形式的”几个字。巴基斯坦总理当时想缓解一下气氛，便声称：“中国决不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她没有卫星国……荷兰总理所指的是苏联形式的帝国主义……”

周对作出这样一种限定表示感谢，但他说，即使如此，中国也不可能被完全排除在外，因为中国也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针对代表们讲话的实际含义，周再度强调：“就我们而言，我们无意在我国境外推行共产党的活动。”他再次重申他的“革命不能输出”的观点。随后他话锋一转，问道：为什么有些代表只批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而世界上有那么多国际组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来说，有的是很要不得的。周并没有过于为苏联辩护，他当时可能意识到有意维护苏联只会导致争论复杂化。在一次同约翰爵士的私下交谈中，据说他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俄国人的组织，和中国没有关系。”

中国反对提“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印度和巴基斯坦随即建议，既然已提到“殖民主义在亚洲和非洲的存在”，措词中还是该用上“各种形式的”词语为好。看到在这个问题上确实有分歧，中国就不再坚持己见，采取了“求同”的立场。最后的措词成为：“亚非会议注意到：殖民主义在亚洲和非洲许多地区的存在，无论它具有什么形式……”

周后来在5月13日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就这个问题作了解释。他提到在万隆会议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在一切表现中”的殖民主义来对“社会主义”提出非

难。他再次提出，事实上，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进行新型国际关系的建设。周重申了列宁关于殖民地剥削是资本主义经济矛盾产生的结果的理论。他坚持认为，在万隆会议上他没有作出妥协让步。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他理解为意味着“在一切表现中”，它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因素。

万隆会议发表的《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包含了“五项原则”，但它还包括了第5条原则：“尊重每一国家按照联合国宪章单独地或集体地进行自卫的权利。”周接受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提法，将它看成同“自卫”的主权权利是一致的；不过，他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注意，宣言第6条原则用词的涵义进一步区分了合理“自卫”和以集体自卫的权利为借口进行“军事集团”侵略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联合国宪章第51条只能在针对武装进攻时才能援引，而东南亚条约组织则是非法的，因为它的签署倒不是针对中国发动的实际“武装进攻”，而是它是在日内瓦和会刚刚结束之后签署的。周还引用了纳赛尔4月27日声明中的话，指出在任何地区的防御体系应“由当地人民发起”。另外，在周看来，东南亚条约组织并不代表亚洲，因为其委员会是由过去殖民国家控制的。

在5月13日人大报告中，周还对他在新殖民主义盛行的形势下发展国与国之间经济关系的立场作了说明。万隆会议宣言第9条提到了“促进相互利益和合作”，而这同1949年新中国的共同纲领最初提出而后成为“五项原则”之一的“平等互利”的说法十分接近。他向人代会介绍了“自力更生”的概念。他解释说其“最根本的”是为了各国可以“发展自己的生产并依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在这样的要求之下，各国应开展

相互有利的合作。中苏关系就是“这种新型合作的突出例子”。

在报告中，周还谈到了他在万隆会议上遇到的第二个重大挑战。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使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的正式讨论笼上了阴影。又是荷兰将这个问题引入了争论。4月23日周发表了一项声明以作回答，他在声明中阐明：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周在5月13日的报告中说得很直率，中国在万隆会议上并未正式提出台湾问题，以免整个会议由于受到“外来压力”而遭受危害。

中国的立场很清楚：台湾问题的处理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不过，中国也并不要求会议达成一项赞成中国这种立场的决议。在4月23日的声明中，周恩来主要谈到了美国及其遏制政策。他通情达理而且做得恰如其分，没做出任何重大让步。他的立场就是，台湾属于中国，但他仍然愿意同美国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当作一个“国际问题”来讨论。杜勒斯后来抱怨说周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双关立场真是太精明了。在他看来，共产党试图让美国从这个地区脱离，并且在号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在台湾地区的关系上放弃使用武力的同时，保留将台湾问题作为“国内问题”使用武力解决的权利。

在决定万隆会议生命的最为关键的时刻，周采取了既现实又深谋远虑的方法推出了会议最后宣言草案。对美国关于共产党中国生来就富于侵略性的宣传，周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他强调中国是亚洲的一部分，并对东南亚条约组织存在的逻辑性提出了疑问。周广泛宣传中国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五项原则实际上包括在了对万隆会议进行系统阐述的

最后宣言之中。他采用有效的外交攻势而不是采取在亚洲组织反遏制联盟对遏制政策进行了挑战。万隆会议所取得的成功在国际上是不言而喻的，就连美国国务院的情报机构也承认，“共产党中国在万隆会议上留下的普遍的有益形象”得“归之于周恩来精湛的外交艺术”。在万隆，美国的外交在同被认为是无理性的共产党对手的交战中又以败北而告终。

四 “和平共处”与中苏分裂

中苏之间在对“和平共处”的解释上有抵触是导致两国公开冲突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周恩来的日内瓦—万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外交战略是针对阻止美国对亚洲的政治渗透、建立有益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稳定的地区环境而采取的。

对“和平共处”的解释提出了至少两个相互联系的问题。1956年10月以前，周对于“和平共处”这个概念对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关系和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关系是不是都适用并不一定十分明确。正统的马列主义者强调，在处理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间关系的情况时，这个概念在同“帝国主义”作斗争上策略意义要大于战略意义；而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和平共处”同社会主义提出的准则是不相宜的。50年代，中国对其作出的解释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要表现出一种“新型”的国际关系来。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只是一种策略上的权宜之计，它不像在实行“新型国际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希望看到的那种真正的合作和平等。

最近，邓小平政权强调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有时可以这样认为，在50年代，这些原则只运用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而目前强调它们也适用于社会主义

国家之间的关系，这算是一次新的突破；不过，在50年代中期周的外交中还是多多少少可以看到这后一种适用范围の端倪。

只要细细考虑一下中国领导始终将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强调“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重要性看成一致的话，中国对外政策中五项原则具有如此持久不衰的特性就不是什么令人惊奇的事了。中苏分裂很大程度上和中国坚持“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有关，以及在列宁的“和平共处”问题上分歧。

在1920年列宁发表的宣言中，“和平共处”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提出来的。它本来是为了在一连串由固有的资本主义矛盾引起的不可避免的战争中获得暂时的休战而采用的“策略性”措施。50年代中期，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将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为其第5条——看作不仅仅是一种暂时的策略。他对“实力均衡”（即“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的看法来源于统一战线工作中对世界结构性变化的推断，他认为，亚非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向“中立主义”不断发展的趋势将导致世界重大的结构性变化。

在日内瓦和万隆，周意欲在社会主义国家和采取“中立主义”立场的“第二集团”的“民族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一个国际阵线。这种想法连同希望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削弱，认为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正避免世界大战的发生，而帝国主义国家将从政策上被迫放弃其战争计划。五项原则将促进这种战略趋势的发展。

“和平共处”“策略上”的原始涵义在50年代中期中国对

“和平共处”的解释中并没有得到很好地确认，当时中国对它的解释更明确地植根于中国革命的经验。“求同存异”的思想无论从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所采用的策略的灵活性方面来说，还是从积极地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有助于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势力方面来说，都可能同列宁主义的思想有联系。不过，就周恩来来看，他将“和平共处”不仅仅只当作暂时的策略，尤其在同科伦坡“中立国”的关系中更是如此。

另一方面，列宁认为随着社会主义制度下国内社会和政治经济问题的解决，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将有一个新式的国际关系，对列宁的这一看法周恩来是严肃认真的。根据定义，社会主义国际关系是兄弟般友爱的和真诚合作的关系，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就更能够在他们同新独立的国家发展国际关系中采用五项原则。

正当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决定推行重大的政策主动性的时刻，中国已达到某种程度的成熟阶段了。中苏关系是中国对外政策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对国内经济发展也有着重大的意义，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却强调根据中国目前革命发展的特征对苏联经验进行客观而现实地评价很有必要。

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重申了“和平共处”的重要性，他提出由在中立政策中正寻求更大独立性的新独立的国家组成一个“广阔的和平带”。日内瓦会议以来，苏联和中国在对国际力量相互作用的想法上有很一致的一致性。早在1954年10月，两国就发表了联合声明，表明在他们同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中将采用五项原则。

此外，苏联和中国都想各自同美国的关系有所改善。按照在万隆宣布的中国希望就缓和“台湾地区局势”进行谈判的调子，周恩来于1955年7月再次发表了一项声明，表示中国和美国之间没有战争，中美之间不需要“停火”。接着，他重申中美之间可以“和平共处”和“和平竞赛”。周继续向美国的遏制政策展开外交攻势。他宣布：“我们反对将我们同某些国家的关系置于排除其他国家的基础上。”在1956年6月28日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作的报告中，他明确宣布：“事实胜于雄辩。我们这一边既没有铁幕也没有竹幕。”

在中苏间爆发的震撼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严重分裂的时刻，毛泽东发表了两次不同的讲话。一方面，他承认中苏的这次分裂有一些很深的历史根源，这些根源自从20年代起就存在于两个国家革命的相互关系之中了。另一方面，毛指出，中苏分歧开始于苏共二十大，在这次大会上，赫鲁晓夫在提倡同美国“和平共处”过程中，“扔掉了斯大林这把剑”。

毛和周只是希望在以苏联为首的团结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建立起自己的独立性，他俩都没有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提出的政策提出公开反对。周和毛尽力加强同苏的联盟。日内瓦会议之后，美国已扩大了它的集体防御连锁体系。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谴责对中国领导来说有着重大的含义，而苏联就这个问题不向中国预先通知一声，这与中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新建立起来的地位不符。毛承认，对斯大林提出批评对“破除盲目崇拜”很有必要；不过，他又说：“可不赞成一锤子把人砸死。”

在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周的五项原

则同“和平共处”和“和平竞争”一同得到大会的批准。刘少奇在他9月15日的报告中说，由于成功地运用了五项原则，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提高”。刘的报告同周在1956年6月做的报告中的统战理论是一致的。他还强调了有着九亿人的社会主义世界和民族独立国家——包括总人口还可以再增加六亿的“中立国家”——之间的联盟。刘指出，在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形势下，美国将不得不对中国采取“现实而明智的态度”。

9月27日通过的大会决议将现行对外政策综合成八点，包括巩固加强同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同亚洲和非洲国家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同所有国家开展正常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反对准备新的世界大战，支持世界和平运动，反对殖民主义，支持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在同外国和外国人民的交往中教育中国工作人员在真正平等基础上对待他们”。

在就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向代表大会作的报告中，周提出了有关中国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关系的问题。他和毛在这个问题上观点一致。毛在4月份作过一次“论十大关系”的著名报告。毫无疑问，苏联的援助将是重要的——这一点毛和周从40年代后期就一直重申过——但中国自己的完整工业体系建设是最终目标，苏联的技术成就只运用于中国某些特别的国民经济上。

周和毛通过将大量“照搬”和有选择地、均衡地进口苏联技术和专门技能区分开来，对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过度行为作了调整。1956年1月，周告诫干部们要“抛弃奴性思想”，并

且劝告那些抱有“既然我们不能立即改变中国的科技落后的状况，我们就得依靠苏联的援助”的想法的人，他敦促他们根据中国自己的特别优先要考虑的重点，弄清“什么是主要的和紧迫的”。在周看来，中国不可能无限期地依靠苏联专家，中国得有自己的知识分子资源。

在4月25日的综合报告中，毛根据苏联的经验概括总结了发展的基本原则。毛后来解释说，他有目的地系统阐述这十大关系，以此作为一种手段来教育党使其认识到苏联和中国经济发展之间的差异。在当时这篇秘密报告中，毛没对苏联提出任何批评，尽管他们在集体化计划中和在进行有利于重工业而不利于农业的不平衡的早期积累中犯了“原则性错误”。

在为了研究中国的情况以作出自己的选择而进行的有力比较中，毛强调了十分明确地反映在党的“实事求是”延安传统中的认识论。中国得在关于苏联的经验是否以及如何适用于中国问题上形成“独立的观点”。毛着重指出了“学习所有国家的长处的政策”的重要性，教导干部们不要有已经成为一些苏联同志特征的自高自大、骄傲自满的倾向。毛发现苏联同志自高自大的根源来自于“沙皇俄国”的传统，而十月革命就爆发在这样的俄国。

8月份，毛详细地谈了不仅要学习苏联而且还要学习西方技术和文化的必要性。他相信，中国人民既不会接受“民族虚无主义”也不会接受“左翼关门主义”。有头脑的党员得有选择地、批评地研究苏联，而在“坚定地摒弃和批判所有的资产阶级腐朽制度”的同时，又不要放弃“资产阶级”文化和技术中

那些对中国经济发展可能有促进作用的积极方面。

周完全同意毛的观点。在代表大会提出的在中国要不要和怎样建立一个完整工业体系问题上，周将大会中出现的观点分为两类。他驳斥了那种认为中国可以依靠国际援助，因而不必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依赖思想”。他争辩说，考虑到中国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种观点是荒谬的。接着他又驳斥了“孤立思想”，认为中国不仅需要获得苏联和东欧的援助，而且还需要开展并扩大同其他国家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

表达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新建立的地位的机会来得比所期望的要快。波兰和匈牙利出现的动乱引起了人们对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原则的关注。“和平共处”有争议，因为这关系到社会主义在匈牙利的生存的问题。中国人担心匈牙利事件会给国际社会主义大团结带来冲击。中国曾认为团结起来的社会主义阵营要同“中立国家”携起手来迫使美帝国主义放弃战争计划。五项原则并没有明确赞许社会主义国家脱离华沙条约组织，不过中国人自己曾认为“和平共处”在联合国宪章中已有表述，而且宪章同周的“求同存异”是不矛盾的。匈牙利的纳吉·伊姆雷在他统治的最后几天里，曾绝望地向联合国宪章和周的五项原则求助。

东欧的局势危急万分，他们呼吁周进行个人干预，在赫鲁晓夫的要求下，周中断了在亚洲的访问直接赶到了波兰、匈牙利和苏联。如何恢复社会主义团结的问题是他在东欧协商的中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规定，在遭到外来侵略和出现国内反革命的情况下需要给予直接的兄弟援助；另一方面，

解散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所达成的协议在各国共产党的成熟性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中自觉表示出平等和独立自主的必要性方面已作出了广泛而合理的说明。平等和独立自主在赫鲁晓夫同铁托的和解声明中也有表述。

毛打电话告诉周说，俄国人“是被他们的物质利益迷住了眼，对付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狠狠地教训他们一顿。”毛担心苏联领导会被东欧的事态弄得不知所措，他极力主张赫鲁晓夫干预匈牙利，镇压“反革命”。

中国驻布达佩斯大使郝德青曾得到一份油印的纳吉写的“论共产主义”小册子。下面节录的1958年1月的这部分内容有着令人不安的含义：

……五项原则不能局限于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或两种制度之间的斗争，而必须扩大到民主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国家间关系上。

五项原则并非起源于两个不同制度之间的差别……它们是独立于国际领域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因素。

这种说法超出了周恩来的“存异”的观点。对中国人来说，纳吉在这里提到五项原则并不是什么顶重要的事，当时在布达佩斯街头，甚至还可以听到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们在高呼“中国人和我们站在一起”。可是，总的看来，中国领导认为纳吉脱离华约组织并且退缩到多党的社会民主政治制度上去是走得太远了。

波兰发生的动乱和匈牙利出现的“反革命”使赫鲁晓夫张惶失措，在非斯大林化和同南斯拉夫改善关系上他采取了主

动。表面上看，这些事件有助于证明东欧国家的斯大林主义领导是否正确；不过，中国却从不同的角度把矛头对准了苏联所犯的错误上，认为东欧出现的动乱来源于50年代初苏联对东欧领导班子粗暴的强加于人的做法。中国人一方面急于恢复“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但另一方面又在私下对苏联在对东欧的政策上所犯的重大错误直截了当地进行谴责。

自从1954年以来，铁托就一直努力在南斯拉夫同印度和缅甸的关系上贯彻五项原则。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铁托一再告诉美国人说，在万隆中国人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个较为明智的方针，他们对苏联共产党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因为像南斯拉夫一样，中国也是违背了斯大林的意愿进行革命的。

铁托和赫鲁晓夫1955年发表的《贝尔格莱德公报》采纳了五项原则。1956年6月，两位领导人发表的《莫斯科宣言》中还溶合了“在坚持主权和领土完整、独立自主、互不侵犯、平等、相互尊重和互不干涉它国内政基础上的和平共处”原则。《人民日报》以客气的赞同口吻引用了后一个宣言中的语言，特别提到联合宣言包括了在联合国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立场的支持。

随着非斯大林化和同铁托建立了新关系，赫鲁晓夫使东欧国家突然减轻了政治上的压力，而由此带来的事态的发展使他无法控制。周恩来认为斯大林1948年导致了同南斯拉夫的不必要的紧张关系，而中国的政策欢迎赫鲁晓夫正式重新坚持列宁的社会主义世界中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中国对铁托对西方的态度心存疑虑。纳吉是从铁托那

里获得启发才提倡“积极共处”的。

1956年12月，毛泽东就匈牙利事件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毛认为前斯大林主义者拉科西政权在其强迫工业化和粗暴对待本国资本家方面完全错了。拉科西的问题在于“……完全照搬苏联模式而不考虑本国的具体情况……”在批评强迫工业化的同时，他含蓄地将中国革命和匈牙利革命作了比较。由于依赖苏联军队，没有巩固国内阶级斗争进程，亲斯大林的匈牙利领导要求全体人民依照一种经济纲领齐步走，而这种经济纲领带来了人民的极大不满。随后，赫鲁晓夫的突然政治减压使匈牙利发生了一场强烈的反革命骚动。

毛不赞成铁托的政策。他对铁托利用苏共二十大感到不满。帝国主义分子也在“利用”它以达到它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毛预言：

局势的发展将迫使苏联同志逐渐改变初衷。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他们都不能继续老一套统治了。我们可以乘机利用一下苏共二十大，帝国主义已经利用它了，铁托也已经利用了它，……关于二十大我们必须同苏共面对面交谈。

他对国内一些强调“别站在一起”的舆论进行了谴责。在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主要组成部分时，他抨击了那种认为铁托的做法可取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应当走中间道路，成为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桥梁。这是南斯拉夫道路，这是一条从两边捞钱的道路……”毛认为，这条“道路”只有表面上的“独立性”。铁托的“独立”观点——他还将

它介绍给了匈牙利——正中了一美帝国主义的下怀，而东西方调解的观念伴随着的是一种“渔利”的愿望。毛坚持认为，帝国主义是不会给中国人“好东西吃”的。帝国主义将保守住她们的技术秘密，而不是真正地要帮助中国人民发展经济。既然如此，毛期望苏联在同美帝国主义的关系中表现出自己的决心来，但他在1957年1月27日地方党的书记会议上谈到：

作为第一书记（即赫鲁晓夫），他是有些物质利益所求的，这容易导致利欲熏心。当一个大脑对此过于发热时，我们不得不向他大吼一声。这次在莫斯科，周恩来同志毫无顾虑地与他们较量，结果他们吵了起来，……我们并没有涉及到所有问题。……我们将一直争下去。只要事情能容忍得了，我们还是可以求同存异的……如果他们固执己见，我们迟早要将一切都大白于天下。

对这类事情毛可能早有所料，因而他在对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采用了周恩来的公式。

周同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会晤远非一次“各自观点的坦率交流”。斯大林对东欧的外交政策提出了国与国之间的平等这个问题。周后来宣称他当时告诉赫鲁晓夫，“……苏联占取的领土太多了，从东方的日本领土到中国、中东、东欧以及芬兰。”东欧的人们常常津津有味地议论着一件不知有否的事，赫鲁晓夫曾恼羞成怒地脱口对周恩来说：“周同志，你批评得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出生于资产阶级。”据说周心平气和而又锋芒毕露地回答道：“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

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与此同时，在国内，毛泽东在1月份的会议上再次指出不仅需要研究苏联，而且还要研究其他国家，他赞成周的“口号”：“寻求和平，寻求友谊，寻求知识。”

毛和周是怎样解释社会主义国家间应持的正确关系的呢？他们支持10月30日发表的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内的平等和独立的莫斯科宣言。该宣言指出无人忽视“平等”原则，这完全是“因为意识形态和斗争目标的一致性”使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是“由共同的社会主义理想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团结起来的”，它们是可以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起相互关系的。

不过，中国方面是决不会接受强调平等和五项原则是为了将其作为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理由这种做法的。在评价匈牙利事件中，就连铁托也不得不赞同苏军11月2日出兵干涉匈牙利，镇压“反革命”，不过11月11日他在普拉的讲演中又模棱两可地强调对匈牙利人民“自我解放和寻求独立”的愿望表示理解。

11月23日，苏联《真理报》作出了反应，它指出了“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共同道路上创造性地发展多样化”的重要性，但接着又将中国和南斯拉夫对他们各自“具体的、客观情况”上所持的态度进行了比较。铁托一直很自负地认为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普遍意义，就此《真理报》指出：“……中国同志一直没有声称他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具有普遍意义，尽管他们采用的方法在他们国家已完全得到证明是正确的。”在苏联人看来，中国领导并不“用本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去

反对他国的经验……”正是在这基础上，周恩来1957年1月在东欧受到了普遍欢迎。

正当苏联和东欧领导在匈牙利局势上都一筹莫展时，周在亚洲发表声明，认为“五项原则”应适用于所有国家的关系。这是在11月1日中国表示赞同1956年10月30日莫斯科宣言时发表的，声明强调了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各国的关系中本就可以更好地运用五项原则。莫斯科宣言受到了热烈欢呼，认为“在纠正社会主义国家间相互关系的错误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发表的声明承认波兰和匈牙利人民对民主、独立、平等和改善物质福利的要求是“完全正当的”，但这些要求却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操纵。声明还明确提到1948年对南斯拉夫情况的错误处理及最近波兰和匈牙利发生的事情。斯大林向东欧派出的人员以及斯大林本人忽视了平等原则，并且犯了“大国沙文主义”错误。为人所熟悉的平等、领土完整、民族独立、主权完整和不相互干涉内政的原则的运用可以免使社会主义国家间产生疏远和误解。

11月9日在雅加达，有人问周恩来为什么美国和苏联保持着联系，而中国和美国却没有。周评论说，意识形态不应该使美国受到这样大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纳吉在其反对军事集团事例中曾以中国人为例。11月29日，在新德里尼赫鲁举行的宴会上，周发表的讲话继续强调以“集体和平”代替军事集团。12月20日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中，周直接抨击了认为中立国家造成了“真空”的看法。他认为殖民主义的这种观点是对这些国家民族尊严的侮辱。

周于1957年1月7日从亚洲到达莫斯科，随即他访问了

华沙(1月11日—16日)和布达佩斯(1月16日—17日)。在他同波兰领导的会晤中,周无法就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世界领导地位问题达成明确的联合声明。哥穆尔卡、西伦凯维茨和腊帕茨基都更感兴趣于对10月30日提出的平等和在不同国家情况下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讨论。不过,他们还是同意不将他们的保留意见作为结果公开出来。

1月12日,周和贺龙参观了泽兰汽车厂,然后拜会波兰部长会议。在第二天华沙举行的集会上,周向波兰人民对中国经济计划提供的技术援助、在联合国对中国的支持、在航海造船业方面向中国提供的帮助表示感谢。在强调了积极性方面之后,周谈到了东欧出现的新局势: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相互关系中的一切错误是可以通过友好协商加以改正的。目前整个世界可以看到,笼罩着苏波相互关系的乌云已驱散,一些误会也已消除。马列主义的国家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再次经受了考验。

1月16日发表了周和波兰总理约瑟夫·西伦凯维茨签署的联合公报,公报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再次同体现在军事集团中的反和平政策形成了对照。

对独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只用了五项原则中的三个原则来描述,它们是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和平等互利。在社会主义范围内提及互不侵犯和和平共处也许就太明显地赞同了纳吉·伊姆雷的说法了。两位领导人都表示相信

匈牙利卡达尔的领导能力。当他们提到苏联、中国和波兰的团结时，没有提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的亲密团结和友好合作”，这引人注目。波兰的新闻报道中报道过周不断提出这种说法，但是波兰领导人不同意提这样的“领导”地位。

在1月16日匈牙利举行的宴会上，周再次坚持社会主义国家间任何问题应本着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通过友好协商加以解决。1月17日，周和卡达尔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对“艾森豪威尔主义”提出了批评，并赞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实践的基础。周和卡达尔保证在挫败帝国主义国家战争计划的斗争中加强社会主义国家间“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的合作。

1月17日周回到莫斯科，就东欧局势同苏联领导进行讨论，在同一天的群众集会上，他将在匈牙利发生的事件说成是对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邪恶的攻击”，不能将它同富于侵略性的美国在埃及等国的立场孤立地分开看。在埃及，“艾森豪威尔主义”正在向“和平共处”发出挑战。1月18日晚，周和布尔加宁元帅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倡议为便于在亚洲和欧洲达成集体防御协议，消除一切军事联盟。双方一致认为苏联已“完成了其对匈牙利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国际主义义务”。

周赞成10月30日莫斯科宣言，将它看作是在社会主义主权国家之间平等问题上的基本声明；不过，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上他不再用“和平共处”的说法。在整个1957年，周主要强调五项原则所具有的国际意义，在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特定声明中略去了互不侵犯和“和平共处”原则。前

面三条原则在3月27日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的友好合作条约和4月11日中国—波兰联合声明中得到了重申。周10月11日在北京签署的中国—保加利亚联合声明重述了苏联的和平政策是反对“艾森豪威尔主义”的观点，同时它还提到了中保一致同意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和平共处”是必要的，但没有明确提到五项原则。

在经过80天对南亚、东南亚、苏联和东欧的漫长访问之后，周返回中国，并于3月5日向第二届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作了报告。他说这是一次寻求友谊、寻求和平和寻求知识的行程，他对在国外受到的广泛的热热烈欢迎感到满意。

尽管在每一个国家“学习”的机会很短，他说这种学习外国情况和成就的过程却大有裨益。周还指出他的代表团从苏联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作出的批评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他在报告中说，波兰党在哥穆尔卡的领导下已纠正了过去在政治和经济上所犯的过错，并且正在成功地抵制极端“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总理承认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已从匈牙利“反革命”事件中受到了教育，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上出现了错误是由于社会主义还相对年轻并缺乏经验。

周再次提到了1月份中苏联合声明中的表述：在社会主义国际关系中既需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又需要民族平等。“大国沙文主义”要不得，要高举列宁的民族平等原则旗帜。周又一次将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同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有“根本的矛盾”和“利害冲突”，而资本主义国家不断地相互狗咬狗，他们不可

能有相互有利的经济合作。周还重申了1954年作出的“革命不能输出”的观点。

在关于其分为两阶段的亚洲之行的报告中，周主要谈了在建立“广大和平区”过程中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问题。而东欧，他强调了共同理想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周谈到历史上中国同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相互文化影响和友好关系，这种关系只是在近代由于帝国主义的干涉而中断了。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它一心想通过“分而治之”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达到控制这个地区取得了民族独立的政府的目的。

在向政治协商会议作的讲话中，周对“艾森豪威尔主义”进行了剖析。他对国内统战政治中“民主”党派内部若隐若现的亲美倾向作出了反应。这些党派内的“右翼”趋向于不相信苏联，尤其对它对1949年前中国革命的干预耿耿于怀；而对美国发达的技术和民主怀有羡慕之情。周对美国发表的表面上否定殖民主义的声明不屑一顾，指出艾森豪威尔要求国会授权，让他自由决定对那些处于国际共产主义武装侵略威胁下的中东国家提供军事援助。

周认为，美国联盟体系的膨胀趋势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正被证明代价太高。他预言，英国和法国人民将会要求他们的政府在国际政治中构成一种“第三势力”。周将这种统战分析延伸到中立主义国家。中立国家正日益采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集体安全立场，以便针对美国在世界扩大其联盟体系的企图，维护他们的独立性。在周看来，和平的中立对新独立的国家来说是一种理性的政策，因为这可以使这些国家军事开支得以削减以便将急需的资金投到国内经济发展上去。还在

留学欧洲的时候，周就为贫穷的债务国的破产进行辩护，认为这是国际军国主义造成的后果。

在政协会议上，周承认有不少国家表示希望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但他回答说，美国的反华政策在下列事实中昭然若揭：它继续在中国恢复在联合国中的席位上从中作梗，对中国进行贸易封锁，最为严重的是在军事上控制台湾，并且还计划在台湾部署导弹。

1957年春夏几个月里，中国领导内部呈现出不平常的迹象，表明他们在一系列国际国内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这段时期，中国在亚洲同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局势也日益紧张。杜勒斯气焰嚣张，他轻蔑地将中华人民共和国贬为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与他的狂妄相对应，美国这时作出了在台湾和朝鲜设置核导弹的决定。

周一直在对日本推行“人民外交”，但日本首相岸信介在华盛顿和新德里发表的讲话刺痛了他。周对岸信介关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讲话提出抗议，并对岸信介在新德里发表的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应受到联合国的承认，因为联合国作出的中国是“侵略者”的决议仍有效的言论感到十分愤慨。周将这种意欲破坏中印关系的做法看作是个“不友好的行为”。

与此同时，在北京关于国民经济政策基本原则和苏联经验及其苏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援助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等问题的争论正在进行。同在1956年将对中苏经济关系的看法分为“孤立主义”和“寄生主义”时一样，周主张采取一种均衡的方法，既尊重苏联的经验又欢迎苏联的援助，而所有这些要同中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具体规模相一致。

在6月26日向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作的报告中，周指出：“有些人反对学习苏联经验，甚至说我们建设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和过失也是学习苏联的结果。”周辩论道，过错不在于苏联，而在于“我们自己是怎样学的”。周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进行经济建设过程中向苏联学习比向美国学习更适当一些，但他反对任何“机械照搬”他国的经验。这同毛的“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的观点是一致的。

这时在中国国内已决定搞大跃进，而对过于忠实地反映了苏联经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出现的过失正出现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周独特地主张走一条中间道路，他反对“空谈理论的教条学习方法”，但他又不接受将苏联的经验当作“纯粹的教条”来否定。也许他想到了南斯拉夫的情况，他说：“当年，当右派正用修正主义来反对社会主义时，和修正主义作斗争要更重要一些。”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及其与铁托政策的关系使得中国国内政治有了明确的选择，中共积极行动准备开展一场激烈的“反右运动”。

随着中国出现了将同苏共和赫鲁晓夫进行直接争论的趋势，中苏关系紧张的潜势增加了。赫鲁晓夫本人承认苏共二十大作出的结论将给毛泽东在国际社会主义世界带来许多困难。在另一方面，毛向周指出苏共和中共之间真诚地交换意见的时机已到。他指出，在1956年周同赫鲁晓夫的争论中，中国方面尚未提出所有的重大问题。

这样的显著的重大问题之一几乎肯定是对社会主义的“和平共处”问题上的立场。早在1956年11月15日，毛就在中共中央委员会上谈过：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说通过议会道路夺取国家权力是可能的，那就是说，一旦开了这口子，各国便不再有必要学习十月革命了，总的来说列宁主义被扔掉了。

毛对那些摆出一副家长架势批评中国的群众路线的国家的“同志”很反感，这从他的有关谈话中可以看得到。有一次，毛提到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运用，他宣布中国将干涉别人的内政，互不侵犯。在结束时，毛严厉地说：“我们无意领导别的国家，除了我们自己的以外……”

在1957年11月举行的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会议上，中国领导对苏联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的立场提出异议。出于社会主义大团结的考虑，中共并没在苏共二十大后就立即提出这问题，就连在1957年纪念俄国革命40周年的会议上中国方面提出这个异议时，也是抱着同苏共合作的态度，共同找到调和的措辞，把重点放在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提出的问题上。

中国人开始渐渐失去耐心，但他们仍继续将“修正主义”看作是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非对抗性”矛盾，而不是当作需要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对抗性矛盾”。在11月10日致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中，中共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强调“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尤其强调通过在议会中赢得大多数夺取国家政权的可能性……”明确表示异议。中国方面认为：“就我们所知，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看到这种可能性具有任何现实的意义。”

这个意识形态问题的争端关系到国际社会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中国人担心对“和平过渡”的任何强调都将削弱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从而破坏通过扩大广大和平区抵制美国的统战战略方针。毛泽东对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想法要比赫鲁晓夫的观点更为积极。8月26日，苏联发射了一颗洲际弹道导弹，10月4日，苏联又发射了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毛想加强由于苏联取得巨大科技成功而带来的宣传优势。11月17日，毛向在莫斯科的中国学生声明：“东风压倒西风”。他的声音响彻全世界。

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叙述了他对毛的看法，他认为毛“患有斯大林终生所患的自大狂症”。赫鲁晓夫对毛盲目认为热核战争是可以打胜的感到吃惊和苦恼。毛不加思索地说中国六亿人口中可能损失三亿，这使赫鲁晓夫大为震惊；不过，毛只不过在重复40年代后期所作的宣传而已，当时中国表示，中国不会由于美国拥有原子弹而被吓倒。周在1948年也使用这同样的说法去反对党内的失败主义思想。

对中国革命的经历赫鲁晓夫并不怎么特别了解，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的由来和细微差别他也所知无几，因此他对毛将美帝国主义描绘为“纸老虎”感到特别吃惊。正由于赫鲁晓夫对毛的历史性（或战略性）构想和暂时的策略性计划之间的差别不了解，他后来对1958年台湾海峡危机中中国的行动当然就无法领会*。

* 显然，赫鲁晓夫起初以为毛泽东会夺取沿海那些岛屿，而当毛最终没这么做时他感到很惊讶。——原注

毛确实作出过不少有力的声明，支持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领导地位，而赫鲁晓夫回忆说，当他建议中国将精力放在亚洲和非洲的革命运动上，而苏联集中于西欧和美洲，以便合理地分分工时，毛拒绝了这个建议，说它不符合世界共产主义唯一的中心在苏联这样的前提。毛支持苏的“首领地位”，但他又指出苏联得善自检点。他希望苏联在对南斯拉夫的问题上表现出决心来。

由于深知社会主义世界需要团结，中共领导还是自觉地决定在同苏联领导进行的党内争论中坚持独立和坦率。毛和周这样做是自觉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延安精神，将其作为达到更大团结的手段。

十二国共产党发表的莫斯科宣言包含了对“和平共处”的赞同，宣言说，“和平共处……同由中国和印度在万隆会议纲领中联合提出的五项原则是一致的……”关于“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孰更为紧迫，令人担心的问题被回避掉了，但并没得到解决，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项声明，声明说，“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而“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一个党或另一个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同样可能是主要危险”。

1958年2月，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召开，周的老同事陈毅担任外交部长。一些西方分析家将这项人事更动与国内经济政策的争论联系了起来。不过，如果主要是由于对周在大跃进经济政策上所起的作用有人反对的话，那应该更动他的总理职务才更合乎逻辑。

这项决定的作出可能反映了当时对集体领导的强调，以此来防止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本人也于1958年

12月10日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他不应再被提名为国家主席。外交部人事更动并没有引起政策的改变。陈毅就国际关系问题向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作了报告。1958年2月10日，周又就当前国际局势作了报告。周摆脱了外交部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但在外交事务上他继续是党的最重要的发言人。陈毅担任外长后，周和陈同舟共济，工作中密切配合。党的代表大会结束后没几天，他俩就前往平壤商谈中国人民志愿军撤离北朝鲜问题。

周2月10日作的报告着重谈了毛对莫斯科的立场，他指出国际力量相互作用发生了质的变化。尽管美国在埃及和匈牙利的颠覆活动不断增加，“东风”还是占优势，苏联已取得的科技优势将制止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周进而说：

我们从来没有，将来也不会利用我们的优越地位去欺负别人。相反，我们正竭尽全力为和平而努力，我们更加相信我们将在和平竞争中取得彻底的胜利，因为我们已取得了优势地位。

周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社会主义和中立主义联盟中的延伸继续被当作是对美国遏制政策的基本的战略性回答。周相信他可以取得对美国的优势，他说：“……将新中国关闭在国际社会生活大门之外，不仅丝毫无损于新中国的存在和发展，而且反倒更孤立了美国自己”。

1958年夏大跃进期间，中国的“自力更生”问题得到了强调，自从1956年以来，毛泽东就一直谈论着中国的政策和经验同苏联的不一样。1958年6月28日，毛告诫党内的教条

主义者不要“盲目模仿”苏联，他指出：“获得苏联的援助很有必要，但最重要的是自力更生。”毛确实认识到对苏联经验的实意义进行评价最好在私下进行，他指出：

至于学习苏联，在内部我们说“批判地学习”、公开地，为了避免误会，还是这样说为好：“分析地有选择地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

尽管有这样一番好意，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还是对中国领导层内部广泛出现的对苏联的批评感到十分震惊。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认为，这类问题是可以友好地相互交换意见和提出劝告的，但这次教条主义—修正主义之争结果却导致了一场吞没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识形态上的自相残杀。中国人越是热衷于对自己的发展政策作出自觉定义，他们在劝告苏联领导上就变得越自信。例如，6月28日在毛发表讲话时，陈毅插口说：“回去了的苏联同志说，他们来时带来了他们的经验，现在他们要回去了，他们将带回去我们的经验。”相互“学习”显然构成了社会主义外交的一个反常现象，双方谁也避免不了就对方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完整性在意识形态上进行评论。

在另一方面，5月份，中国对3月份发表的南共联盟章程草案发表了看法，公开将“现代修正主义”（考茨基的社会民主思想的再现）同帝国主义联系了起来。南斯拉夫的立场由于涉及到苏联领导作为社会主义世界中心的问题，所以它对现存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概念提出了挑战。中国人还反对以“积极共处”对付集团政治。毛和周继续从两个联盟体系角度来

观察世界。在宣传上，欧洲和亚洲的“集体安全”作为军事集团的一种替代已正式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中国的统战战略相信，社会主义阵营的持久完整性将会争取过来中立主义这个“中间势力”。铁托的观点激进了一些，它将南斯拉夫的中立提高到这种地步，以致于忽视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区别。

5月5日，《人民日报》驳斥了南斯拉夫的立场，指出南斯拉夫的国内纲领有抛弃社会主义的危险。南斯拉夫人想起1948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的谴责还没有被正式撤销，而且他们还被指责支持了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准则——周1957年1月在莫斯科和东欧会谈中所建议的——在匈牙利事件之后就在理论上将民族平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结合了起来，这些准则未能解决南斯拉夫所提出的问题。唐纳德·扎戈里亚教授将这问题总结如下：“总而言之，铁托所犯的错误不是中立主义，而是共产中立主义。”

与此同时，北京对美国的敌视正在增长，这反映在对美国 and 英国撤离黎巴嫩和约旦问题上持更加强硬的立场上。中国姗姗来迟地对赫鲁晓夫7月19日发出的呼吁表示赞同，7月22日，赫鲁晓夫呼吁召开一次由苏、美、英、法和印度政府首脑参加的首脑会议处理中东危机。赫鲁晓夫于7月31日飞抵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并于8月3日发表了一项公报，呼吁就中东问题召开首脑会议，并且号召“对修正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主要危险——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公报提及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不过令人不

可思议的是公报没提到台湾问题。

周恩来拒绝以联合国安理会作为讨论解决中东危机的论坛，因为中国在安理会中没有代表席位。赫鲁晓夫曾赞成英国首相麦克米伦7月22日提出的召开安理会首脑会议的建议；不过，当他返回莫斯科时，他写信给艾森豪威尔指出，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在安理会处理这样的国际危机是不起作用的。考虑到中国人的关系，赫鲁晓夫转而提议召开联大紧急会议。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指出，常常由周恩来这位总理和“老练的外交家”负责提出一些同苏联有潜在争议的问题；而在1958年8月同赫鲁晓夫会谈的是毛泽东本人，这次会谈涉及了非常敏感的中苏军事合作问题。毛被赫提出的要求激怒了，赫要求中国让苏联的潜艇使用中国的基地。毛对核时代爆发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作出的反应令赫感到不可思议。赫还同毛就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进行了十分粗俗的辩论。他鲁莽地告诉毛说，他正在违反客观经济规律。

有许多原因可以表明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这时将美“帝国主义”当作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严重的威胁。蒋介石整个地面部队的三分之一——十万人——驻扎在金门和马祖岛屿上。美国国防部官员公开宣称在台湾部署的斗牛士导弹将增加美国在远东的“核打击力量”，部署在台湾的导弹于5月2日进行了试验。同时，在朝鲜的导弹基地建设也已着手进行。看不出美国有任何重开中美华沙谈判的苗头。同日本岸信介政府的紧张关系导致中日贸易关系的中断，中国人确信美国和国民党的特工人员正在西藏策动叛乱。

8月23日，大陆开始炮击金门，这可能是从战略上先发制人的举动，目的是要表示一下中国人是恐吓不倒的，同时也许还想告诫美国一下蒋介石的企图，以免使美国卷入一场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冲突。50年代早期，周就强调过中国是不会让美国想入非非地认为中国领导是软弱可欺的。从8月23日至9月4日的炮击实际上是一次警告，这警告在9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设立十二海里领海禁区的公告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西方的分析认为，北京希望以在台湾海峡的冒险作为强化政治的一个手段，但它却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这期间只有沿海的广播电台大肆渲染了这次危机。

9月6日，周恩来有力地重申了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随后不带先决条件地单方面提出恢复陷于僵局的中美华沙谈判。谈判实际上于9月15日恢复。这次台湾海峡危机对中苏关系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苏联仅仅在8月31日才突然开始支持中国的立场，而有力和明确的高级别的支持性表示则在周恩来9月6日声明之后才出现。赫鲁晓夫9月7日写信给艾森豪威尔表明，对中国的侵犯将被看成是“对苏联的侵犯”，苏联将“尽一切努力”保卫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领土完整。在9月19日的第二封信中，他指出，万一对中国发动核攻击，侵略者将会“立即遭到应有的、同样武器的反击”。

在苏联作出的反应中，中国领导层看出了“自力更生”的重要性，台海危机导致了中国对1950年签订的中苏条约信任程度的下降。在1963年的公开论战中，中共指出赫鲁晓夫仅仅是在核战争危险显然已过去的时候才采取行动。友好的、

牢不可破的、持久的友谊越来越像“可共安乐而不可共患难”的友谊了。

11月30日，毛泽东就赫鲁晓夫在柏林问题上玩弄战争边缘政策发表评论，他指出：赫鲁晓夫还知道怎样制造紧张局势。让我们也来制造一些紧张来，这样一来西方就会求我们别这么干了。周恩来9月6日的声明是在一次国家高级会议上得到支持的，会议是由毛泽东主持于9月5日召开的。会议特别提到了不久前美国对中东的干涉和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计划。声明重温了中国在万隆提出的将地区紧张局势的国际问题同解放台湾的国内问题区分开来的立场。9月8日，毛再次声明他坚信“东风压倒西风”，声称中国在全世界反对美国在台湾海峡的立场的宣传上取得了胜利。

在1958年12月1日作的“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纸老虎”的讲演中，毛概括地论述了在台湾海峡危机问题上中国的立场。从较大的最终的历史发展观点来看，美国只是一只“纸”老虎，或者是只“豆腐”老虎。在这个“战略”角度上，或者如毛所说“从长期上看”，党的宣传要根据“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样的准则来认识敌人。“纸老虎”的说法最早出现在1949年前中共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的宣传中，在内战期间它成了一个英语词汇（意思是“外强中干者”）。在基本的意识形态观念上，美国将成为纸老虎；然而，毛还告诫干部们，在客观现实中，美国又是只“真老虎”，还会“吃人”。

在这后一点上，毛要求干部们开展适当的“科学研究”以对短期内必须重视的战术上的现实进行评估。也许党内对周

9月6日的立场有反对意见，所以毛指出“有的同志”难以做到既有满腔热情，又进行冷静地研究。他一针见血地指出：

目前，在我们国家，有些人头脑有点发热。他们不想让它冷静一段时间，不愿意做点分析，只是头脑发热……同志们，对在领导岗位上的人来说这是要不得的，他们是要摔跟头的。

在11月30日一次党的会议上，毛抱怨赫鲁晓夫“太谨慎”了，他还说在党内和党外都有“许多人”对“纸老虎问题”不理解。由于在当前形势下美国是只“真老虎”，所以毛对一些人的想法很感意外，他们竟然在问：“既然是只纸老虎，那为什么我们不去攻打台湾？”

中国对外政策的决策圈在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内部矛盾而导致的帝国主义分歧到什么程度问题上发生了争执。毛在一份报告中谈到过这个问题，但他没有解决得了它。但既不算排除西方的团结，也不算排除他们的不团结。他用统战特有的字眼来描述困扰着美英法的矛盾：“他们又团结又斗争。”在提到他1946年写的一篇文章时，他预言：美国将把它的注意力放在美苏之间的“缓冲带”上。毛还估计，“如果缓冲带受到（美国的）攻击，他们将在缓冲带遇到抵抗，由于这个缓冲带地域辽阔，所以他们无法越过。”

对广阔的和平区持有这种乐观看法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刚刚达到的一些优势地位，这些优势地位将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得到保证。1959年，这种关于国际力量相互作用的概念由于苏美关系呈现变暖的趋势而受到重大威胁。在

1月份召开的苏共二十一大上公开的尊崇社会主义大团结的姿态后面，就应如何对待西方问题却爆发了激烈的论战。赫鲁晓夫关心的是同西方的经济竞争，以及在军事和政治方面和缓紧张局势。

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于1月28日在苏共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他所强调的同赫鲁晓夫所关注的有所不同。在那些将信将疑的代表面前，他坚定地为中国大跃进所取得的成就进行辩护。他有点未卜先知地提出在苏联领导下社会主义世界的大团结十分重要。周呼吁大会抵制“现代修正主义”。

周还比赫鲁晓夫更广泛地谈到了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所面临的良机，与此同时他还重申了在和平共处基础上建立欧洲和亚洲集体安全仍然重要。周接着说，不管怎样，对“帝国主义狂人”的野蛮行为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他还援引了1958年8月毛和赫签署的公报中的一段话：

如果帝国主义在人胆敢在世界人民头上挑起战争，那么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将紧密地团结起来，彻底清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起持久的和平。

周强调了中苏同盟牢不可破的兄弟友好关系，然而对赫鲁晓夫的世界各种力量相互关系的观点作了很大的保留。周未赞同赫提出的远东“无核区”的主张，赫想把中国拉入其同美国“和平共处”的政策的努力遭到了失败。中国人已下定决心建立自己独立的核威慑力量，他们以为1957年他们已形式

上从赫那里得到了保证——苏联将帮助中国制造核弹。

1959年4月18日，周以总理身份向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了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的总结报告。在1958年春，中国对第一个五年计划作了分析，中国领导“成功地找到了一条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更好的道路……”。周还指出，虽然存在着“不足”，但在“工农业同时发展”过程中中国还要继续“跃进”。周一直支持毛在“论十大关系”中总结出的经济发展方针。周也被看作是对苏联越来越提出批评的人之一，他在同苏联的辩论中极力维护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

周坚持认为加强中苏团结是“根本的政策”，他向一些积极地企图破坏中苏团结的外部势力提出警告。周保证，“我们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一切民族独立运动，都愿意给予我们力所能及的支持和援助。”但同时，周又保证继续坚持在亚洲“和平区”内运用五项原则的既定政策。他确信资本主义的“分裂”是个“总趋势”，社会主义国家将高举“和平共处和平竞争”的旗帜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

当时赫鲁晓夫正谋求同美国建立一种稳固的核心关系，在中国认为美“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威胁正日益增长的时刻，他希望消除“冷战”。在这样的情况下，赫6月20日作出的不向中国提供核弹模型的决定特别让中国人感到意外。中国人相信赫一定是误解了毛泽东关于战争问题的观点，6月20日的决定是对中国落后的一种侮辱。中国于1963年9月1日发表一项声明指出，1959年“……苏联领导向美国送了一份礼，他们拒绝向中国提供制造核武器所需要的技术资料”。这项声明明确谴责了苏联人未尽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据说苏联人曾质问：“……中国人怎么有资格制造核武器？他们喝同一只大盆里像水一样的稀汤，甚至连裤子都穿不上。”

此外，赫在9月15日至28日对美国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发表的一些声明也引起了中国人的反对。美国在推行“艾森豪威尔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去向艾森豪威尔总统大献其媚。这对中国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归途中，赫转道飞抵北京参加10月1日中国的国庆活动。这成了他的最后一次北京之行。苏联领导层认识到必须由赫去北京代表苏共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这样重大活动。若在美国之行后不这么做的话，就有严重有悖于外交礼仪之嫌。

在国庆宴会上，周彬彬有礼，显示出了他卓越的和蔼高雅、潇洒自如的待人本领。他9月30日致的欢迎词很短，但他向他的客人敬酒时称他为“和平的使者”。周谈到了大跃进的成就以及“由于没有经验而存在的一些不足”。他婉转地提到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以及同亚非拉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斗争的国家和人民关系的发展。他建议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干杯，但没提及“和平共处”。

赫大谈特谈了一番“和平共处”。他指出，尽管这个口号并不为资本主义世界欣然接受，但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在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关系的认识上已开始表现出一种“现实主义态度”。

第二天，北京市长彭真又对世界形势作了更加不样的预告。为了提醒他的苏联客人现在正“盛行东风”，他论述了如同一片乌云笼罩着帝国主义的重大矛盾。国庆节的气氛并没有遮掩得住表面涟漪的紧张气氛。赫的回忆录谈到了中国人

是怎样决定“让陈毅来对付我”的。赫说陈毅“极其暴躁”、“十分粗野”。最后，他被打发离开了北京，连通常的联合公报都没有发表。

中苏关系已陷入了僵局，相互间已不必再含含蓄蓄的了。在1960年6月下旬召开的罗马尼亚工人党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彭真当着出席会议的全体代表的面与赫发生了公开冲突。论战在同年11月共产党和工人党莫斯科大会上再度爆发。

争论的严重性从7月16日苏联政府作出的指示中可以看得分明，苏联政府要求所有在中国的苏联技术人员下个月悉数撤出。正值中国国内经济处于严重危机的时刻，苏联技术人员带着他们设计的图纸走了。343项技术援助合同被取消，257项科技合作项目被中止，这对中国经济是一次极其严重的打击。这段时期开展的“学大庆”活动加强了在全国广泛推行的经济上自力更生的运动，但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中国人一直宣称社会主义“新型”国际关系将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

邓小平在11月莫斯科会议上公开声明：对于赫鲁晓夫为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帝国主义分子笨拙的歌功颂德，从外交礼仪上我们找不出可以为之辩护或表白的理由来。在莫斯科81个党的代表团参加的会议上，中国和苏联代表团就如何将“和平共处”原则作为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一项战略性措施来运用上发生了分歧，这些分歧又同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相应危险的争论混合起来。中共代表团指责说：“在美化美帝国主义的同时，苏共领导还在肆意诽谤中国并将两党之间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

根本性的分歧又涉及到国际组织的问题。苏联指责中国是“分离主义”并争辩说，少数党也要受多数兄弟党做出的决定的约束。在1956年1月中国既强调平等原则，也强调社会主义的大团结，而在1960年11月莫斯科形势下，他们更强调通过民主协商达成一致的重要性，以反对苏共“强加于人的政策”。邓小平举出当年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的分歧作为例子，指出最初正确的少数派后来发展成了多数派。

争执导致了中国人对共产国际历史的公开抱怨。1960年7月14—15日党的书记工作会议期间，周总理回顾了1919—1943年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周列举了1935年共产国际做出的不干涉各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决定，以及后来在1943年做出的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这些决定是必要的，因为共产国际事实上在干涉其它党的内部事务中犯了许多错误。共产国际“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它不是专心于“原则指导”的设计而是陷于对日常工作的“具体布置”。周再次强调各国的革命建设必须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为基础。

1961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二十二大上，周将这种历史性的分析更推进了一步。会上，两党都忙于寻找挑起争辩的托辞，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抨击针对着南斯拉夫^{*}，而苏联对阿尔巴尼亚的攻击同时也指向中国。周为中国进行辩护，同时也是为了维护阿尔巴尼亚，他对“公开片面地指责一个兄弟党”的做法表示愤慨。他告诫说，这种做法不符合以民族平

* 原文如此，从上下文意思看，似是“中国对南斯拉夫的抨击针对着苏联”。——编者

等为基础的团结这个马列主义原则。周引用了1960年91党莫斯科声明中的有关条文,认为在敌人面前公开“暴露”兄弟党之间的争执不是马列主义郑重态度,他指出:“……兄弟党,兄弟国家之间如果不幸发生了争执和分歧,应该本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平等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耐心地加以解决。”

在大会上,赫鲁晓夫抨击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周相应地将这看做是对毛泽东和中国政策的攻击。对此周通过一次具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公开活动进行了回答,他向红场上的斯大林墓献了花圈,然后大会尚未结束他就离开了莫斯科。

中苏爆发的论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各自政策战略重点上的分歧。列宁主义的“和平共处”最初仅仅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将最终导致对抗的形势下,为了争取短暂休战而提出的策略性口号。它源自于列宁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认识,它有着其传统的军事上的需要。出于同美国建立稳定的核心关系的需要,赫鲁晓夫比当年列宁更加起劲地推行“和平共处”。

对核威慑的政治和军事上的意义,中国人有着不同的看法。不过,在50年代中期,在有关“和平共处”问题上却有过某种程度的趋同现象。中国外交是从他们自己的统战经验所形成的思想意识方面来理解“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为社会主义的大团结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提供了概念基础。统战战略认为,有必要在政治联盟错综复杂的变化中加强内部的纪律性并且保持独立性;它还认为要尽最大的可能同“中间势力”合作。当赫鲁晓夫在一方面谋求同美国发展新关系时,中国在另一方面寻求通过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联合

亚非拉“中立国家”以挫败美国的遏制政策。而南斯拉夫的“现代修正主义”有破坏这种战略的危险。

匈牙利事件之后，周恩来更加强调五项原则运用于社会主义同中立国家之间，而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上。对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中国的提法既强调列宁主义的民族平等原则，也强调社会主义的大团结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至于为达到这样的团结所需要的特定的组织则存在着争论。中苏战略重点不同从各自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应地位和他们各自在国际关系中的需要极其不同的理解而在意识形态原则上反映了出来。在这种情形下，根据国际共运中任何意义上的多数裁定原则而达成的团结，对信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中国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

五 周恩来、尼赫鲁和“亚非团结”

陈毅担任外长后，周恩来仍继续负责亚洲事务。他对印度特别关注，因为中印关系对中国50年代统战战略方针的运用来说至关重要，这种统战战略方针将世界划分为“社会主义阵营”、“帝国主义阵营”以及由民族独立国家和“中立”国家构成的中间阵营。

在茂物，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帮助中国接近了科伦坡国家。周和尼赫鲁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或称作“潘查希拉”，视为珍宝。这五项原则写在1954年中印关于印度和中国西藏自治区之间的通商和文化交流协定的序文中。中印双方都将它们之间的新关系看成是处理亚洲国际关系的一个范例。

美国对“红色中国”的遏制政策遭到了印度直截了当的抵制。1950年4月1日，印度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个亚洲国家*。在纽约、板门店、日内瓦和万隆的谈判中，印度给予了中国很大的帮助。事实上，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尼赫鲁就一直关注中国在亚洲地区政治中的建设性作用。尼相信“新亚洲”的出现打破了“旧的平衡和均势”。他认

* 印度是继外蒙古和越南之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三个亚洲国家。

——原注

为，不承认新中国就是不“承认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尼认识到，尽管印度在世界上有某种“道义的”影响，不过还得承认：“世界的命运更取决于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而不是世界的其余部分。”

强调中国在“崛起的新亚洲”中的地位这种现实正适合周恩来的亚洲统战战略方针，特别是当周成功地运用五项原则改善了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时更是这样。在亚洲，周并不像在东欧那样十分强调“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他所发表的公开声明都着重于中国同亚洲国家之间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他声称这种联系由于帝国主义对这个地区的渗透而中断了，尤其是19世纪以来。

周几乎完美地扮演了他是中国文明的代表这样一个角色。他和尼赫鲁都极其热衷于在国际关系中“亚洲的”自我认同——若不是自我主张的话。也许在国际关系中能表达出“亚洲”成分的没有什么能比印度的这句口号更强烈了：Hindi Chini Bhai Bhai（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

尼赫鲁希望在国际关系中培植出一种新的精神境界来——一种与圣雄甘地的“和睦相处”人类观相一致的境界。因此，“和平共处”是一种理性的精神观，它容纳了人类社会统一体中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性。尼认为，亚非国家在万隆展现出了一种“现实的理想主义”，这表现在对会议议程的成熟而审慎的处理上，各国平等作为所达成的协议的基础而得到了承认。国际政治中的“真理”就是基于这种平等的，因此，“潘查希拉”容纳了向同样的“终极目标”前进的“不同道路”，尼是这样表述印度自己的独立和平等的；

我们过去三十几年的发展是在莫汉达斯·卡·甘地领导下进行的。除了他为我们所做的之外……在他的领导下，我们这个国家的发展是有机的。它符合印度的精神和思想。

不过，这种有机的“真理”还得通过“潘查希拉”来适应当代世界。尼赫鲁认为，“真理”并不“局限于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

中印之间所产生的分歧可追根寻源到印度教和佛教的哲学上的差别上，前者的“多元论”和后者的“一元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不过，这种区分忽视了历史上儒教所主张的折衷主义和更为重要的当今中国的马列主义者所强调的实践的现实意义。民族主义总得与现实主义相一致。周在实践上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论述同尼赫鲁在理论上对“真理”的类似论述很接近。中国的马列主义者以辩证地看待客观现实来推断真理的客观性。而且，周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概念还认为革命不可能输出。革命只能依靠国内的自然发展才能获得成功；在这一点上，也就是说它是“有机的”。他倡导五项原则反映出中国在与国之间的关系中极为重视平等这一点。

周极为担心“亚洲人”打“亚洲人”，因为这样一来就为帝国主义提供了插手地区政治的机会。他的演说都提到了中印之间自古以来的文化联系。不过，由于双方都拥护亚洲的民族主义，所以，无论是印度领导人还是中国领导人都不会提在这个地区的真正的文化统一这个问题。尼和周在关于平等的重要性上取得了一致意见，但他们都是极其不同的革命经历的

发言人。对尼来说，“潘查希拉”与现代印度的精神观是一致的，这种精神观在通过非暴力革命获得独立的斗争中曾有力地吸收了英国的议会传统。

现代中国的革命显然是基于阶级斗争观念的，它被当作提高群众政治觉悟的一种机会。这种革命对处于儒教思想中心地位的和谐观提出了挑战。不错，周有时滔滔不绝地大谈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但很难想象得出他在全人大会议上讲话时采用的是什么口气，从尼赫鲁1962年中印边界危机之际向印度人民院发表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现在我们可以坦白地告诉议会，我在竭尽全力抵制在任何地方进行战争的想法的出现。这一次是我终生所受到的教训，我已72岁高龄，我无法轻易把它忘掉。”

尼很现实地主张，谋求地区和平需要中国建设性地参与到国际政治中来。在他看来，美国的不承认政策只会被用来加强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尼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求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的立场，但他不希望“亚洲”因素在中国社会和对外政策中处于太显著的地位。*

几乎被当作古代社会文明的化身的周在另一方面却是一个马列主义者，他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看成是统战战略方针的一个组成部分。周将谈判和武装冲突看作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斗争形式。和赫鲁晓夫一样，尼赫鲁对中国革命经历中

* 如斯艾斯特柯特，里德的《派往印度的使节》所载，美国驻新德里大使谢斯特·鲍尔斯1963年2月5日在给社勒斯的函文中指出，在尼赫鲁看来，美国应采取这样一项政策，这项政策应将促成中苏分裂当作其基本目标。这也是亚洲各非共产主义领导人的看法。——原注

的一些外交和战略性观点也是朦朦胧胧的。在对周的态度上，尼可能未能分清“和世界领导人的个人交情同他们各自的政治态度”之间的关系。

中印边界争端1959年开始严重起来，最后导致1962年10月20日至11月20日的短期边界战争，这次边界冲突对中国完整的对外政策和世界战略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周和尼与五项原则的联系要超过世界上其他任何两位领导人，五项原则已成为“亚洲人”对现代帝国主义历史所作出的反应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们两人共同培植了中印“现实的理想主义”国际关系这种榜样，以代替冷战中的同盟模式。

因此，中印边界问题是个极其令人痛苦和令人震惊的事件。双方不可能达成相互都能接受的一致条件。周恩来认为他已作出了极其罕见的重大让步，以使尼赫鲁相信中国是友好的。但是他的幻想破灭了，因为尼在危机期间没作出一丁点儿努力来促使双方会晤的成功。一点也不奇怪，尼赫鲁去世后，周回忆起他时认为尼赫鲁是他所遇到过的最傲慢的人之一。

在1971年8月9日詹姆斯·赖斯顿进行的一次采访中，周恩来承认，事后才认识到，谈论五项原则要比将它运用于国际关系现实容易得多。是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随意划定的殖民地边界线毁了中印关系，周为此感到十分痛心，他说：

例如，我们首先是同印度在和平共处上达成协议的可……
因为中印都是两个大国，在历史上我们谁也没有侵略过谁……

尽管中印历史上曾和睦相处，可现在在边界上却出现了

问题。正如周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但这又是一个逃脱不了的问题。

在边界危机之际对尼赫鲁来说，他对中国人作出的反应感到十分吃惊。就连在1962年10月爆发严重冲突的前夕，他还向人民院说，中国人“很难找出理由来”。尼认为，同使中印关系受到损害和使其它许多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受到伤害比较起来，有关领土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无足轻重。在回答人们接连不断的询问时，尼有点语无伦次地说：

见到我的每个人，美国人或者英国人……都问我：你对中国对印度采取这种步骤是怎么想的，失去了宝贵的东西——印度的友谊；它至多得到了一些不毛的山区。对他们我无可奉告。我可以猜测各种各样的东西，西藏发生了什么事，这个和那个，等等；他们向外扩张的旧政策……不管可能是什么；对我来说这是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

在联邦院的激烈辩论中，尼痛恨周恩来“背叛”了中国由来已久的传统“文明行为”，并且承认他确实为当时中国发表的声明中所掺杂的粗鲁的过激语言感到震惊。

印度对中国“扩张主义”的指责对亚非团结产生了严重后果。边界问题引发了其它几个重要问题：为什么双方不能“存异”？为什么当时这两位最伟大的政治家对对方感到如此地失望？根据印度方面的一份材料记载，当时尼心神极为错乱，以致于他“掷骰子来推断中国人何日跨过我们的边界”。中印边界问题对中国针对美国遏制政策所采用的统战战略有什么影响（这个统战战略联合“中立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共同反对

“帝国主义”）？

在1959—1962年期间，周经常重申中印之间不存在分离两国的“重大问题”。事发之后，周得出结论说：事实上，西藏给中印关系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因为印度政府从未真正接受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

60年代早期，尼不断受到议会的攻击，认为他没有对中国人民解放军1950年解放西藏作出反应。尼认为西藏并不是“我们装在口袋里的东西，由我们拿出来递给中国的。”1950年印度尚无军事实力向中国挑战，因此，尼认为，对他个人是否没有弄清中国的“宗主权”和“主权”之间的区别这个问题进行争论是完全无聊的。

其实，边界争端源于中印双方缺乏相互的信息沟通。在50年代中早期，双方都集中注意力于地区问题和国际问题，由于冷战在亚洲的发展更为重要，边界问题当时并未被看成是个紧迫的问题。作为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印度和中国双方都极力想赢得国际社会的关注。周和尼都专注于自己能否引起国际社会的轰动，成为大人物。早期在需不需要让中国承认麦克马洪线问题上，印度外交决策界有过一些分歧，但尼站在前驻华大使潘尼迦一边反对巴杰帕伊提出的建议。

1954年6月25日，周首次访问新德里，在机场尼和周热烈友好地拥抱。周此行是在日内瓦会议休会期间进行的，是来寻求亚洲对其在印支问题上提出的方案支持的。这是使日益发展的中印关系正式化的大好时机。周早期在北京曾向潘尼迦大使保证，中国有意促进印度在西藏地区在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和经济利益，但并没有特别提到边界问题。1954年4

月中印关于西藏问题的协议促进了这种关系，该协议被当成中印关系的正式基础，但它也被周当作在日内瓦发起统战攻势的一部分。

当时在议会辩论中，尼训斥了那些将中印协议看作是承认中国在西藏的主权的反对派议员。尼回答他们质询时说：

“这项协议不仅对我们国家有益，而且对整个亚洲和其它地区也有益。”尼训斥反对派说，既然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许多“我们不喜欢”的东西，我们就别“像堂·吉珂德那样手持标枪对我们不喜欢的所有东西都乱反一气”。

周的外交“工作作风”无话可说。他来印度是“学习”来的。他想学习有关印度的经济发展和工业建设的经验。周谦虚地说他对亚洲大多数国家的了解很有限，甚至包括像缅甸、印度尼西亚和锡兰这些国家，他需要领教尼的博学多闻的主张，尼谦和地承认他对这些国家的了解十分广博。

随着关于西藏的协议的签订，周和尼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尼又为周访问缅甸扫清了道路，吴努随之成为五项原则的第三位“倡导者”。周接着去会晤了胡志明，胡赞同将“和平共处”战略方针作为日内瓦解决印支问题的基础。

尼对周的访问作了回访。1954年10月他飞抵北京，从机场到北京市中心受到沿途100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尼引用圣雄甘地的教义对欢迎他的群众说：“和平并不仅仅是没有战争而已。它是一种积极的东西。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思想和行动方式。”周为印度干杯。他对尼在抗日战争期间向中国提供的支持、印度对新中国的迅速外交承认、它在联合国

支持中国的立场以及它在印度支那停火中所起的监察作用表示感谢。

据印度方面消息来源说，尼提出了边界问题，他认为中国地图上划的边界线不正确。周告诉尼说，政府尚未完成对地图的研究工作，为此还得依靠国民党时代的旧图。周可能太想当然地认为边界问题有充足的时间加以解决。

在周的思想里，中印关系所具有的重大国际意义是最重要的。在1954年12月茂物会议上，尼和吴努倡议邀请中国参加万隆会议。他们的邀请取得了成功，但他们对巴基斯坦和锡兰反对将五项原则包括在最后公报中却无能为力。在万隆会议上，周进一步赢得了相当大的声望，当他1956年11月至12月再次访问印度时，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欢呼：“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在同尼进行的讨论中，他谨慎地对西藏作为中国的一个自治区的地位进行了解释，但他对在印度噶伦堡出现的一些秘密活动进行了严厉的质问。当时一个西藏流亡团体在那里煽动反对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地位。用周的话说，这些活动是由美国和台湾的特务组织挑起的。

尼再次向周保证，印度政府决不会宽容这种活动。在会谈中，周提到，尽管历史上的麦克马洪线是非法的，但中国军事和行政人员也不跨越这条线，以保证边界的安宁。这一点成为后来中印在边界问题上出现分歧的一个根源，因为印度政府认为周的保证等于承认了麦克马洪线，其实，周的意思只不过是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将未来的边界划定暂时搁置起来而已。

也就在11月下旬，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对新德里进行了

访问，围绕这次访问而举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使得噶伦堡问题十分敏感。周对这样一个欢乐的气氛被一些“不友好的声明”破坏了而感到遗憾，例如，孟买市长说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边界问题同中国在西藏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58年后期，尼赫鲁终于就中国修建一条穿过阿克赛钦西北部的公路一事提出抗议，这条公路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后勤补给线，它将新疆自治区和西藏连接了起来。1958年12月14日，尼写信给周强调指出，1954年的中印协议已表明中印之间不存在边界争端问题。

周于1959年1月23日回信解释说，他1954年不提正式划界问题的原因被曲解了，有人把它看成是将习惯边界当作可以接受的正式划定的边界的一种确认。中国的意图已说得很清楚：对边界问题我们将进行研究，并且准备当“业已成熟”时对边界进行正式划定。

1959年3月10日，拉萨爆发了西藏叛乱，这使中印信奉的五项原则受到一次严峻的考验。中国的报道指出，西藏地方政府中的成员同一些“上层反革命分子”联合起来“胁迫达赖喇嘛”。3月19日爆发了全城战斗，但到3月22日中国军队就控制住了局势。尼赫鲁同日写信给周恩来，再次指出他“……有点惊讶地了解到这块边疆从来都未属于过中国政府”。

3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必须彻底镇压西藏的“反革命”，与此同时，它对尼赫鲁发表的不干涉声明表示欢迎，他将噶伦堡说成是“反革命”的中心。达赖喇嘛被“挟持”到印度为中印关系注入了一个重大问题。达赖喇嘛4月

18日发表的声明惹怒了中国人，他在声明中提出西藏必须从中国独立出去，而且这项声明是逼过印度外交部情报机构发表的。前美国国务院分析研究办公室主任曾详细透露，自50年代早期以来，美国和国民党就在西藏广泛开展情报活动，其中就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插手了达赖喇嘛逃往印度的活动。

对西藏局势周恩来作了一个十分明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析。1959年4月18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指出，西藏的社会改革在西藏的一些上层遇到了封建势力的抵制。他说，“反革命分子”运用宗教破坏社会改革。随后，周号召对西藏的“反革命封建”宗教表现进行深入分析：

西藏的反动分子常常装出一副虔诚的模样，说是希望人们同登天堂。但是，他们却把西藏变成人间地狱，并且想使西藏人民永远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陷于比欧洲中世纪更野蛮、更加残暴的黑暗深渊。

周指出，西藏120万人口中只有2万来人参加了叛乱活动，他坚定地认为西藏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支持社会改革。

他在声明中向尼赫鲁传递了下列信息：我们希望一切友好的朋友，是指那些愿意坚持同我国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声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朋友们，对于这些明显的绝大多数和极少数的划分，应当首先弄清楚。

周不相信“一小撮”的“恶意煽动”可以破坏五项原则“倡

导者”之间的关系。不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4月28日的最后决议中却提到了“印度某些政界人士”的“极不友好的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

5月初，中国新闻界对印度议会讨论西藏局势提出了批评。尼4月27日发表一项声明，断然否认噶伦堡是“西藏叛乱的中心”，他的声明全文刊登在4月30日的《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指出，尼坚决表示他将遵循“不干涉”原则，然而，他却在干涉中国的内政。干涉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尼公开谈论叛乱就是政治干涉，尼本人与印度右翼政客没有瓜葛，但他认为叛乱具有“相当重要意义”，将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正好帮助了那些右翼政客。尼认为叛乱是“悲剧”，中国认为他这样评论中国内部事务违反了五项原则。《人民日报》社论说：“作为印度的朋友，作为尼赫鲁所讨论的问题的当事人，我们认为，指出这个错误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鲁的逻辑，那么，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许的，整个中国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许的”。

既然承认印度人民对西藏人民有一种基于久远的宗教和文化联系所造成的“亲密”感情，西藏是中国多民族国家的一部分，印度人民对于整个中国人民也是有亲密感情的，印度人民不是高呼“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吗？这篇社论很可能是经过周恩来批准发表的。他还和过去一样，经常审阅《人民日报》要发表的关于对外政策的重要文章的校样。

周十分关切中印关系的稳定性和重要意义，因此，他对尼提出了一个含蓄的警告，指出，中国对西藏及边界局势十分关注。双方都向对方再次保证决不在边界采取片面行动。每一

方都清楚中印关系是各自对外政策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在5月16日的声明中，中国大使告诉印度外长杜特，中国政府对印度做出的不加入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决定感到很高兴，他坦率地对印度方面说：“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据说，印度外交部认识到，平息西藏叛乱对印度并没构成什么威胁，还意识到中国想避免造成“两个焦点”。

中印双方都知道各自的利害关系，不过，8月下旬在郎久还是发生了军事冲突。9月8日周恩来在致尼赫鲁的一封信中承认，各自在边界问题的立场上确实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发现这样一个事实，他和尼一样感到意外，不过他对尼3月22日的信没作其它解释。周直截了当地将郎久发生的边界冲突同西藏局势联系了起来，指出，正当“西藏叛乱分子”开始进入印度时，印度军队越过了印度自己所保证的麦克马洪线，以庇护“西藏武装叛乱匪徒”。周要尼不要对中国军队的调动有误会，他们没别的动机，只是在追击西藏叛乱分子。周做出了下列保证：

我可以向阁下保证，中国政府调遣边防部队仅仅是为了阻止残余的西藏武装叛乱分子跨过边界……去从事扰乱活动……这显然是为了保护边界的安宁，对印度一点也不构成威胁。

9月10日，印度政府建议双方谁也不要派送军事人员去郎久地区，但是10月21日又爆发了一次边界冲突。周11月7日又致信尼，他不再着重谈对边界问题的看法，而是集中谈

如何消除边界紧张局势。他提议将印度9月10日提出的建议扩大到整个边界，双方军队一致脱离接触，沿整个边界开出一条40公里的走廊地带，暂时中止划定已协商的边界。12月17日，周对这项建议作了进一步阐述，指明军队的这种脱离接触决非意味着放弃各自对边界的看法。他否认有任何领土野心，他指出，在社会主义中国，亲帝国主义的“剥削阶级”已无法再“通过对外扩张和挑衅来得益”了。

周进一步申述到：

中国土地辽阔，还有一半以上人口稀少，有待大力开发。如果认为这样的一个国家还想在邻国的一些荒无人烟的地区找麻烦，这岂不太荒唐可笑了。

中国方面毫不隐讳地指出，印度目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担心中国会恢复中国固有的历史倾向，这种说法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扩张”，因为它有加强美国在亚洲推行遏制政策的危险，并且有可能使周恩来在万隆所做出的努力付诸东流。

周向尼摆出的论点在11月26日外交部照会中得到重申。外交部认为印度对新中国缺乏真切的了解。中国自己的疆土有半数以上有待开发，中国人民不需要“侵夺别国的土地来养活自己”；中国“资源丰富”，“国内市场广大”，因而，中国不存在国内压力“从国外攫取原料”，也不需要“向国外倾销成品”。

周在12月17日的信中建议两国总理举行面对面的直接谈判。周表示他将很高兴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接待尼，不过，如果

“不方便”的话，他也愿意在仰光——已得到缅甸的同意——举行会谈。对周来说，中印间的边界问题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至关重要，仅仅依靠相互间的信件来往将解决不了问题。

然而，印度政府却想继续通过信件来交往。尼采取极其古板的方法。他想在可以达成两国总理进行谈判的决定之前，尽可能多地掌握能摆在桌面上的凭证。在较早一点的时候，11月16日，尼曾坚持“适当地了解事实”是制定边界脱离方案的一个关键性的先决条件。尼相信他已经掌握了事实，而且对他自己所持的道德立场很有信心。

中国外交部12月26日的照会对印度的抱怨作了答复。印度说，中国方面对印度提出的维持边界现状的具体主张没作出答复。照会继续对边界问题作了进一步分析。它认为，拥有总人口超过十亿的两个大国为了“暂时的、局部的争端”而发动战争，这是“荒谬的”。它恳请印度方面考虑进行谈判。在1960年2月5日的一封回信中，尼同意会晤周。早些时候他拒绝了12月26日在仰光举行会晤，但随后他打算邀请周去新德里。尼要周3月份来印度，并且声称在议会讨论国家预算期间他本人不能离开印度。

中印总理4月19—26日举行了会谈。会谈气氛极其紧张。和过去的欣喜若狂的友好表示形成对比，宴会讲话调子显得十分压抑。尽管在翻译的陪同下周和尼进行了20小时的私下讨论，但双方仍未能有重大突破。根据印度方面一项资料透露，陈毅告诉斯瓦兰·辛格，中国方面对西姆拉会议或麦克马洪线任何形式的承认都将“导致中国国内的一场轰动”。他还说，周从来就没有承认过麦克马洪线，当然，他“……没权

利这么做。”

双方都十分清楚，西藏局势对双方关系产生了影响。印度财政部长莫拉尔基·德赛向周提出，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的存在与中印间达成的相互谅解有抵触，西藏自治区的主权应得到中国的尊重。他的话令周感到很不快。这位部长似乎以为中印间达成的谅解可以不让中国在这块主权领土上驻扎军队。印度政府已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统治权，而且，就连在中国对它拥有更为有限的“宗主权”的历史时期，军队也是可以驻扎的。

周在边界问题上提出了一项重大的交换条件，如果印度方面接受中国在东拉达克的阿克赛钦段的立场的话，他将认可印度关于麦克马洪线所提出的要求。但印度方面无意接受这样的交易，因为这等于“部分废除了北部边界的法律效力”。

尼固执地坚持英国人历史上签订的条文，而中国方面拒绝接受英帝国主义历史上强加于人的东西，认为它明目张胆地无视中国的主权。的确，承认西姆拉会议作出的决议将使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地位成为疑问。就中国政府方面来说，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中国还从未就正式划界问题缔结过正规的法令，而这种划界将由两个新独立的亚洲国家沿着中国人所称之的“传统习惯线”，根据实际行政管理现实来进行。

周离开了新德里，两手空空，一项协议也没达成。后来他告诉记者：“我一点也无法使尼赫鲁松动。”早在1959年11月，尼曾说过，在两国总理会谈前有必要广泛考虑一下“事实”。尼在信中写道：“因此，我们会晤的性质应当这样，我们不当迷失在林立的数据资料里。”而在实际会谈中，尼铁了

心一定要纠缠于“事实”。总理会晤结果只成了相互对照“事实”。

周竭力想在向尼赫鲁提出的“六条建议”中同尼共同谋求到最低限度的共同之处。4月25日发表的联合公报宣布：两国政府官员将轮流在北京和新德里举行会谈，研究并交流各自所掌握的“事实”。经过6月到9月的谈判，双方获得的成果只是列出了一个分歧目录清单。

周对其早期的声明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指出，维持“实际控制线”，对双方的正式主张和要求决无损害。单方面行动的危险周看得很清楚，他的“六点建议”强调双方谁也不应该将领土要求作为解决问题的先决条件，各方应制止在“边界沿线各地区”巡逻。尼4月26日在人民院说，在他同周的讨论中，他们“……碰到了一大堆棘手的而且差之千里的各类数据材料。”

正如周所关注的那样，中心问题是印度人不甘心于中国在西藏的地位。埃德加·斯诺在1960年10月一次对周的采访中提到，尼赫鲁曾说过，中印争端的基本原因可能是存在着这样一个事实：印度和中国都是“新近独立的国家”，并受到强烈的民族主义领导所致。周听完后，将印度和缅甸作了比较。他说，缅甸也是“新近独立的”国家，但缅甸对边界问题直接谈判却抱“积极态度”。周认为印度的动机在于：

印度并不想就此解决疆界问题。他们内心的真实意图是希望将西藏变成国际缓冲区。……他们不想让西藏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西藏。是以在西藏动乱被地平之后，……他们更表不满，跟着中印边界问题便冒出来了。

周确信，举行总理直接政治谈判对局势发展至关重要。周竭力让印度政府注意到他成功地通过谈判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1960年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授予周为中国的全权代表。1月28日，他签署了两个协定，一项是为解决中缅边界而达成的协议，另一个是中缅友好互不侵犯条约。前项协议对印度有着特别重大的含义，因为周曾表示，1954年当时由于中缅边界没有正式勘察并且中国还得就麦克马洪线要同缅甸进行协商，所以中缅边界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而今，当新德里的“印度人中国人是兄弟”的呼声日益削弱时，仰光却响起了中国缅甸是“胞波”（Pauk Phaw）的大合唱。

最初，周被邀请于3月下旬到新德里，就在3月21日，周又同尼泊尔签订了中尼边界协定。尽管有关边界地图和实际管辖权有抵触，该协定还是正式划定了边界。同周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提出的建议一样，这项协定也包括了一项规定各方将其武装人员后撤20公里的条款。尼泊尔首相毕什韦什瓦·柯伊拉腊对周为在国际关系中贯彻五项原则而做出的“不懈努力”表示感谢。

周的这种努力也同样表现在签署中缅边界协议上，这项协议签订于196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1周年之际。中缅边界也属于“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吴努承认该协议的达成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但他对周总理高超而熟练的外交技巧倍加赞赏：

要特别对这项协议中国方面的主要设计师——周恩来总理表示感谢。从协议最初开始，周就与它有着不可分割

的联系。在整个谈判过程中……他一直友好、耐心、彬彬有礼而通情达理。甚至当谈判面临的困难似乎难以逾越时，他也不失当初风度。

而尼赫鲁却被中国的外交和宣传弄得心烦意乱。1961年12月11日，他在联邦院说：

各国政策可能有差异，甚至差异非常之大……，不过，仍存在着某种高尚的行为标准，这种高尚的行为标准直到最近几年应该说还在指导着外交关系。不幸的是，冷战结束了它。然而，使我感到痛心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国家——它有着数百年……甚至数千年文化传统，更以行为有度和彬彬有礼著称的伟大国家——尤其应有这样的高尚行为……

中印边界问题的解决同其它一系列和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周欣然同这些国家达成边界协定使印度政府不是感到宽慰而是感到不安。印度官方对附在中缅边界条约中的地图正式提出了保留。1961年5月，尼赫鲁政府对巴基斯坦和中国政府就确定相互边界问题进行谈判达成的协定竭力反对。印度认为，中国人违背了其曾作出的保证，印度政府认为这项协定表明中国已偏离了其不干涉克什米尔纠纷的既定政策。

中印对边界进行的调查并没能使日益增强的冲突有所和缓。尼赫鲁进一步提出以边界调整为条件的高级谈判，中国的新闻报道9月份对他采取的“假谈判真侵略”的两面政策进

行了抨击。中国方面声称，印度片面地认为中国愿意举行谈判是出于软弱而不是自我克制。

从10月20日起，中国军队在边界展开直接行动，并且说是进行“自卫”反击。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尼赫鲁，说他大肆散布“谎言”——这是对他所谓坚持“真理”的极其辛辣的谴责。但周在其信件中却有所克制，不过他还是允许刊登了这样的社论。尼被指责“撒了谎”指的是他声称中国在其1954年关于西藏的贸易协定中已承认边界为己划定了的这件事。和英“帝国主义”一样，尼承认中国在西藏有“特别地位”，但他并不承认中国拥有那里的全部主权。《人民日报》指出：“事实是无可争辩的，中国平息西藏叛乱之后，印度当局就处心积虑地破坏边界现状……”

中国外交和武力双管齐下。采用武力的依据和1958年夏台海危机时的类似。中国对印度单方面行动和尼赫鲁的边界“前进政策”作出了强烈的反应；采取这种严格限制的军事行动是为了对付所称的印度军队在边界的西部和东部地区发动的大规模攻势。

双方谁也不想打一场大规模的地区战争，这样的战争将有损于国内经济发展。周有充分的理由想使冲突尽快结束：国际上正出现将中国说成是侵略者的声势，这危及到社会主义和中立主义的战略联盟。周多次指出，“帝国主义”正利用冲突进一步向亚洲渗入。实际上，美国的情报部门就已经认为，冲突持续下去将对美国的利益有利。在这种情形下，中国特别渴望同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达成边界协议。

在中印争执期间，双方在当时国际关系趋势的看法上也

有分歧。例如，1959年印度在一份照会中表示，在美国和苏联正日益接近以共同结束冷战的形势下，中印边界却出现紧张，这是件“特别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而这时的中国却在美“帝国主义”的威胁问题上正同苏联进行着严重的意识形态斗争。

10月爆发的边界冲突促使双方发表了一系列声明，两国总理之间更加强了信件交往。10月2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一项声明，认为冲突是“严重的”和“极其不幸的”，尤其是印度和中国都是五项原则的“倡导者”。这项声明呼吁双方“尊重整个中印边界双方之间的实际控制线”。中国方面提出，如果印度同意尊重中段和西段“传统习惯线”，中国愿意“通过协商”在东段撤回“实际控制线”以北。声明第三项再次呼吁举行总理直接会谈。周在同一天致尼的一封信中又重复了这些建议，不过他表示，不要纠缠于冲突的根源，双方“应当向前看”。周在信中再次提出，如果尼赫鲁来北京“不方便”的话，他将乐意再访德里。

尼在10月27日的回信中指出，他的内阁和其它几个有关部门对三点建议的细节不甚理解。在他看来，“实际控制线”应该就是1962年9月之前的边界线。11月4日周在回信中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认为这场“不幸的边界冲突”是“极其令人痛心的”；然而，在“实际控制线”问题上，他请尼赫鲁参看他1959年11月7日的信。日期上的这种分歧正是问题的关键。

周表明，恢复到较早日期的边界线将使双方做出的保证“平等”，这将与边界东段的“所谓”麦克马洪线和西段及中段的习惯线相一致。尼的方针是要保证他1961年以来推行的

“前进政策”所取得的成果。据称，为了缓解局势中国单方面停止巡逻的时候，印度军事人员乘机在边界建立了43个“据点”。周表示：“……不论冲突的发展如何，双方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应该以战胜者自居。”周指出，印度政府坚持其9月8日前边界线的立场是强制他的政府接受“只适宜于强迫战败者接受的屈辱条件”。

周11月4日的信发出四天之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从国际角度对边界冲突进行了分析。社论警告说，印度为了寻求“美国的巨大援助”正在放弃其“不结盟”的立场，尼在为美国的用“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略煽风点火。社论指出，尼改变现时的方针还来得及，它提请他注意佛教的一句箴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11月11日，《人民日报》更明确地将尼同美“帝国主义”联系了起来，指责他在1961年贝尔格莱德不结盟国家会议期间，在关于刚果、南越和古巴问题上替美国辩护。

中印边界敌对状态的逐渐升级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尼向各国政府首脑发电报，申述他的关于中国“侵略”印度的观点。而周于11月15日也向非洲和亚洲国家的领导人打电报，谴责印度的“军事冒险”。周指出：

印度以为中国的经济困难严重到不可克服的程度，美国支持下的蒋介石集团侵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企图牵制了中国的国防力量，中国西南地区的防务空虚，因而认为这是它在中印边界全线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的良好时机。

周指责印度“公开乞求”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他重申仍愿意再次前往新德里。对印度指责中国的“扩张主义”，周回答说：“……中印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矛盾……”，并且他保证：

“只要还有一线希望，中国政府将继续寻求和解的途径……。”

周1962年11月21日单方面宣布了三条措施，这使他迅速抓住了外交主动权，三项措施包括11月22日停火，中国军事人员分阶段逐步撤退到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之后20公里处。

周抓住一切机会阐明中国的立场，例如，他同伯特兰·罗素进行了个人通信，罗素于1月8日、16日和19日给他写了几封信。在回答罗素爵士的关注时，周指出了中国10月24日提出的建议以及11月21日提出的三条措施，要求他运用他的影响让印度政府采取相应措施。

美国国务院情报机构不希望尼采取相应措施，因而要求印度坚持其关于9月8日前“实际控制线”的立场。情报与研究室代理主任汤姆斯·休斯在给总统的关于中印冲突问题的报告中，对其具有的战略意义归纳如下：

冲突的延续从现实角度看将对美国有利而无害，它将给我们以便于解决印巴问题的机会和达到目的的手段，使中国的侵略保持在最不利情况之下，在亚洲事务中获得印度的支持，重新选定具有历史意义的国际政治取向，并且使苏联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况之中。

中国政府收到国外众多的解决冲突的建议。例如，周乐意支持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11月13日电报中的建议，尤

其是他对所有外国对中印边界冲突的插手进行的谴责。11月13日，周对坦噶尼喀*政府电报建议作出了答复。坦噶尼喀政府五点建议中有两点被看成同周10月24日提出的立场是一致的，但第四条关于三国仲裁的建议被有礼貌地拒绝了，它违反了周关于边界问题应由中印直接谈判加以解决的既定立场。周希望卡瓦瓦总理能赞成：“……对（中印）双方都友好的第三方所起的积极作用，不在于直接介入双方的纠纷，而在于推动双方进行直接谈判。”

在外界插手问题上，中国对南斯拉夫想以“不结盟”调解者的身份确立它在中印争执中的地位企图予以了辛辣的回击。本来，赫鲁晓夫要求中国人要考虑到印度在边界上的安全需要已激怒了中国人，而铁托提出苏联应当在中印边界争执问题上起“平息”作用，这无疑是在疮口上又撒把盐。

尽管中国对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并无什么敌意，纳赛尔10月31日提出的四点建议尤其不受中国人欢迎，因为它支持印度所强调的双方撤到10月份之前控制的地点，也就是说，撤到9月8日边界线之后。实际上，尼赫鲁很快就在议会辩论中援引了纳赛尔的建议。他为纳赛尔“……有劳看清了事实……”而感到欣慰。在议会辩论中，他抱怨说：

和中国人之间的障碍在于，他们对世界其它地方所发生的事有着一种极其反常的观点和看法。这是中国人的一个由来已久的特征，泱泱大国，地域辽阔，他们就以为在

* 坦桑尼亚的一个地区，后与桑给巴尔合并成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译者

其疆土以外的都是些劣等种族……

正当尼在大谈“中央帝国”所谓的种族优越感，以唤起人们注意时，周指出他成功地同尼泊尔、缅甸和巴基斯坦进行了边界谈判，而且他很有份量地提出中国单方面停火并后撤。尼在亚洲未能获得在西方那里得到的那样的理解，在西方他相当有声望。

随着争执的公开摊牌，双方都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持。对外界提出的帮助，周不得不小心谨慎地作出系统的官方回答。12月10日至12日，缅甸、柬埔寨、锡兰、加纳、印度尼西亚和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等六个不结盟国家就中印边界问题召开会议。经过审议，会议形成了六点建议，锡兰总理在北京和新德里同两国首脑会商之后于1963年1月19日公开宣布了这六点建议。会议支持事实上的停火以及贯彻实施周恩来11月21日提出的三条措施；不过，关于军队在东段的部署的第三点显得倾向于印度坚持的9月8日分界线立场。

周并没有合尼的心意去拒绝这项建议。的确，拒绝将使他的使中国成为受损害的一方的外交努力落空，中国一直在真诚地寻求谈判解决。周于1月9日写信给锡兰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表示中国“原则上”赞同科伦坡建议，并且以它作为中印之间举行直接、实质性会谈的“初步基础”。

周指出，在原则上接受这项建议的同时，中国还希望作出“两点解释”。显然，科伦坡建议谈到了在西段脱离接触，但在东段并没有明确相同的脱离接触原则。据中国所称，印度军队在1959年侵犯了实际控制线之后在东段建立了43个据

点。周正式向科伦坡国家通报了他的保留，即，要求印度军政人员保持西段现有军事现状的条款应适用于整个边界。周强调说：“……在东段，印度方面不派遣它的军队重新进入1959年11月7日中国边防部队所撤出的实际控制线以南地区，只派遣民政人员……”第二，“为了响应科伦坡会议的和平呼吁”，周同意在1959年11月实际控制线的中国一方不设立边民检查站，假如印度军事人员和平民不再进入争议地区的话。

周料想中国和印度会很自然地科伦坡建议作出两种不同的解释。尼赫鲁把建议看成是对印度9月8日实际控制线立场的有力支持，因此，他表示，印度不像中国，它完全接受科伦坡会议建议，将它们作为谈判的“明确的”而不是“初步的”基础。尼可能希望获得宣传上的优势，不过，他对建议的看法同周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以至于他将科伦坡的活动看作是在实施仲裁。随后，周重申了他早期的声明，说印度正竭力为参加直接谈判设置先决条件。

中印政府都已到了将义无反顾的地步。在周看来，印度正变成像南斯拉夫一样的另一个“反动”中心。“现代修正主义”的南斯拉夫假充“不结盟”角色，目的是要偷偷地扩大美“帝国主义”的影响。“铁托集团”在“中立主义”的幌子下，正“鱼目混珠”。铁托对印度“反动派”的支持表明了印度对外政策的潜在用心，也就是诱使亚洲和非洲的中立国家同不结盟国家结成似是而非的联盟，以阻止全球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

因而，铁托和尼赫鲁十分危险，他们有破坏中国在亚非舞台上的统战战略方针的危险。尼不是曾拒绝承认麦克马洪线是“英帝国主义的遗产”这个事实吗？此外，分享美国的军事

援助对印度“统治集团”的确是个简单而具有决定性的试金石。“印度资产阶级”当时被说成“同英国资产阶级和印度地主阶级具有血缘关系”。《人民日报》援引一位“美国垄断集团发言人”的话说，尼采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真是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天赐之物：“（社会主义）在亚洲人民中间是个十分流行的词，在亚洲，资本主义已被认为同殖民主义不无二致——几乎是同义词了。印度人已将社会主义从共产党那儿夺去了。”

指责不结盟似是而非与铁托和尼赫鲁在1961年9月召开的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第一次会议上的行为有关。尽管中国政府对他们各自在不结盟运动中的作用有保留，但并没直接对不结盟运动本身进行攻击。相反，周从1963年开始将注意力集中于印度尼西亚关于召集第二次万隆会议的倡议上。

中印边界争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对美国遏制政策作出的反应，以及中国在亚非世界中的地位。从宣传上和总的感觉上来说，这次边界问题把对中国的总的评价联系了起来：中国是个爱好和平的国家还是个具有潜在侵略性的国家。这种评价甚至还将中国对华盛顿、莫斯科和伦敦三国之间在核禁试条约问题上日益增强的友好关系做出的反应联系了起来。当尼赫鲁指责中国“侵犯”中印边界时，苏联人也在抱怨毛泽东一心想让世界陷入一场核决战之中。

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的宣传机器都大肆渲染毛泽东政权意识形态上的疯狂性，毛泽东关于原子弹是“纸老虎”的论断被看成是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不负责任的证明。8月5日，在莫斯科签订的核禁试条约对正值发展自己核计划之际的中

国有着极为直接的影响。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在政策上曾积极考虑用核武器反对中国，至于这到底如何对中国产生影响则有争议。

“核讹诈”，正如周恩来所称之的那样，当然是美国最高行政当局要考虑的。美国情报机构曾通知白宫，在塔里木盆地有一个可疑的试验地，而且包头的反应堆即将进行裂变反应。美国国防部致白宫的一份备忘录指出：“这样的发展不能不对我们的（亚洲）事业有危害，我们得设法延缓中国核爆炸这一天的到来。”

1964年9月，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批准了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的政策建议，美国将暂时不“对中国的核设施采取单方面军事行动。”午饭过后，还达成了一致意见，万一将来中美发生敌对行动的话，采取这种选择将是积极考虑的一个方面。美国国务院“非常秘密地”被授权通过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提议同苏采取“联合行动”这个问题。这类行动包括从对中国的核试验提出警告，到“可能同意合作采取一次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

8月2日，周恩来向各国首脑发了一封信，补充说明中国政府7月31日的声明，信中建议他们都参加一次国际会议，以达成彻底消除核武器。苏联政府于8月3日发表了一个尖酸刻薄的声明，对周的信函作了冗长的答复，将中国的立场说成实际上“无异于纵容那些鼓吹热核世界大战的人”。苏联的这种态度导致中国人于9月1日指责苏联人将1957年中苏关于核武器问题达成的协议的详情告诉了美国人。

中国政府9月1日的声明抱怨苏联政府“大言不惭”：“苏

联政府的声明甚至大言不惭地说，只是因为苏联的核武器在保护着中国，我们才能够批评他们。”苏联对中国关于社会主义可以“通过热核战争”赢得同资本主义斗争的胜利是“非人性的政策”，是“非理性的残忍观点”，这使中国政府在亚洲和非洲处于守势地位。

对于毛泽东1957年关于东风压倒西风的声明，应进行具体解释和重新解释，它并非表明毛积极支持核战争，相反，毛的整个战略重点与防止新的世界大战有关。毛曾同尼赫鲁争论过核战争问题。他没说要挑起这样的战争，但他确实问过万一“战争狂人”（指的是美国）“到处扔原子弹和氢弹，那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尼赫鲁认为整个人类将被毁灭。而毛却认为，万一这样的话，“帝国主义”将失去最多，从战略上看，中国关于美国核武器威力的声明是想事先使它们对付中国的效用减弱，就连美国中央情报局也明白，中国政府认为，它拒绝在美国核优势面前屈服对“核讹诈”企图有着先发制人的作用。

在索马里总理阿·阿里·舍马克8月4日访问北京的时候，周恩来在普遍裁军和禁止核武器问题上再次提出保证，他说：“……中国政府同非洲国家政府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愿望。”不过，如果周要寻求国际上对核禁试条约的谴责的话，他不会得到什么反应。亚非国家在给他8月2日信函的回电中，都普遍表示欢迎在核裁军方面的任何有建设性的建议，而且，大多数国家政府将核禁试条约看作是向前迈了积极的一步。

就连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他对非洲政治革命的可能性

的看法与周恩来一致——也表明了下列保留意见：

在某种程度上我同意你的意见，也许这样一个会议可以有助于达到彻底而普遍的裁军。不过，我感到在联合国范围内这样做才有效，这就是为什么我迫切要求……现在接受中国进入联合国的理由。

当然，周恩来也考虑到了联合国。他一直在算计着联合国每年在作为一项“重要问题”的接纳中国问题上的投票情况。周认为发动大规模外交攻势的时机已成熟，这在争取伴随不断增长的非洲民族独立形势而来的政治优势的同时，还可以弥补由于中印边界战争和核禁试问题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从增加中国统战战略方针运用的机会来看，蓬勃发展的反殖独立运动具有十分积极的战略意义，周恩来积极促进中国加入联合国过程的进展。12月12日，中国外交部重申了它9月份给美国以及其它几个亚非国家的通报，正式宣布中国在联合国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声明指出，在联合国成员中亚非国家构成了半数以上，这些国家数量的增加应在联合国主要机构内席位的再分配上反映出来。外交部否认有主张修改联合国宪章的意图，而是采取了下述先发制人的立场：

中国政府希望指出，关于联合国宪章中有关主要联合国机构席位总数条文的修改问题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作为国家首脑，刘少奇本人也帮助发起了外交攻势。1963

年5月，他访问了缅甸、印度尼西亚、柬埔寨和越南。而周则从1963年12月13日至1964年3月1日进行了更为艰难的72天访问。他的十四国之行遍及阿拉伯联合共和国、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和锡兰。

中国政府支持苏加诺提出的召开第二次万隆会议的倡议，以抵消铁托和尼赫鲁在不结盟内部玩弄的亲美花招。周恩来个人深深为非洲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所感动。在1964年4月作的关于这次出访的报告中，周指出，在召开第一次万隆会议时，非洲只有4个独立的国家，而到他访问时，非洲59个国家和地区中已有34个赢得了独立。周1955年前的统战方针大部分局限在亚洲，但召开第二次万隆会议将有希望在非洲发起一场要广泛得多的外交攻势。实际上，陈毅曾悄悄建议苏加诺不要坚持在万隆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选择非洲的一个地点召开要更理想一些。不过，甚至在发起召开会议的最初阶段，就出现了一些担忧：拟议中的会议会不会取得成功，苏加诺自己的个人能力行不行等。

伦敦的《观察家》杂志曾挖苦说，周恩来在远征访问途中感到“十分为难……他不知道该戴外交官的大礼帽还是戴游击队的贝雷帽。”作为个人，周给人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但中国在非洲的动机有许多令人怀疑的地方。周在与一些非洲领导人的交谈中遇到了一些保留意见，他们对中印边界战争和中国在核禁试条约问题上明显持强硬立场感到担忧。

对《观察家》作出的“大礼帽”和“贝雷帽”的区别，周可能感到颇为好奇，因为他本人并没有对异邦外交和政治作出过

什么区分。周在访问中所说的非洲“革命形势大好”的话成为国际新闻中的头条，但他所反复申述的重要主题是拓展五项原则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歧视，并通过“求同存异”达到亚非的大团结。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万隆精神”的具体运用上，周用显然有别的字眼提出了中国同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相互关系的五项原则：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斗争；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政府奉行的“和平中立的不结盟政策”；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各国人民用自己选择的方式实现统一和团结的愿望；支持非洲和阿拉伯国家通过和平协商解决彼此之间的争端；主张非洲国家和阿拉伯国家的主权应当得到一切其他国家的尊重，反对来自任何方面的侵犯和干涉。

无论走到哪里，周恩来都强调中国支持以科伦坡会议提出的建议作为中印直接的不带先决条件的谈判的“基础”。周坚持认为，不用“帝国主义”插手，亚非国家照样可以解决得了自己的问题。不过，在开罗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表示中国不会参加不结盟会议，因为中国是个“有条约义务的国家”。

周相信，纵然中苏在原则问题上有争执，中苏友好条约还是意味着重要的同盟义务。对于即将召开的不结盟会议，周希望这第三次会议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的旗帜。”尽管中国对铁托和尼赫鲁提出的“积极共处”有保留，周并不试图迫使非洲国家在“万隆还是贝尔格莱德”之间作选择，因为这样会被当作明显的干涉他国事务。在这次亚非之

行的后期，他在中緬联合声明中表达了这样的意思：第二次亚非会议和第二次不结盟国家会议并不是相互排斥的。

为了反击在非洲出现的反华宣传，周对中国的“自力更生”概念进行了系统分析。12月26日在阿尔及尔，周就这一点作了很清楚的阐述：

亚非国家肃清殖民主义势力，发展民族经济，主要依靠各国人民自己的努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自力更生。另一方面，也要靠我们友好国家相互支持，在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的情况下相互援助。

周表述的后半部分提到了相互支持的重要性，这表明周并不以为“自力更生”就是完全排外的闭关自守。

周用“同布尔吉巴总统进行了坦诚的会谈”描述了他突尼斯的访问以及“求同存异”的必要性。周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核禁试条约的本质会“日益暴露出来”，而布尔吉巴总统在宴会致辞中却说得很保留：“中国在亚洲和世界很受尊敬，尽管它时时掣肘着忧虑和不安，但他还是可以在加强和平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上大有作为的……”。布尔吉巴在他对周的私下劝告中更是“坦诚”之至，他当面对周说：“……中国有些态度已经在我们的突尼斯人心中引起了疑虑，例如，中国用武力解决同印度的边界问题，还有中国反对禁止核试验条约。难道你不认为这项条约会给全人类带来一线希望吗？”

在另一方面，1964年1月16日在阿克拉发表的中国—加纳联合公报则有力而积极地强调了两国之间“观点的一致性”。就在几天以前，这里发生了一起企图推翻恩克鲁玛博士

的政变。周的随行人员曾出于安全的考虑建议推迟或取消这次访问，可周不同意，因为他希望表示一下他对恩克鲁玛的支持。周要求他的东道主礼仪从简，取消通常的机场迎送仪式，以确保恩克鲁玛的安全。后来的仪式、会谈等都是在一个城堡内举行的。

在1月15日新闻发布会上，周阐述了中国的“自力更生”原则和中国提供对外援助所遵循的原则，这些原则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紧密相联，他特别着重强调了平等和互利原则。在给自己的外交官的指示中，周将中国的对外政策比拟“如鸟之两翼”。鸟身是国与国关系的框架，一只翼代表文化关系，另一只翼代表经济关系。就发起召开第二次万隆会议而论，周一再强调经济上自力更生、文化上坚持自我这个主题。

在回答加纳新闻记者提出的问题中，周将中国对外援助计划的本质总结为八条原则。周强调这些“社会主义原则”决不允许损害他国的主权：

（中国的援助）决不采取输出资本、直接投资、谋取利润的方式，而是向这些国家的政府提供经济技术援助，帮助这些国家发展自己的独立的民族经济。

对中国的援助项目，周都进行了详尽的彻底研究，在他中南海办公桌上堆满了最新的全套材料，材料中的援助项目布满了旁注。在访问期间，周要求亲自参观检查中国援助的项目。他将中国的援助计划同其他国家的援助方案进行广泛的比较。八项对外援助原则是中国自己援助方案的明确声明，但它们显然也是对苏联和美国援助方案的一种批评。

第一条原则，“平等互利”，它重申了中国在国家间经济关系中寻求互惠的革命需要，这一点在1949年的共同纲领中有所阐述，并且在1954年宣布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又推进了一步；第二条保证中国的援助绝不附带任何条件，绝不要求任何特权；第三条，中国提供的贷款是无息或低息的，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延长还款期限；第四条，重申了中国对“自力更生”的理解，表明援助的目的纯粹是为了帮助受援国“逐步走上自力更生”的道路；第五条，中国帮助受援国建设的项目力求投资少、见效快。这条原则借鉴于国内强调在“大中小型结合的方针”下发展小型企业的做法；第六条，保证提供自己能生产的、质量最好的设备和物质，并且根据国际市场的价格议价；第七条，保证做到使受援国的人员充分掌握中国提供的技术；第八条，规定中国派到受援国的专家要适应所驻国家现时的生活标准，不容许有“任何特殊要求和享受”。

周对“自力更生”的论述有着相当大的政治意义。在第一次万隆会议上，周就认为“革命是不能输出的”。在答复美国和南斯拉夫关于中国将插手非洲政治，煽动革命的观点时，周又用这句话作为回答。一位美国记者问到，目前桑给巴尔*的革命局势是不是“共产党人引起的”，周回击道：

拿桑给巴尔的革命来说，我是从报纸上知道的。要谈这些事件是我们引起的，岂不是掠人之美吗？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当然，我们并不隐瞒，我们同情和支持

* 坦桑尼亚的一个地区，后与祖鲁尼喀合并成为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译者

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可是，美帝国主义把每一个地方的民族解放斗争都说成是共产党搞的，这只能替我们共产党扩大宣传，而绝对吓不倒要起来革命的各国人民。

这次马拉松式的访问，周的收获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同突尼斯建立了外交关系；埃塞俄比亚顶住了美国的压力同周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使周感到欣慰。在准备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问题上，他受到了普遍的支持，但这种支持并不能解释为不支持即将召开的不结盟国家会议。周声称，他同亚非国家首脑的会谈表明“……他们都认识到中印边界局势已缓和。”或许这次亚非之行产生的最不朽的成果要算是宣布了中国对外援助八项原则了，它在后来联合国辩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有着巨大的影响。

在另一方面，中国代表团中对美国宣传所起的效果感到担忧，美国宣传机器描绘了一幅显然迷人的殖民主义已告结束、美苏为和平达成谅解的新时代已到来的图画。在周所访问的这些国家中，有相当多的国家表示了对印度的关心以及对部分核禁试条约明显的支持。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1964年2月28日在锡兰的斯里帕里学院发表的演讲中也是这样认为的。她指责美国发动了一场“诬蔑诽谤中国人民的运动”。关于中印边界局势，她说：“他们试图将中国坚定不移地争取和平的立场及其在原则基础上通过谈判解决所有问题的愿望当作是好战的姿态。”在谈到中国关于热核战争的态度和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时，她说：“他们试图将中国对那些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

表示的真诚同情和支持曲解为是一种想把世界变为灰烬的疯狂希望。”

尽管美国在非洲发动了外交和宣传攻势，4月10—15日在雅加达召开的有22国参加的亚非会议预备会还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成功。会议决定，第一次亚非会议是在万隆召开的，这第二次会议就在非洲召开。这次预备会议本身是在“通过协商全体一致”的原则指导下进行的，这项原则是在当年苏联企图在国际上发动一场声讨阿尔巴尼亚大合唱的情况下提出来的。在雅加达会议上，这项原则被证明十分有用处，因为参加会议的代表团在是否邀请苏联参加这次亚非会议问题上达不成一致意见。

中国代表团团长陈毅很坦率地表达了他对会议的看法。他十分赞成“协商”和“一致”的原则，并将其作为“行为的共同准则”，这样，多数就不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少数人身上，少数也不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多数人身上。陈毅驳回了印度提出的邀请苏联人参加亚非会议的建议，说它“不合适”，因为“……人人都知道，苏联既不是一个非洲国家也不是一个亚洲国家。”

在1964年10月不结盟国家开罗会议上，印度发起了反攻，尼赫鲁试图赢得科伦坡国家支持他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立场。10月9日，中国政府发表了一项声明，抗议尼赫鲁在中国没参加会议的情况下的所作所为。

1964年，周恩来对五项原则的强调有所变化。在万隆，周曾富有戏剧性地宣布中国愿意同美国进行谈判以缓和台湾地区局势，而且在随后发出的在亚洲—太平洋地区确定集体

安全协议的呼吁中，他精心而巧妙地公开提出美国也包括在内。不过，在1963—1964年的亚非之行中，周指出同美国“和平共处”是很困难的。2月26日在达卡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周再次提出：“只有严格地坚持这五项原则，才有可能和平共处；否则的话，和平共处只是一句空话。”周指出，遭受帝国主义侵犯的国家不应该去“乞求和平共处”。对于美国在联合国的支配地位和苏加诺退出联合国——以抗议马来西亚取得安理会中的席位——之后的联合国组织，周持更为强硬的立场。当不结盟运动将注意力集中于通过联合国集体安全促进平等的时候，周在1月24日发表的声明中甚至提出彻底改组联合国，另创立一个革命的联合国来取代被美国操纵的联合国。

周未能再创造出1955年那样的环境来。同非洲和阿拉伯国家关系中的“五点”新发展正是他在万隆立场的积极点的进一步展开。然而，这个时候的局势要棘手得多，因为随着冷战气氛在欧洲逐步减弱，亚洲的冷战由于1954年和1962年日内瓦协议的失败而扩大了。1965年中苏争论相持不下，两国都在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亚非国家中争取支持，相互排斥对方，这种竞争为不断扩大的风起云涌的非殖民化形势注入了一种新的复杂因素。实际上，“不结盟”构成了对中国统战战略的威胁，中国的统战战略期望“中立主义”同“社会主义阵营”合作，共同战胜“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但在苏美关系改善的情况下，要说服别国相信美帝国主义的危险增加了，这是很困难的。

第一次万隆会议只有较少的一部分国家参加，当时印度

和中国之间有着一个团结的目的。而在有众多新独立国家参加的比过去更大的论坛上，要“通过协商达成一致”也变得更加困难了。1965年，“不结盟”更加吸引人地代替了亚非会议论坛。而且，美国在亚洲的遏制政策是特别针对中国的，尽管新独立的国家对中国常常抱有同情心，但他们并无紧迫的理由要与中国分享遏制所带来的不利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支持苏加诺成了一种义务。新独立的国家对联合国的有力支持清楚地回答了中国在核裁军问题上所持的立场。第二次亚非会议安排在1965年3月10日。尽管阿尔及尔发生了政变，会议还是很快重新作出了安排。6月28日，纳赛尔、周恩来、苏加诺和阿尤布·汗在开罗决定会议再延期。

由于认识到在会议上达成团结在政治上困难重重，周提出中止会议。他认为与会国之间的分歧太大，无法“存异”，这样造成的分裂将必然削弱亚非团结。《人民日报》对10月28日召开的外长预备会议中出现的事情作了评述。中国政府特别担心美国插手台湾和越南，但参加会议的代表在反对美帝国主义问题上无法取得一致。而且，外长们在是否应该邀请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参加大会也统一不了意见。中国和苏加诺一致谴责联合国，认为它是美国势力的延伸。

本来印度提出的邀请苏联参加大会的建议已被否决，但在6月的预备会议上，几个亚非国家再次坚持邀请苏联。而且根据与会者之间出现的“新的紧张形势”，中国担心会议在程序上将止步不前。《人民日报》又一一列举了“印度对巴基斯坦的侵犯和印度在中国—锡金边界制造的事端”。中国人

遗憾地作出结论说，如期召开亚非会议将“不现实”。

10月22日，周恩来写信给亚非各国政府说：中国政府认为，与其不顾通过协商达成一致观点的原则而强行召开会议，从而导致亚非国家间的分裂，倒不如目前暂时不召开这样的会议……

第二次亚非会议的失败表明了在美苏关系缓和的情况下，运用统战方针是十分艰巨的，它还表明，当新独立的国家处理中国所称的“历史遗留问题”时，亚非关系内部正呈现日益疏远的倾向。推翻殖民统治形成民族国家在一定程度上使一些过去忽视了的问题显露了出来。在观念上来看，在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造成的历史上的不公正方面，这些国家有着一些“同”，但在两个超级大国关系正在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要“存”各自相互冲突的国家利益却并非易事。

从历史的角度来理解美“帝国主义”和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周的“方针政策”是很现实的。在推翻殖民统治、各个新独立的国家都在追求平等的形势下，这些方针政策还是有一定吸引力的。但中国的政策中还是产生了一些矛盾。正如西方对中国“威慑运算”进行研究所证明的那样，周恩来对中印边界危机作出了现实主义的反应，然而，边界冲突在国际上所产生的后果却使得1955年万隆会议所建立起来的亚非团结结构面临着被摧毁的危险。

六 文革中的“革命外交路线”

1949年，周恩来向新中国的外交官们强调指出，新中国的外交不能完全效法他国的模式，因为它是中国自身革命经验的自觉延伸。它将体现一种社会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对在欧洲帝国主义发源地孕育出来的欧洲国际法和外交基本观念提出了挑战。

因而，令人极其吃惊的是在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国内却对周恩来的外交提出了怀疑，说它与毛的“革命外交路线”有抵触。当时，中国的外交官要经历“革命化”的考验，他们被称为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红色外交战士”。这种外交作风同“求同存异”是不相容的。随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阶级路线之间的政治差别日益增大，在为使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的斗争中，中国激进的外交毫不隐讳地向“资产阶级”国际法发起了挑战，宣传“毛泽东思想”成为对外政策中唯一最重要的问题。当时的中国外交本身似乎就认可了西方关于中国激进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中缺乏现实主义这种看法。

哈德利·布尔认为，从理论上来说，外交与其所信奉的正义的追求是成反比例的。在谈到19世纪欧洲理性主义的“理想的大使”时，布尔得出下列结论：“在外交政策被认为是坚持

主张普遍的权威，促进真正的信仰以反对异端邪说，或者当成是只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考虑他人的利益的地方，外交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

当然，有人可能并不如此认为。也许，所有的外交都直接或间接地受着意识形态的影响，几乎任何一个国家可能都有其一般的主张。大肆奉承“毛泽东思想”当然有点一般主张正义的味道，但是，中国“无产阶级外交”的典型表现——“文化大革命”外交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呢？

从历史上看，“无产阶级外交”包含了在国际上“宣传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这点。周恩来1949年前在武汉和重庆的外交活动，就主要集中在翻译和宣传毛泽东的统战著作，以争取国际尤其是美国的更广泛的承认。

在50年代中国对外政策和外交建构的整个过程中，周恩来一直依靠中国的具体实践——它正式孕育于延安“整风”期间，他谨慎而现实地强调中国的“自力更生”。简言之就是，革命“不能输出”。中国的革命经验证明，革命必须要有土生土长的国内政治力量的产生。“民族独立和自力更生”的概念表现在周的外交中就是强调所有国家一律平等。这种平等及其推论——不干涉别国内部主权事务——牢固树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中，周希望用这五项原则战胜美国的遏制政策。

文革极“左”势力坚持要求得太多。在外交上，他们认为积极推广宣传“毛泽东思想”对所有国家的国内政治都有重大现实意义，这本身就提出了一个基本的二难推论。周恩来的五项原则要求不干涉内政，而在国际上宣传“毛泽东思想”则可以被解释为从外部对他国国内政治的干涉，尤其干涉了那

些有大量华人社区的国家的内政。从字面上看，“毛泽东思想”本身并没有责成这种干涉，但在文革期间，中国的外交官却都被重新训练成了向国外宣传毛泽东革命思想的“红色外交战士”。

中国的外交和文革现象

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国内文革的需要相比，外交活动成了次要的了。尽管60年代早期出现了中印边界冲突这种复杂的事件，尽管美苏竞争伸展到了非洲，尽管在争取民族独立和在国际上争取政治团结的亚非合作运动出现了内部分歧，周恩来还是在推倒美国建立起来的遏制之墙上赢得了十分重大的成果。而到了文革阶段，这种趋势被翻转了过来。文革政治取消了五项原则，取消了“求同存异”的方针。

当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外交议程及组织机构都得服从于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而这种文革的发展过程本身则构成了难以解决的国内矛盾。国内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和社会上的混乱在“毛泽东思想”高于一切的喧嚣中是属于正当的。在历史上，毛泽东思想认为要通过调查研究来小心辩证地看待“客观”现实。但是，要“触及人的灵魂深处”的文化大革命却构成了一个处处反常的社会现象，它对社会中几乎每个人的社会地位以及对领导结构和现存组织原则的合法性等都构成了威胁。据邓小平说，就连毛泽东在他逝世前的两年中也承认文革中的“推翻一切”和“全面内战”是错误的。

延安风格的“毛泽东思想”特别重视调查研究，而文革则

成了荒谬的舞台，对和错成了绝对的道义。在激进的红卫兵手中，“两条路线的斗争”成了诋毁正常的严格要求调查研究的致命武器。

在这种文革漩涡中，周恩来总理站在中偏右的立场上。刘少奇和邓小平由于对在全党和全国进行文革半心半意而遭到清洗。周竭力保持党中央工作机器的正常运转。作为总理，他在保持政府的基本职能——包括与对外政策和国家安全有关的职能——的同时，还得要指导文化大革命中进行的调整。

他最为繁重的责任，也许就是他1967年12月所称之的开展“组织革命”了。这涉及到对所有重大的机构体系进行大规模的调整和机构改造，它使得周恩来不得不同相互对立的群众组织进行着一轮又一轮没完没了的谈判，这些群众组织对政府机构提出了相互有抵触的要求。

近些年来，邓小平根据“毛泽东思想”对毛和周在文革中的领导作用都做了评估。在将“实事求是”看作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同时，邓指出，毛在文革中的领导犯有封建主义的“家长作风”错误。毛自己违反了“毛泽东思想”中的“科学”性*。

至于周恩来所起的作用，邓小平告诉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说，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周不得不那么做。邓小平最后说：

我一直将他当作我的兄长。我们是同时走上革命道路的

* 参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4页。——译者

……幸运的是他经过文革幸存了下来，而我们被打倒了。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过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

邓小平的话证实了西方做出的一些分析。例如，汤姆斯·罗宾逊教授谈论过周在文革中的“实用主义”，认为周每当关键的时刻都是按“获胜的一方”的意图“投票”，“而不管所讨论的问题可能会产生什么样的政策后果”。不过，在文革早期，周可能是真诚地站在毛一边的。在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任务的看法上，他提出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调查研究”的基础。他殷勤地向红卫兵们推崇的工作作风就是毛泽东自己的延安“工作作风”。

1966年，谁也不清楚文化大革命发展的方向是什么。邓小平在倒台之前谈到文革时，他说这是个“新事物”，党没有“经验”。当然，强调“新的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存在在党内确是新鲜的，但“调整”的概念并不新。正是周恩来坚持运用“毛泽东思想”这个调查研究的理性工具作为完成整顿的手段，从而使他在1967—1968年被广泛拥戴为毛泽东的“好学生”。

有些观察家认为，外交政策“在社会革命家的思想中只是属于次要考虑的东西”。当然，周当时不可能采取任何重大的

* 参见《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7页。——译者

外交主动。尽管早期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分析还基本保持不变,但在全世界推广“毛泽东思想”却危及到既定的统战战略方针。

当前中国官方已对文革中对“毛泽东思想”的歪曲运用作出了分析,但在外交政策问题上却讳莫如深。1981年6月27日党作出的最后正式决议中也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这份文件只是简明扼要地说,毛泽东即使在他的最后年代,“也顶住了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执行了一条正确的外交政策”。苏联被指责将意识形态原则上的争论变成了“两国之间的冲突”。在这方面只一笔带过,可能是因为有关这些问题在亚洲国家中仍十分敏感,这些国家中有海外华人社区存在。

党的决议没有特别谈到外交部内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活动。最初,周恩来可能希望在外交部内限制文革的开展,但到了1967年4月,他不得不亲自直接领导外交部的文革活动。甚至在此之前,早在1966年9月就开始前所未有地从世界各地的使馆召回几乎所有的中国高级外交人员。任何想使机构不调整的企图都会招致激进派的批评,说是阴谋破坏文革。

国内出现的论战限制了周恩来在外交上的战略抉择。在政治上和社会上都迫切要求通过明确的——而常常是夸大了的——政治行动来证明其不属于“资本主义革命”的一部分这样的场合下,“中立主义”就变得不怎么能接受了。在有关“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这些问题上,没有哪位领导人是可以持中立态度的。而在国际上,“中立主义”被日益同“反动”政府联系在一起。有一个时期,忽视“中间势力”被当作犯了“左派幼稚病”。在对苏联强调美苏关系中采用“现实主义”的重要

性进行谴责的同时，周恩来中国式的马列主义的“现实主义”又出现什么情况了呢？

在文革期间，周为了顶住政治极端主义的潮流的确强调过“毛泽东思想”是分析的理性工具，但激进群众组织的政治实践则成了对延安正规实践传统的一种面目全非的笨拙模仿。在各类学校学习国际关系的激进学生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条路线的斗争”扩大到外交部的对外政策和功能上。“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集中在对“新生资产阶级”官僚特权的注意上，红卫兵组织还曾经将矛头对准了外交人员生活“奢侈”和外交官不学“毛泽东思想”上，就连周恩来也没有足够的权力阻止文革进入外交系统。

这里还存在着一个“两条路线的斗争”以及中国赞成世界民族独立和革命的完整性问题。在激进的红卫兵眼里，既然苏联已退化成为“现代修正主义”而且它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头号帮凶”，中国就成了“世界革命的中心”。美苏联盟——在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被轻蔑地指责为“神圣同盟”——已被正式当成中国对外政策中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周恩来本人并不十分愿意谈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个问题，但他赞成谴责“三和两全”。苏联提出的“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观点是中苏意识形态论战的实质中心。周和陈毅赞同毛用“三大一深”对国际势力相互关系的概括。谴责“三和两全”大大藐视了苏联提出的观点，包括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及其他对苏联社会阶级斗争的否认，这集中体现在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主张全民的国家全民的党上。“三大一深”着重强调“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 and 深化斗

争”，指的是随着广泛持久的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而产生的国际势力平衡的变化。

红卫兵的批评不仅在防止国内潜在的资本主义复辟上将矛头集中于修正主义的危险，而且作为中国外交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一部分，还将矛头对准了赫鲁晓夫“三和两全”在中国的变种。中心问题成为“三降一灭”——向帝国主义投降，向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向反动派投降和扑灭争取民族独立的世界革命趋势。

正当周和陈毅正式谴责“美帝国主义”、苏联和南斯拉夫“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如印度和日本）狼狈为奸、阴谋勾结时，极左分子声称外交部正在从事“和平共处”秘密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对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这一点是难以提出不同意见的。大肆强调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是一种中国“伟大”的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实际上把毛泽东当作宇宙中心的“红太阳”那样伟大就表明了这一点。

在国外的中国学生，甚至一些外交官，认为他们有权公开地表示出他们对毛主席的“热爱”。他们的行为惹怒了所在国政府，将他们的行为看成是干涉内政。当时，中国同32个国家有过外交纠纷。当中国整个边界都出现了紧张局势时，外国政府反对当地红卫兵活动越厉害，中国就越认为这是他们在革命面前不堪一击的证明。

在这样形势下，中印边界军事局势日益紧张，这不奇怪。但中緬关系也突然恶化，这却令人惊讶。周恩来极其关怀中緬根据五项原则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将它看作国际关系中的一个范例。这种范例曾被用来解释中国同印度的边界冲

突。1961年，周和陈毅率一支有400人的大型代表团去仰光签订了中缅边界条约。1966—1967年，缅甸的中立突然变得可有可无了，因为中国政府注意起华人社区政治来，要求缅甸华人有热爱毛主席的权利。缅甸“反动”政府被指控“大规模地野蛮迫害华侨”。

中国政府还卷入了香港和澳门发生的“血腥暴行”。1967年初，无法无天的红卫兵实际上控制了澳门，1967年夏，英国拒绝了要求在香港开禁亲共报纸和释放政治犯的最后通牒，结果导致在北京的英国大使馆*被烧。

除此之外，1967年10月，在最后的时刻周恩来亲自向西哈努克作出保证，保证尊重柬埔寨的中立、尊重不干涉内政的原则，这才避免了柬埔寨从北京撤走大使馆人员。在非洲，中国也失去了相当的外交主动性。中国在外交上匆匆重申毛主席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周恩来在1963—1964年亚非之行提出的五项具体原则，以反击美国和苏联关于中国试图向国外推行文化大革命的宣传。1967年3月，新华社抱怨一些蛊惑人心的报道“……诬蔑诽谤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离间中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关系，诋毁中国的对外政策”。新华社表示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宣传机器遥相呼应”感到遗憾。

苏联的宣传攻势结出了果实，亚非人民团结组织常务理事会修改了早期作出的在北京召开该组织第五次会议的决定，结果在塞浦路斯举行了会议。

* 当时是英国驻北京代办处。——译者

中国揭露勃列日涅夫支持美国在越南“和平谈判”的险恶用心，并指出非洲人民团结组织常务理事会没看透苏美在越南的狼狈为奸，从而落入了苏联修正主义的控制之中。苏联被指控“攻击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引用了1963年1月毛主席的一首诗词，将苏联的所作所为比喻为“蚍蜉撼树不自量”。

苏联在宣传中连篇累牍地指责对毛的狂热吹捧。毛被说成是在搞个人崇拜，他的马列主义被说成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庸俗延伸。他的政治被指责为是“封建的”。毛“在社会上缺乏广泛而稳固的支持基础”，因而他在“个人专政”中求助于“封建个人崇拜”手段，这手段借之于长久以来对皇帝的崇拜这个传统。他们还宣称毛是个装扮成马列主义的孔教门徒，但他也是一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使中国在“不断革命”惨剧中痉挛。毛不知不觉中将最糟糕的传统的儒家独裁主义同“左派幼稚病”结合了起来。

“文化大革命”使本来就十分敏感的中苏关系更加火上浇油。毛和周小心地概括出中国在社会主义世界中的立场，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严格遵守平等原则，这原则是在1957年中苏联合公报和1960年莫斯科宣言中宣布的。在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关系中，对缺乏尊重各社会主义国家平等的一致原则所作出的东西，周和毛一律不予接受。他们也不接受对任何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内政治和政策作的批评，即使批评的人占多数。然而，文化大革命在防止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在警惕在苏联出现的那种修正主义。

周恩来成为1966年4月30日公开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问题的第一位中共领导人。在一次欢迎默罕默德·谢胡和希斯尼·卡博率领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的群众大会上讲话时，周坚定地站在毛的一边，认为阶级斗争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关键环节。周称赞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推行的“使意识形态和工作作风革命化”的政策。

周告诫说，“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他重申了毛最近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他指出：“在工人阶级队伍里，在集体化了的农民中，以及在政府机关和文化机构里，还会不断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新老资产阶级分子总是千方百计地试图复辟资本主义”。

周着重谈了苏联领导集团采用的“反革命两面伎俩”，指出苏联在煞费苦心支持越南问题和平解决的努力中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他说，在赫鲁晓夫推行的“脱离接触”的越南政策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推行的“卷入政策”之间，看不出有什么不同之处，两个政策实际上都是强调与美国勾结，有损于越南民族解放的真正进程。

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谢胡在讲话中更是彻底地表现了对苏联的敌视。显而易见，中阿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认为，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应一律平等。中国人和阿尔巴尼亚人都认为，革命政党不能分为什么“老子党”和“儿子党”。谢胡驳斥了苏联关于中国在鼓励核战争的反华宣传，他声称，中国在专心致志地致力于和平：“全世界都知道，人民中国是举世闻名的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间奉行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倡导者’和忠实的执行者”。

5月11日由周和谢胡签署，在北京发表的中阿联合声明直截了当地谴责了美国在越南和平问题上耍的“反革命两面伎俩”，谴责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复辟。“铁托叛徒集团”被指责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出现的第一个修正主义集团”，这不令人感到意外。声明强调，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既要广泛又要坚定，决不同“美帝国主义的帮凶及其走狗”合作。

6月中下旬，周对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进行了访问，在访问中，他对“现代修正主义”进一步发起了攻势。在罗马尼亚，他公开强调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理论。6月17日，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的矛头”针对的目标是有限的，也就是说，针对“一小撮反对共产主义的坏分子”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周还称赞罗马尼亚抵制了“外来干涉”。

罗共总书记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很平淡地表达了中罗兄弟友谊。总书记不想对文革作出评论。他也谴责了美国在越南的侵略，他就此机会重申了他的对外政策总方针，罗马尼亚将坚持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和友好同盟关系，同时也寻求发展同所有国家——不论社会制度有什么不同——的关系。他讲话的这后半部分近似于铁托的立场，但它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明确反应。离开罗马尼亚时，周指出同罗领导人进行了“有益的会谈”并“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

在经济互助委员会的设计问题上，罗马尼亚对苏联表现

出了相当程度的独立性，但周未能促使齐奥塞斯库就“现代修正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发表一项实质性的声明。美国在南斯拉夫的情报机构报告罗马尼亚外交官的话时，无把握地将周恩来在布加勒斯特似乎缺乏革命性的豪言壮语解释为他对辛辣谴责苏联和南斯拉夫缺乏热情，以及他对文革开始出现的清洗感到反感。

在阿尔巴尼亚访问期间，周没有提到“坦率交换了意见”。他在6月24日答谢恩维尔·霍查宴会的讲话十分简短，而霍查的讲话热情洋溢。周再次对阿尔巴尼亚近来“在政治、经济、军事、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革命化”所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但他没谈到文化大革命。他甚至比在布加勒斯特更加不乐意谈论这个问题。

周对阿尔巴尼亚的访问的消息《人民日报》于6月29日正式刊登，它将国内出现的支持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和阿尔巴尼亚的“革命化成就”看成是中阿“革命形势”引人注目的并行发展。周回国时，北京领导层正处于激烈的冲突之中，毛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通过操纵党的工作队偷偷搞小动作，阻止群众参加文革。刘邓分子被指控采用“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方针，通过分散别人对上级党领导的失误的注意来谈论群众的作用，以敷衍党自己的缺点。

在党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表明了他的意图，他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沦为“资产阶级专政”的危险。这篇通知还指责了当时北京市委很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彭真，并宣布解散“五人小组”，这五人小组曾由刘少奇领导，负责管理头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

“五·一六通知”代替了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毛泽东在他自己8月5日写的大字报中直接抨击了刘少奇利用党的“工作队”阻挠群众的“整顿”活动，这份大字报还向试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某些领导同志”提出警告。当时，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将刘少奇从领导集团中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并批准了著名的“十六条”作为文革的组织指导方针。

这十六条将“在党内的那些握有实权并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定为革命运动的“主要目标”；不过，它还是坚持了“整顿”的传统原则。根据党的群众路线所强调的群众要积极主动地参加整顿政治活动中去这点来看，拒绝刘少奇派“工作组”的作法是合理的。

第五条体现了统一战线方针，要求孤立绝大多数的反动右派，争取中间力量，团结绝大多数；而第六条提出了延安的“实事求是”观点，强调采用调查和通过讲道理而不是强制的说服的工作方法。对于组织群众“大辩论”，十六条指出：“大辩论中所采用的方法是摆事实、讲道理，通过讲理来说服他人。任何强迫持不同观点的少数屈服的方法都是不允许的”。重申这些观点可能有助于解释党的领导为什么继续愿意赞同“毛泽东思想”。

周恩来和外交部的“组织革命”

无论是外事系统的干部还是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外交使团成员，都未能逃脱令人痛苦的“整顿”。整个外事系统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领导下，历经了文革的创伤。这个外事系统包

括外交部、对外经济委员会、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华侨事务委员会以及外文出版局。对这个外事系统提出激进挑战的主要来自于北京第三期外语训练和国际关系、国际贸易学习班。

这个系统内所发生的事可以从文革的进一步开展上得到最好的解释。周同北京的革命学生组织不断进行接触。他常常对这些学生组织说，他们很像正规军队的“预备队”，以此来强调他们应像中国人民解放军那样严格遵守纪律。

在8月31日的集会上，周总理和毛一起敦促广大红卫兵群众在“集中力量打击一小撮资产阶级右派”的活动中，有必要学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作风，它包括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周强调“通过调查研究、通过在平等基础上的协商”来解决不同意见。首先，他告诫红卫兵在斗争中要用“讲道理”的方式，而不要强加于人。在这里，周所说的“斗争”是指开展明达的批评，而红卫兵的“主要任务”是在他们自己的学校内进行这样的斗争。他们不要去骚扰行政机关的“管理事务”。

9月1日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中，周说得很坦率，首先他强调指出，红卫兵不要用“毛泽东主义”(The Doctrine of Mao Zedong)来代替“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 Thought)，尽管“毛泽东主义”已广泛被人所接受。周似乎认为用“主义”这个词称呼毛泽东思想不合适，它忽视了团结和实践的重要性，并且有“教条主义”嫌疑。

随后，周强调，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预备队”，红卫兵需要有严格的组织。作为一项“政策”，他敦促他们采取统一战线斗争纲领，“依靠左派，教育和争取中间派，孤立极少数右

派”。他向他们推荐“十六条”，指出尽管“十六条”中既提到了“说理斗争”，也提到了“强制斗争”，但更重要的任务还是通过说理，在思想上战胜敌人。周指示红卫兵以“毛泽东思想”为“准绳”，以“十六条”为“基础”。

周还作出了下述保护性声明：“国家各重要的部委和主要部门都必须受到保护”。9月9日，周再次对一批红卫兵说：“我们的学生决不要卷入部委中的活动，因为他们和你们大不一样。你们整天搞运动，但他们有工作要做”。然而，周认为“斗争”的范围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控制，这被证明是太过于乐观了。

9月10日，周再次强调，红卫兵是“后备”力量，他们只有在未来的某个时候才能变成羽毛丰满的“战斗队”。周对他们说，他们的“三个主要任务”是建立“革命联系，相互交流经验，参观访问学习他人”。周强调，“学习”对红卫兵们的知识发展十分关键。他要求他们不要仅仅重复从毛泽东选集中摘录下来的语录，要创造性地与“实际情况”相联系去学习整个原著。周说，如果“老一辈共产党人”都还要继续学习和进行终生自我改造的话，那么年轻的红卫兵们就更应该这样。周断然指出：“你们社会知识太少，对党的政策了解太少，因而，你们必须更多地学习，决不要自满”。

周提到了他改正错误的经验。他有好几次提到了他的这些不太明了的“错误”，他说，是毛主席去重庆期间和后来战争时期在陕北由毛主席帮助他改正的。在文革中，毛写的关于重庆谈判的几篇文章被广泛引用，以表明在同反革命进行错综复杂的斗争中毛始终坚持原则。

红卫兵缺乏“社会知识”会产生国际影响。周建议他们可以在外国商人和游客中间“做宣传”，但不得盘问外国人的阶级背景。周对辱骂外国人的行为很生气，学生经常叫外国人“坏蛋”。

在9月13日的一次讲话中，周详尽阐述了恰当地与外国人接触这个问题。周30年代后期的“外交”主要在于“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有限的条件下向有关的美国记者和著名人士友好地解释毛泽东的政策。在讲话中，他指出：“只可以向外国人做宣传。我们决不要将我们的观点强加于人，也不能越俎代庖。在中国的外国人有左派、走中间道路的、中产阶级和反动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外交人员”。

红卫兵对苏联表示出的敌意特别令人担心。北京第二女子中学的学生将苏联大使馆所在的“扬威路”改名为“反修路”，对此周并没说什么。他对9月11日举行的有十万人参加的声势浩大的“反修大游行”作了好评，但他指示学生不要进入苏联使馆，也不要使使馆建筑物墙上贴大字报。至于在中苏之间运行的列车，周曾命令一群学生从占据的列车上下来，主张要尊重苏联的主权。不允许学生破坏列车的工作，但周允许在列车上贴大字报。

根据后来红卫兵的指控，陈毅曾在1966年9月30日阻拦“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据称，陈毅当时这样说：

苏联使馆人员离开的时候被要求携带语录本和《毛泽东选集》……这不行。我们不能强人所难。有些外国人认为我们在搞个人崇拜，并且将毛泽东思想当成了绝对的东西。

学生们将《毛泽东选集》塞给苏联使馆人员，并在他们的行李上贴上字条，上面写着“油煎勃列日涅夫”。

外交事件引起人们对“毛泽东思想”国际意义进行评价。所有中国领导人都将毛泽东思想奉为权威。例如，周恩来在给北京大中学校革命造反司令部写的信中说：“在我们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只能有一个真理标准，那就是，任何事物都应该用毛泽东思想这个意识形态标尺来衡量”。

文化大革命也波及到了莫斯科。10月7日，中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一秘接到通知说暂停客运在苏联的中国公民的计划。苏方说，苏联政府这样做只是对中国9月20日的一份照会作出的反应，那份照会提出让中国学生离开苏联回国参加文化大革命。

根据中国方面材料记载，1月25日，有69名中国学生在向列宁陵墓和斯大林墓敬献花圈时遭到两三百名苏联警察和特务“血腥暴行”的迫害。这事件触痛了中国的一根神经。中国外交部通告“苏联修正主义头子”，他们决“没有好下场”。中国指责苏联对文革作出了歇斯底里的反应，并告诉苏联：“既然我们天不怕，地不怕……我们怎么可能怕你们这儿只快要冻死在茫茫白雪中的苍蝇”。

1967年2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说，2月3日莫斯科又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一起在世界外交史上罕见的野蛮暴行……”。这一次，“苏联修正主义分子”对中国外交人员大打出手，苏方在破坏宣传中国文革和“1·25事件”图片的新闻橱窗时侵犯了中国使馆区。周和陈毅打电报给莫斯科中国使馆人员，称赞他们是“杰出的红色外交工作人员”，并对他

们“用鲜血”维护了“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的尊严”表示祝贺。

这些事件与中央机构中激进派的“夺权”是同时发生的。激进派关注外交部有几个原因。根据红卫兵的一份材料说，1966年9月9日，毛泽东发布了一项命令，同意对外事机构实行“革命化”。文革的主题内容就是强调反对过着荒淫奢侈生活的“新生资产阶级”，享有特权的外交官很自然就成了眼中钉。

根据中南海高级安全部门编制的政治事件年表记载，1966年12月底，北京外国语学院成立了“6·16红卫兵军团”，要“炮轰”周恩来。国家经济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以及商业和对外贸易学院也建立了类似组织，将矛头指向周和陈毅。12月下旬，陈毅外长欢迎从印度尼西亚回国的41位华侨。中国领导层，特别是那些激进的学生们，对1965年10月印度尼西亚军事政变之后发生的一系列牵涉到中国驻印尼使馆和华侨社区的事件感到很愤慨。这些事件是大肆宣扬“毛泽东思想”具有普遍意义所导致的结果。就连外交部长在12月29日集会上的讲话中也这样说：“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光芒正照耀着全世界，……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在1月下旬上海的一篇电台广播中，毛泽东宣布文革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革命组织要团结起来，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中夺取权力。1月22日，周对此作出反应，他强调必须加强组织纪律性和民主集中制，他仔细区分了“夺权”和“由利己主义促成的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的差别，“夺

权”是指一个阶级从另一个阶级手中夺取权力。

根据台湾方面关于这段时期出现的“一月风暴”的资料说，陈毅遭到了王力的反对，王力是负责监督文化大革命发展进程的文革小组成员之一。1月18日，造反派无视陈毅就在外交部设立起一个革命造反派联络站。文革小组的政治地位很高，但在技术上它却是中央委员会下属的一个小组委员会。

1月24日，周主持了一个群众集会，陈毅在会上无可奈何地作了自我批评。陈毅承认他采用刘少奇的方法派驻工作队，犯了罪，还犯了官僚主义工作作风罪，犯了只重视专业、轻视思想的罪。陈毅保证将学习林彪和文革小组成员们的指示。

面对着风起云涌的文化大革命斗争，周恩来试图谋求一种有效的组织手段，以保持国家各大部委基本职能得以实施。在2月17日中南海的一次会议上，周批准成立了财贸系统革命造反派联络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通过交流经验、向下级部门传达上级指示精神，以及向上级汇报下级财贸系统情况等，来监督检查文革工作的开展。周特别提到，北京有许多联络站没经过中央正式批准就擅自成立起来。

“一月风暴”之后，立即出现了“二月逆流”，中央一些领导人，尤其是农业部长谭震林试图抵挡住文革的潮流。这股“逆流”的支持者们指出要依靠党的传统——周恩来本人在1966年9月对它曾作出独创性的发挥——呼吁进行调查研究和开展“说理”斗争。

陈毅也对激进派们发动了反击，说他们任意将外交部的干部们贴上“修正主义分子”的标签。2月12日，他在北京机场义愤填膺地向红卫兵作了一次十分严厉的演讲。他指出，

他1月24日的自我批评是迫于无奈，他犀利地对那些指责他的人说，他们要想革命的话，可以到越南打仗去，他们的人身攻击是不公正的，而且使整个党的领导名誉扫地。他告诉红卫兵们，他们批判对外政策中的刘邓“修正主义”路线完全是无中生有，因为对外政策中并无路线分歧。

作为一种“夺权”手段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困境，为了验证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夺取机关领导权并重建无产阶级政权，不同的派系都进行针锋相对的炽热的斗争。周恩来将这个过程称作为“组织革命”，他说这是根据毛泽东的教导建立“伟大的革命联盟”，或叫做各大机构中的“三结合联盟”。

2月份，毛泽东提到贵阳棉纺厂的“好”经验，他强调要在一些“系统”内建立“大联合”。“夺权”包括夺取行政系统内的“企事业管理”权。周恩来指出，“夺权”是毛泽东的独特的思想。这种思想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从来没提到过。不过，组织方面的工作还得由周恩来来做。

周很重视上海夺权事例，但他试图控制住中央政府部门内部联络委员会的发展，准备在“三结合”基础上重新巩固政治权能。周坚持认为，“夺权”需要做好非常慎重的准备工作，从而在机构遭到破坏的同时，建设工作可以不致中断。在一次公开谈话中，毛泽东叫周恩来“抓典型”。周传达时强调说，毛主张根据不同情况灵活开展组织工作。在承认“强大的左派势力”将有助于巩固政权的同时，周还强调说：

接管权力是件大事，它将引起一系列的变化，它是一次革

命，有必要决定好接管的目标。至于要解决些什么问题、接管方式、遇到问题时将如何处理等，(政治局、各部委等)必须有具体的政策。

在1967年5月26日中国科学院群众集会上，周阐述了他的一些观点。他指出，毛泽东的“三结合”方针是将老、中、青干部结合在一起，以使“领导机关能吸收大量的新生力量”。他希望，来自于各类群众组织的代表们的结合可以通过召开“大中小型会议”来完成，不过，他还提到了第二种“结合方式”，那就是有些单位也可以实施“军管，由军代表、革命领导干部代表和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来管理”。这种形式也属于“老、中、青”结合。

由于敌对群众组织间派系斗争十分激烈，铁道部未能在“三结合”的基础上重建起机构权力来，周以个人名义对该部实行了军管。同样，4月份他直接负责外交部的军管步履。在周被看作是“二月逆流”的“后台老板”而受到不断增长的压力的情况下，陈毅谴责红卫兵使周恩来的政治地位更加复杂化。当时，周正努力保持一种和文革小组关系良好的样子来。

从3月下旬开始，激进组织再次向外交部的“修正主义路线”发动进攻，他们指控在陈毅的策划下外交部的权力被夺错了。4月上旬，华侨事务委员会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指责陈毅与该委员会主任廖承志“狼狈为奸”。他们指责陈和廖相互勾结，在华侨事务委员会内建立了“联合夺权委员会”以发起一场假夺权运动。东方红公社(即人民大学)的“红色导弹战斗队”指控说，当周恩来要求召开一个由外事系统各群众组织的

代表参加的会议时，陈毅都安插他的“联合夺权委员会”的代表参加会议。

对陈毅更有威胁的是有人指控他暗中试图阻止宣传“毛泽东思想”。在红卫兵们看来，毛泽东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而陈毅在讲话中却说毛泽东思想具有中国革命经验的特征，因而是不能输出的。陈的立场既符合“毛泽东思想”，也同周恩来外交思想相一致，周解释“自力更生”时就认为它是针对中国的状况而作出的，反映了中国的特征。

陈毅想再度强调一下1966年9月他的观点（即毛泽东思想不是绝对的，不能强迫他人接受），但他这样做时却同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戚本禹发生了冲突。陈毅被谴责在散布异端邪说：“要说僵化的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一个大僵化的思想……这个毛泽东思想纯粹是中国的东西，别把它弄到国外去”。

4月中旬，“炮轰陈毅”成为正式的“革命”行动，周恩来亲自接管了外交部的管理工作。陈毅并没被解职，他再次被带到群众大会上。陈固执地拒绝听从他们的摆布。在一次有外交部联络站的代表和几个其它“革命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大家同意让陈毅轮流到外交部、外国语学院、外交学院和第二外国语学院去作自我检讨，由周恩来亲自主持会议。5月6日，外交部外面保陈派和反陈派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冲突。

5月26日，周恩来在一次讲话中祝贺外交部内建立了“联络站”。他指出：

现在，我完全支持——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支持——革命

群众建立的联络站领导革命、管理行政事务。我仍然希望在这方面能树一个实现革命的“三结合”典型来。那就是为什么在各中央机关树典型并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的原因。

外事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联络委员会主要关注于“两条路线的斗争”，其“矛头”主要针对陈毅的“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不过，外事红旗组织对第二外国语学院的6月6日红卫兵军团的一份大字报进行了反击。他们指出，说周恩来自己“在反革命两面派手腕”这表明了另一种“逆流”，“……不难看出，他们批判陈毅是假，他们批判周总理是真！他们保卫毛主席是假，他们要孤立毛主席是真！”

1967年从春到夏，中国外交大肆渲染外交官是“红色外交战士”。“战略上藐视敌人”达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反对中国的国家日益增加，而这些国家都被说成是“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傻瓜。外交部在派系夺权政治中动荡不定，而对一系列外交事件发表的声明的语调则逐步升级，这些外交事件涉及到印度尼西亚、香港、印度、缅甸、柬埔寨、外蒙古、突尼斯和肯尼亚。

从当时情况看，提出“红色外交战士”的观点对正在进行的批判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投降主义外交路线”——这在印度尼西亚表现得十分明显——极其重要。刘少奇1963年4月对印度尼西亚的访问被大肆丑化。刘被指控只字不提“毛泽东思想”，并且企图绝口不谈革命问题，而他的夫人王光美则被辱骂在印尼跳有挑逗性的摇摆舞。陈毅1963年陪同刘

少奇出访也成为一受牵连的事实而成为批判陈毅的一个靶子。印度尼西亚问题的剧烈激化使中国既定的关于不干涉海外华侨社区事务的政策遭到破坏，外事系统内人们日益关注着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血腥暴行”。

根据1967年4月外交部发表的一项声明所说，中国驻雅加达总领事徐仁准备去印尼外交部，他刚刚走出使馆大门突然遭到“印度尼西亚军队的武力绑架”，他们不顾徐仁的抗议强行将他带到雅加达0503军区司令部。徐仁和临时代办姚登山随后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遭到驱逐。

姚登山返回国内后，立即名声大震，他成为一名“红色外交战士”主角，并且在外事系统联络站内成为周恩来的对头之一。姚紧紧抓住刘少奇和所谓的外交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他声称刘少奇拥护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并且为美帝国主义充当“可耻的政治掮客”，提议马来亚、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成立联邦。

姚向狂热的红卫兵们宣扬在雅加达的中国使馆60名使馆工作人员是怎样用酒瓶和灭火器抵抗1000多印尼士兵和两辆装甲车的进攻的。姚断言，外交是约束不了革命力量的。在资产阶级国际关系习俗面前，他将高举毛主席革命旗帜。他向他的支持者们鼓励说：

我们要敢于革命，我们要造反。外交惯例必须推翻。我们不应该受这类惯例的约束。我们必须造反，我们要创造出“新生事物”来，创造一套全新的外交惯例。

姚声称对外事务中的斗争就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斗

争。他要求海外华人社区的外交官们将他们各自的使馆改成“毛泽东思想红色大学校”。

正当极左分子热衷于阶级斗争之时，周恩来也时常受到政治上的攻击。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由于周习惯于“调和和妥协”，红卫兵们对他日益感到不耐烦了。要说周也积极参与了诋毁刘少奇的活动的話，那据说他是要用一只“死老虎”来分散革命群众的注意力。有人用大字报或含沙射影地指责周赞成刘少奇否认阶级斗争。

外事机构热火朝天地进行着“革命化”运动。外事系统的高级领导人，包括外长、副外长和部门头头，都被当成已腐化堕落和官气十足的老一代革命派。他们将中国驻外使馆都变成了标语厅和家族式的黑帮酒吧。

6月3日，文革小组的康生、陈伯达和江青接见外事系统群众组织的代表，揭发“对外事务中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王力宣称，他和康生经过研究对外事务材料发现有偏向“三降一灭”的迹象。他们并没有直接点周恩来的名，但据说这个问题发生在1951年，当时周正是外交部长。王力还提到了苏修和蒋介石认为“毛泽东思想”与世界形势不符，会上他们攻击陈毅反对在亚非拉宣传“毛泽东思想”。

陈毅关于联合国问题的立场也遭到攻击，但众所周知，他的立场历来就是周恩来的立场。有人引用陈毅1961年的话说：“我未必一概反对联合国。我支持联合国好的一面，反对它坏的一面”。周和陈都曾强调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的地位，他俩都支持联合国宪章关于民族独立和平等的原则，尽管在联合国机构程序上存在着美苏占优势地位这个世所公认

的问题。

6月份,《光明日报》撰文攻击周恩来。它严重曲解了周的统战战略。《光明日报》指出,建立“以左派为中心的最广泛的革命大联合”本身就出现了“谬误”。周的反对派们对“求同存异”一笔抹杀,认为它是“折衷主义、和稀泥和合二而一”。他们指责周在外事系统人为的革命大联合中出卖了革命原则。从“小真理要服从大真理”这个辩证角度来看,这种指责是不足论道的,他们在对周进行批评的同时并没有正确地认清什么是“原则矛盾”。

在这种政治危机四伏的形势下,香港局势一触即发。从5月6日至12日,香港警方同游行工人之间爆发了一系列冲突。5月15日,中国外交部发表一项声明,提出五点要求,敦促英国当局接受工人们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停止“一切法西斯措施”,释放被捕的工人和新闻记者,惩罚“酿成这些血腥暴行的罪魁祸首”以及保证今后不再发生任何类似事件。

中国政府屡次要求英国方面对5月15日的“声明”作出答复。联络站和各地激进的学生们抨击英国企图拒绝海外同胞有学习和实践“毛泽东思想”的权力。例如,6月13日,外交部再次发表声明,谴责英国当局查抄九龙一家电影院时“打碎一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半身塑像的暴行……”

6月24日,周恩来告诉来访的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在香港的中国人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神圣权利”是“不可侵犯的”。周告诉卡翁达“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和中国人民对英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但对于中国会作出什么反应他含

而不言。周说：“中国人民决心根据局势发展的需要而给予香港爱国同胞一切支持，直到最后胜利”。他的官方立场值得研究，他的反英措词十分强硬，但并没有威胁说要采取什么特定的行动。“局势发展的需要”也并无确定所指。

从5月到7月，中国的外交和新闻机构用极端的语言抨击英国。他们说英国人由于发动了肮脏的鸦片战争而欠了中国人民一笔“旧债”。他们辱骂英国人想恢复十九世纪的“炮舰外交”，意欲将香港变成美军在越南侵略行动的后勤补给地。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布朗表示，英国将既要保护英国在香港的利益，又要保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人民日报》嘲笑他在玩弄精明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他们大量引用毛泽东的话说，英国的声明常常是诚实不足而佯称热爱人道、正义和道德有余。

香港的局势受到在广州和广东全省开展的文革的影响。4月中旬，周恩来提出那里的局势“万分危急”，需要广州军区派军队来控制。考虑到这个地区与香港和澳门靠得很近，而且考虑到阶级斗争“极其复杂”，需要保证中国支持越南战争的这块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后方基地，采取军管这个措施是合情合理的。

但军控并没能制止得住该地区两个敌对群众组织间的冲突。而且，正当香港局势似乎一触即发的当儿，外交部内部却在进行一场未授权的“夺权”斗争。8月11日，疯狂的激进分子严厉责骂陈毅，并且威胁就在会议厅讲台上对他进行人身摧残。周恩来中止了大会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显然，8月份头14天，激进分子姚登山在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支持下，篡

夺了外交部长的权力。关于这次事件，只是在事后谴责“5·16兵团”，说他们将“矛头”指向周恩来和林彪时才知道一些详情。

有人揭露说，这个阴谋的目的是试图将文革推广到军界，是向总理发出挑战。文革小组成员公开明确地指责这种挑战，说它弄巧成拙弄糟了局势，并且有将中国拖入内战的危险。总理在国内外的巨大声望是举世公认的，因此，攻击周恩来将有损于中国在海外的声望。

“5·16兵团”宣传材料强调，要在总理和文革小组之间打进一个政治楔子。他们说周是“资本主义复辟的总根源”和“二月逆流”的真正后台老板。他被描绘为“旧政府”的头子，这个“旧政府”成员据称包括李富春、李先念、陈毅和聂荣臻。“5·16兵团”和一心在忙于整陈毅的“6·16兵团”合伙了。这个“反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在北京外国语学院“6·16”会议室召开。

在“5·16”阴谋败露之后不久，文革小组的头头陈伯达、戚本禹和谢富治向红卫兵大会中央团体成员和写过攻击周恩来大字报的组织代表发表了讲话，其中透露出这起阴谋的若干证据。——试图“揪出”外长陈毅以及坚持要他公开坦白自己的错误，这些都受到了批评，说是违背毛泽东本人意愿的。陈伯达带着嘲弄的口吻申斥激进分子说：“……你们谁也当不了外长。你们连话都讲不清”。戚本禹——后来他本人也被查明卷入了“5·16”阴谋——表示文革小组完全支持周恩来作为毛泽东的“参谋长”。他警告激进分子，说他们得不到群众的支持，他提醒他们说，如果他们再进一步轻率地反对

周恩来的话，他们自己就会被当成反革命分子而遭到反对。戚急于不让外人将他们的行为看成是周恩来和陈伯达之间有冲突。

有大量的迹象表明，中央领导层正日益为由于文革而招致的国际声望的下降感到担忧。陈伯达批评激进分子“错误地判断国家大事”、毫不顾忌“国家的名誉”。9月17日，周恩来对一群北京高校的代表说，想离间他本人和文革小组，这只会使“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分子”感到高兴。9月28日，周还指示红卫兵不要使用“××公社”这个称号。他提醒他们说，毛主席反对“上海公社”这个名称。“公社”不适合于国际现实，外国不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公社”，这个名称在基层农村组织中被保留了下来。

9月份，周恩来讲述了他在外交部是怎样和姚登山对抗的：

（8月份），我在中央委员会主管外交部，当外交部濒临崩溃时，我召开了一次会议，……我是直接领导外交部的，其结果他们从我这里把权夺走了。他们直接向驻外使领馆拍发电报。结果许多人被送了回来。姚登山到处做报告制造麻烦。……我当场对他进行了批评。

8月14日至16日，周总理到广州，在那里他直接负责两广（广东和广西）工作。尽管军事管制委员会竭尽了全力，但这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仍处于政治动荡之中。广州交易会的组织工作混乱不堪。在呼吁相互对抗的群众组织代表组成“革命大联合”时，周说：

只有通过这样的一个大联合恢复秩序，才可以顺利地处理好交易会、香港对共产党的支持以及反敌和反美斗争等问题。我刚看了一些材料，香港的敌人说广州是个乱七八糟的死城，尸体成堆。这当然是胡说八道。

周继续用文革的语气说话，但很自然，他对广州革命进程和香港局势之间混乱的关系感到十分担忧。两个月之后，他命令广州的群众组织不要出版如此众多的刊登了国内消息的红卫兵小报，因为它们都从广州流入了香港，然后被“外国特务”用来诋毁中国。周恩来暗示它们有损于中国同港澳群众的关系。

为了大张革命威风，在北京毛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中的激进分子赤膊上阵。在外交部激进骨干分子的压力下，外交部向英国政府发出了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在香港的英国当局在48小时之内取消对“三家爱国报纸”的禁令，释放被囚新闻记者并且中止对上述报纸的起诉。英国一口拒绝，北京极左分子顿时哗然。

激进分子焚烧了英国驻北京的使馆，而当时的外交部正成为夺权斗争的目标，这起事件使周恩来的处境极为尴尬，但它也将百般诋毁外交部的“左派”置于被动位置。毛的夫人江青在一篇关于需要革命团结的调和性讲话中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北京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有些人去外国使馆捣乱，英国代办处办公楼被烧。我们当然是要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但我们别在外国使馆捣乱啊，我们

别登上外国人的船上去啊。好人干这种事说明他们太幼稚了；要是坏人干这种事，他们是想败坏我们国家的声誉。

随着广东政治局面的巩固，与香港接壤的地带鲁莽行动发生的减少，但对英“帝国主义”的口头攻击仍在继续。从战略角度看，中央领导层减低了香港的重要性，与同美国在越南的更大规模的对抗相比，香港只属于次要的。

毛泽东终于认识到文革走得太左了，对立群众组织之间爆发的失去控制的革命暴力正危及到军队的政治稳定和国家权力尚存的完整性。这种看法进一步加强了在组织上达成“大联合”的趋势，这同周恩来在1966年9—10月间的观点相似。

注重阶级斗争、由革命“左派”来管理行政事务的“夺权”因素让位于重新强调团结和统一战线。9月份，毛泽东在武汉发出下列指示：“夺权的基本任务是进行革命大批判、组成大联合以及尽快产生三结合班子”。毛批评相互对抗的组织都自高自大，自以为“核心”。他说：“如果一个单位里有了两派，我不相信一个就是左派，而另一个就是右派……认为谁应该是核心，这是很愚蠢的”。

很显然，周恩来和文革小组在对付“5·16”阴谋问题上所结成的关系只是一个暂时的合作。江青在9月5日对来京的安徽群众组织代表的讲话中十分明显地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她说，“5·16”阴谋集团只是一小撮，因此没有必要大规模地肃清阴谋家。她态度鲜明地赞同毛的“和平斗争”的口号，并且号召进行一场“自我批评”，她指出“宗派思想”是一种

“小资产阶级特性”。

9月26日，周恩来又转过来强调文革小组组织上的完整性是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周说，文革小组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总参谋机构”；它在组织上与党的书记处是“平等”的。他指出：“……我们不能将党中央领导下的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文革小组分开，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在这种情况下，对立群众组织之间的矛盾就变成较为温和的“人民内部矛盾”了，而周在监督国家各级行政机关革命委员会内机构恢复工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杠杆作用。9月28日，周和文革小组成员接见东北群众组织的代表。周再次强调他1966年秋的讲话，向代表们指出：

你们还年轻，应该学会进行阶级斗争。不要因为有一两个不好的领导干部就诽谤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主席最反对那样了。这种诽谤触及不了人的灵魂，相反倒会使人模糊不清。

周强调，对那些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行人身虐待，例如强迫他们坐“喷气式”等，显然违背了毛主席强调要进行说理斗争的教导。周还强调，“三结合”和对立群众组织的团结是“夺权”的必要前提。

周处理某些群众组织提出的刻薄要求的灵巧手腕在他11月8日广州之行中表现得一览无余。他让军管委员会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但他更着重向群众组织指出，两广“位于国防前线”。他向群众这样解释了毛泽东9月作出的指示：

过去，我们说我们应当以左派为核心。现在，我们大家都

是革命群众组织。我们有时说群众组织，有时说革命群众组织。广大群众都决心干革命。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群众不想干革命这可能吗？

然而，领导班子转化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虽然北京在高呼着群众组织之间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在政治上十分脆弱。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又反射回来，尤其是那伙受到“二月逆流”挑战的人。1968年2月中旬，周恩来在外交部内几乎被架空了，当时有91名办公室领导和驻外大使联名贴出一张大字报，对炮轰陈毅提出批评。大字报抨击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思想，指出，正是那些诬陷陈毅的人才是真正的反对毛主席“革命外交路线”的人。

这件事的发生危及了周恩来同文革小组头头们的关系，在这微妙的政治恢复阶段，周不愿被迫仓促表态。他叫陈毅做“自我批评”，陈重复了他1967年1月25日“自我批评”中的要点。在给周总理的一封信中，陈接受周提出的批评，承认那份大字报的确“右”了，并且承认他和那91位“同志”“……没有真正在文化大革命中接受教育”。

在3月6日的自我批判大会上，陈毅为有幸与群众在一起表示感谢。他自认一直在“庇护”老干部，并且指责革命青年是极左分子。他供认他太过于自我为中心了，以为只有他才懂得“毛泽东思想”的意义是什么，而实际上他一直通过过于强调“政策”在追随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承认，他的自我中心思想在91名干部写的大字报中暴露无遗，因为大字报将“炮轰陈毅”这个问题当作区分“革命”和“反动”的界线。炮轰陈毅不是什么重要标准，他强调，这样说就是违背了

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广大革命群众观点”的真正区分标准。

周又让陈毅去参加了另一个群众大会，但他坚持不懈地试图恢复党的延安时期的那种权威。1968年4月，他用毛泽东关于不要使用“绝对权威”这种说法的指示抵挡住了戚本禹违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想“建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的打算。6月，周又用毛的另一项指示斥责了“外事系统”内那些无法无天的激进分子，命令他们不要用“北京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种说法。

只是到了1969年春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外交部似乎才恢复了正常状态，当时外交部各部门绝大多数正副领导都在公开场合出现了，而周恩来的地位也更坚固，他开始系统地将熟练的有经验的外交官派回到世界各地的中国使馆。迟至1971年姚登山被处决才算了结了旧帐。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对外政策中提出了一个关于在全世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大问题，而在对国际势力均衡的评估方面几乎毫无进展。谴责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仍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帝国主义的垂死还一直为人所盼。五项原则偶尔成了大字报争论中受攻击的目标，周恩来只是在北京十分有限的接见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团时才偶尔提到五项原则。

在外交事务中开展“两条路线斗争”的情况下，社会主义吸收“中立主义”组成统一战线的理论失去了不可忽视的政策意义，但周仍不厌其烦地为未来作准备。在他谴责刘少奇的讲话中，他重申了1947年1月毛泽东写的一篇文章的重要性，这篇文章是关于美帝国主义将注意力集中于殖民地世界

这个中立地带所出现的国际局势的。文革中左派的支持者们在这一点上几乎对周无能为力，他有毛主席的支持。例如，康生在1967年11月8日谈论毛泽东思想时说，这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他强调毛泽东在外交领域发展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和“两个中间地带”的理论。

这个理论的提出后来被证明十分重要，但突然插入的文革打乱了周恩来的对外政策和外交的开展，这些对外政策和外交被认为是中国国内理性实践的体现。在国际上大肆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强调“宣传党”是不协调的，而宣传党是早期中共对外交的一种理解。“宣传党”包括了党的现实主义“工作作风”和统战原则。

文革使人发现了一个令人感到奇怪的悖论：文化大革命本身最终被证明是最名符其实的否定一切。它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和思想宣布发动的，但实际上，它却走向了作为一种理性的调查研究工具的“毛泽东思想”的反面。在各执一词的文化大革命大辩论中，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显然变成了一个荒谬的东西，不论是外交部还是中国外交都逃脱不了它。尽管周恩来有着卓越的政治才华，他自己也不得不在政治上采取消极的手段以便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七 中美关系正常化中的 战略与现实主义

在西方，中国人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观点的改变常常被看作是文化大革命后“实用主义”战胜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最好例子。不错，周恩来是个现实主义者，但这仅仅是从他自己的中国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方面来说是这样，对他的“现实主义”——与中美关系正常化直接相关——作出解释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他对“工作作风”和“方针政策”的意识形态的理解。

亨利·基辛格认为周“聪慧过人，机智敏捷”。基辛格相信周是一位“娴熟”地掌握了国际现实的“伟大外交家”。确实如此，就连一些对周批评最激烈的批评家也不得不为周的魅力所倾倒。例如，反共记者乔·艾尔索普采访完周总理后不得不承认：“……我想不出有哪一位大国领袖能比中国现总理更聪慧和镇定沉着。”

不过，周恩来很少评价基辛格。基辛格在哈佛大学的吹毛求疵的同事们都认为基辛格梦想着能再现著名奥地利外交天才梅特涅的生涯，这位奥地利外交家巧妙地重构了拿破仑被推翻后的欧洲格局。有一次，周听完有人将基辛格和梅特涅相比较之后，反问道：“在今天怎么可能出现一个19世纪的梅

特涅来呢？”对周来说，梅特涅的世界已烟消云散了，产生梅特涅的社会力量已不复存在。基辛格本人也反对与梅特涅相比，因为现在通讯联络已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当时的欧洲是相互作用的贵族统治的国家的历史，其外交深深地打上了“同源文化的现实”这个烙印。

在谈论周恩来时，基辛格认真地分析了中国对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在他给尼克松的关于他秘密访华的最初报告中，他把中国领导人描述为“具有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有强烈的信仰，近乎狂热。”尼克松在对他的“和平之行”的叙述中表示，他最为“深刻难忘的回忆”是周恩来的“无与伦比的品格”。尼克松对周的“刚柔相济”的品格感受极深，但他对周的尊敬同他这个冷战老手本能的谨慎心理是交织在一起的。也许，周的知识渊博令人难忘，但周的“洞察力”却“大大地为他那种刻板的意识形态框框所歪曲”。

尽管基辛格在早期对周的看法有所保留，但经过同周几次令人激奋的会谈之后，基辛格看出周对国际政治有着十分现实的了解，基辛格将北京所作出的实际战略性推测与宣传区分开来，继续进行反美宣传并非就意味着缺乏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现实。

作为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基辛格摆脱了自己的学院气。作为一名哈佛教授，他曾对“意识形态统治”和“实用主义统治”作过比较，认为前者由于耿耿于怀其最终目的，对国际政治不可能作出理性的判断。但在下列评价周的现实主义中，基辛格却认为“信仰”和受过训练形成的理性之间有着一种共生的关系：

他是一个为信仰而献身的理论家，他的信仰支持他度过了几十年的斗争生涯，并把他那热情的性格锤炼成为一个我所遇到的最敏锐而又能对现实冷静估价的人物之一。

基辛格将中国和美国对国际关系的看法进行了比较，他认为前者要显得更现实一些。欧洲贵族政体的“同源文化的现实”可能已成为历史，但欧洲古典外交的基本的理性原则却在周恩来身上以中国方式再现出来。基辛格说：

中国的态度符合欧洲政治艺术与伟大古典传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能够冷静而不感情用事地估计保持均势之需要，而不受意识形态或感情冲动的影响。他们是善于搞平衡的大师，不是精于进行对比的艺术家。他们深谙均势之道，懂得各种力量处于经常变动状态之中，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进行调整。

在另一方面，基辛格对美国方式中出现的混乱感到痛惜。这种方式在重大事件上太注重信仰了。基辛格认为，尼克松政府理应用势力均衡的错综复杂性来教育教育美国人。

基辛格1973年2月17日在毛泽东的书房里同毛和周进行了交谈，他意味深长地给中国领导人套上“现代马基雅维里主义”称号：

毛泽东，这个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之父，曾经为了保持学说的纯洁性一再折騰他的人民，现在竟然不厌其烦地表明中国的每堵墙上刷写的标语口号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在

外交上国家利益超越意识形态的分歧，让意识形态的口号掩盖着均势的考虑。

基辛格强调政策和原则要灵巧地分离开来，但很难说得清楚周恩来和毛泽东是从哪、从谁那里接受了欧洲传统均势思想教育的。作为一名学生身份的记者，当年的周恩来曾将这种均势原则当作是对中国民族独立的一种威胁而予以否定。在他的整个生涯中，周主张主权平等原则，反对势力均衡。周现实主义概念的根源并不出自于欧洲，它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是自觉地通过“实事求是”来研究实际。由于它是中国共产党“工作作风”缺一不可的组成部分，所以“实事求是”同时也是一种“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实践运用。

基辛格认为，作为一个责任重大的核大国，美国在其同苏联的关系上比中华人民共和国具有更大的伸缩性。他认为，对苏联有着强烈敌对情绪的中国人念念不忘“霸权主义”——即苏联要统治全世界。然而，作为一位对“客观”政治现实的矛盾驾轻就熟和热情献身于中国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事业的老练的统战政治家，周对遏制苏联大多是牵强附会地说说而已，较少让人承担一种特别而且不易摆脱的义务。

“霸权”，在欧洲均势历史中表示一种在国家体系中居支配地位的中性的、机械的概念。现代汉语中“霸权主义”似乎来自于中国传统的对“王道”和“霸道”的区分。“王道”表明以仁义治天下和处理对外关系，而“霸道”表明凭借武力进行统治，这种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特征之一的道德宿命论和现代出现的明显采用说教式对外政策声明的倾向之间可能有点关系。不过，“霸权主义”的特定含义与中国对二十世纪变化的解释有

更直接的联系。

周恩来在向党内解释中美关系正常化和“霸权主义”时，否认他的国际力量均衡观点和美国现实主义的势力均衡观点有相同之处。周明确否认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提法，这种说法与他自己争取中国的“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的努力相抵触。

在1971年11月19日内维尔·马克斯韦尔的采访中，周恩来说到了尼克松的均势观点。他认为欧洲共同市场国家作为一个新的国际政治力量的崛起是美国人所不情愿接受的事实。他不同意尼克松的由中国、美国、苏联、欧共体国家和日本构成的世界五极格局的说法。尼克松将中国包括在其“强权政治”之内是忽视了中国的统战政治，中国的统战政治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

周强调，中国在联合国将坚持各国一律平等的原则。这时，马克斯韦尔追问说，这样强调是否过于“理想主义”化了，他接着说，在国际关系中，实际上不可能认为一个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同中国具有同样的重大影响。周敏捷地将这个问题回避开来，他坚持认为，如果马克斯韦尔愿意用“理想主义”这个词的话，他完全可以这么用，但在认清新兴国家在摆脱殖民统治后进行斗争所表现出的政治威力基础上制定的政策是与现实完全相符的。而这个现实是美国的“现实主义”所未能承认的。同样是美国的这种“现实主义”将中国排斥在联合国门外达二十二年之久。

周经常将国联的瓦解追究到欧洲的均势上，这种均势在世界事务中未能尊重主权平等原则。1970年10月，周对埃德

加·斯诺说,联合国的未来“难以预料”,因为尽管反对超级大国操纵联合国的趋势在增长,联合国还是有可能“遭受国联同样的命运”。周表示,中国将联合第三世界力量,努力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

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对联合国的各国主权一律平等原则构成了挑战,而“霸权主义”问题尤其是当今“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问题。基辛格将中美上海公报正文中出现的“霸权主义”看作是“苏联扩张主义的新代名词”,而周的“霸权主义”则既指“美帝国主义”,也指“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永不称霸”这个特定的说法是文化大革命直接的产物,它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习语中的一部分。这个方针将“自力更生”作为国防的基础,它表明一种防御性的军事战略设想,这种设想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口号中所表示的那种国内资源最佳发展方案是紧密配合的。

“霸权主义”本来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理论和第二国际对“社会沙文主义”批判的产物。后者在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直接得到了证实。中国所发表的有关评论指责苏联领导集团在搞“社会帝国主义”。周1968年9月30日在北京指出,美国和苏联都在搞“帝国主义”,美国和苏联既相互勾结又相互竞争,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根据毛泽东的辩证法,周强调说,美苏间的相互斗争是主要的。有的时候他们会联合“反动派”组成“神圣同盟”来反对中国,但即使在“所谓的”缓和时代,他们也难以维持持久的团结。

文化大革命约束了统战现实主义的实施,也危及到周组成社会主义和中立主义联盟的方针。将“现代修正主义”、“帝

国主义”和“反动派”一视同仁地看待，并一起加以反对，这种观念是很不切实际的。它如同“左派幼稚病”那样“只要斗争，不要联合”。不过，就算文革没有很现实地弄清中国的敌人之间的差别，坚持强调“自力更生”这一点也还是使中国免于在海外承担军事义务。“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只是通过发表政治宣言和提供物质援助以表示“坚定地支持”，也仅此而已。尽管在一些措辞上还大谈世界革命的前景，但周恩来和毛泽东还是设法避免付出在越南直接军事卷入这样的代价，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种子实际上在文化大革命阶段就播下了。

中国将捷克危机同中苏边境紧张局势联系起来，自1966年以来，苏联就在中苏边界进行大量的军事集结。中国的传播媒介不厌其烦地大谈美苏相互勾结。中国新闻界详细地引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1969年3月向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通报中苏边界冲突事件时，说它表明苏联再次企图让美国一同参与对中国“先发制人的行动”。

文化大革命中的矛头针对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要比针对美帝国主义更强烈。前者在中国国内对毛的革命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尽管那样，毛和周还是强烈地关注着日益增长的影响着美国政治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周指出尼克松的印支战争“越南化”政策是在国外维持美国的“仆从”，在国内平息反战运动的一种计谋。他将“越南化”比作美国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为挽救蒋介石政权而玩弄的“中国化”翻版。蓬勃发展的民权运动，美元价值的下跌以及风起云涌的反战运动都表明美国已无力维持其沉重的海外义务了。

根据60年代后期国际上所发生的事件，像周恩来和毛泽

东这样干练的统战战略家认识到“只要斗争，不要联合”是荒谬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他们对“社会帝国主义”作出回答的一部分，但这并非意味着反对正在衰落的美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的停止。

美国、苏联和统一战线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召开的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总结了党关于国内政治恢复进程的最新思想，并就对外政策作了全面的说明。周恩来和毛泽东全力投入了政治报告的终稿准备工作中。当时的政治秩序是由周一手负责恢复的，但他并未获得应有的地位。4月1日，大会重要的政治报告是由林彪作的。

报告肯定了开展调查研究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延安“工作作风”。林彪恭敬地引用了毛泽东的传统教导：“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大会的格调是“团结和胜利”。大会否定任何形式的向共产主义的迅速过渡，修正后的党的章程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但它同时也强调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报告中关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陈述并没有惊人的新东西。报告指出，中国要继续对美国 and 苏联保持警惕。林彪重申了文革的提法，要求在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运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在中国同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国家关系中贯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苏美企图孤立中国，这“对中国有益”，它恰恰可以增强中国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

报告重申了1月下旬对尼克松就职演说所作的分析。美国“纸老虎”正如同日薄西山，在日益衰落。国内矛盾使美国受到削弱，它玩弄“反革命两面派”的把戏，用“热爱和平”的美外衣来掩盖其战争野心。林彪重申了毛泽东的公式，“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此警告横行于越南的美国。

苏联“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等理论在报告中受到指责，但林彪进一步确定了周恩来关于“必须通过外交渠道”谈判解决中苏边界问题的声明。林彪附带地透露了苏联总理柯西金3月21日曾想打电话给中国领导人。后来，周恩来告诉尼克松说，中国的接线员擅自在电话里骂对方是“修正主义”而挂断了电话。3月22日，中国政府指出，中国政府愿意通过外交渠道进行联系，而不是使用莫斯科—北京热线。

中国方面故意慢腾腾地作出反应，以显示苏联急于想掩盖珍宝岛事件的真相。传播媒介报道说，4月11日苏联政府紧急要求中国在四天之内派代表去莫斯科“磋商”。这条消息是4月12日登出的。4月14日，中国政府作出答复：“我们将给你们一个答复，请镇静一点儿，别激动”。

中苏边界冲突一过，苏联政府就发起了一场外交攻势，呼吁建立“亚洲集体安全体系”。但响应者寥寥。就连印度也鼓不起多大热情。中国也展开了宣传攻势，指出勃列日涅夫的这个建议显而易见地是在拼凑“反华军事联盟”。

7月13日，在招待巴基斯坦空军中将努·罕的宴会致辞中，周恩来着重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一直严格遵循和平共处

五项原则。周将巴基斯坦同“所谓的集体安全体系”相对照，周将这个安全体系说成是“社会帝国主义拼凑反华军事联盟的前奏……”。周认为勃列日涅夫的这个体系继承了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衣钵，因而“……社会帝国主义只不过是步美帝国主义的后尘。”在7月16日的一次讲话中，周驳斥了苏联的宣传，苏联舆论声称中国对外政策已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正给世界民族解放斗争带来损害。他斥责苏联人“一心想同美帝国主义大做反革命交易。”

中国发起的反对勃列日涅夫集体安全体系的宣传攻势还谴责了苏联的“国际工农联盟”理论，指出这种理论是要确立苏联在国际工人阶级队伍中有责任召集一系列地区联盟这样一种“优势”地位。以民族解放的名义来压制民族解放运动，因此，勃列日涅夫的联盟理论同伯恩斯坦的“老牌修正主义”如出一辙。

9月11日，周恩来在北京机场同中途暂停在这里的柯西金进行了交谈。柯西金是参加胡志明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两人进行了“诚挚的交谈”。既然“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无法用于中苏关系上，周确信在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可以得到维持的。周重申了中国方面9月18日的建议，呼吁双方将各自军事人员撤出所有有争议的地区。毛泽东在同尼克松交谈中说，他告诉柯西金说，他将在同苏联进行的一万年原则斗争中减少一千年，以答谢柯西金亲自光临北京。

10月17日，周恩来向越南南方祖国解放阵线代表团保证，中国完全支持“所有美国侵略军及其仆从无条件地从越南南部撤走”，不论“非美国化”还是“越南化”。后来，周恩来在同

北越领导人范文同的会谈中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10月25日发表的周一范会谈联合公报指责“越南化”是个侵略阴谋。公报宣布中国是越南的“可靠后方”。

尼克松主义被看成和艾森豪威尔主义一脉相承，都企图“用亚洲人打亚洲人”，而它使中国人注意到了日本的战略重要性。1969年11月21日发表的尼克松—佐藤荣作联合公报确定“冲绳归还”日本，但日美安全条约无限期延续被中国人解释为日本的“冲绳化。”

中国对日本首相佐藤荣作在华盛顿发表的讲话，称南朝鲜对日本的国家利益极其重要作出了愤怒的反应。美国企图让日本承担在越南化时代亚洲地区安全的责任，这引起了中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心，《人民日报》认为，尼克松一再强调美国是个“太平洋国家”这个事实表明，“……美帝国主义决不会放弃它在亚洲称霸的企图。”

在11月29日同阿尔巴尼亚大使罗博的谈话中，周强调，在亚洲，“……美国已积极地利用日本反动派作为它的主要帮凶。”但周对“日本、西欧和北美的革命群众运动”很乐观，他声称“在美国，一场大规模的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越南的斗争的新高潮即将到来。”

1969年10月，基辛格告诉美国驻波兰大使瓦尔特·小斯托塞尔，指出美国有兴趣恢复华沙中美大使会谈，事实上，中国在较早的时候（1968年11月26日）就提出恢复谈判，以期望随着1968年的大选美国政策有所转变。中国同意基辛格的提议，华沙谈判于1970年1月20日恢复。2月18日，理查德·尼克松在他关于对外政策问题的国会报告中指出，寻求

改善同“共产党中国”的关系对美国有利。两天之后，中国人在华沙暗示，欢迎美国高级官员访问北京。

这些相互之间的试探被印度支那局势的突然恶化弄复杂了。3月18日，西哈努克被废黜，他在北京寻求避难。4月30日，美国总统尼克松命令美国军队对柬埔寨境内的越南人避难地采取“时间有限，活动有限”的行动。自从1954年日内瓦会议以来，周恩来就一直关注于柬埔寨和老挝必须中立，北京严重地关注着印支战争扩大的危险。毛泽东发表的一项指示指出：“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仍然存在，各国人民必须有所准备。但革命还是当今世界的主流”。尽管如此，在10月1日国庆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站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对埃德加·斯诺说，他欢迎尼克松访问中国，无论是作为总统，还是作为观光旅游者，他都欢迎。

纵然如此，周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1周年之际对毛泽东5月份作出的指示进行了阐述，指出超级大国不可能随心所欲地瓜分世界，重申中国“坚决支持”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的革命斗争。当1971年2月尼克松下令在老挝采取军事行动以阻止北越通过老挝南部进一步向南越渗透时，中美之间的关系似乎又进一步倒退。

尽管印度支那出现复杂局势，中美之间仍在继续发送外交信号。3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取消对于使用美国护照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就在这个月，“人民外交”出现了一个突破。一个在日本参加世界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收到了去北京的邀请。在受到毛泽东的亲自过问之前，周恩来曾发电报不赞成这种邀请。后来，周告诉来访的一个美

国代表团说，“……当中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还在持观望态度之际”，毛泽东亲自作出了这个决定。1972年2月，毛本人告诉尼克松说，中国长久以来的政策是坚持先解决所有重大问题，然后再谈发展人民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毛接着又说：“后来我觉得你们是对的，于是我们就打起乒乓球来了”。

虽然有若干突发性的因素推动了毛走向中美关系正常化，但1974年12月周恩来对美国参议员马克·曼斯菲尔德说，毛泽东对尼克松1967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感受颇深。在这篇文章中，尼克松抛弃了他以前坚持的“多米诺骨牌理论”，并强调在认识中国在世界事务中未来作用的重要性上必须要有现实主义的耐心。

1971年4月14日，美国乒乓球队在北京受到周恩来的接见，两天之后，尼克松宣布进一步放宽对中国的贸易和旅行限制。也就在这个月，一个邀请“美国特使”访问北京的口信通过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阿加·希拉利传到基辛格手中，一开始中国邀请尼克松的特使作一次公开访问，但尼克松要求完全保密，中国又欣然答应。尼克松担心公开访问会过早地引起国会里的敌对情绪。

基辛格随同三位助手——温斯顿·洛德、约翰·霍尔德里奇和理查德·斯迈塞尔——从东巴基斯坦飞往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新闻界都以为基辛格由于得了“德里”痢疾正在休养之际，他却从7月9日至11日正同周恩来在北京进行着历史性的会谈。7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下端登出一个小正方形花边消息，指出周恩来已邀请美国总统尼克松于1972年5月之前访问中国，“以谋求两国关系正常化并且双方就共同关心

的问题交换意见。”

随之而来的事态发展并没有使双方做出政策性的让步。在台湾问题上双方态度也没有什么缓和迹象。尼克松的“战争越南化”政策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危险仍然是北京同越南、柬埔寨、老挝和北朝鲜盟友交换意见时所强调的重点，而且周恩来继续坚持所有美军必须无条件地撤出印度支那。

7月19日，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接见厅里，周接见了美国“亚洲事务学者委员会”（CCAS）代表团。周与往常一样，事先听取了有关情况介绍，接着谈起了该委员会对过去一代美国学者的指控，这些学者显然在为美国一些机构从事“专项”研究并且对美国的越南政策持默许态度。周并非不在意他的客人们的看法，但他对这些“官方”学者深表同情，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麦卡锡横行的50年代曾受尽压迫”。

周同时还将“乒乓外交”放在一个恰当的角度来看待。周认为，不论“人民外交”多么有价值，它也不可能替代政府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周坦率相陈：“仅仅发展人民的交往是不够的，因为在当今世界，各类国家的政府机构还是实际存在的。”因而，仍有必要与美帝国主义的代表尼克松总统打交道。

对中国对外政策的整个历史，周本人是十分坦率明白的。他自愿承担了1954年没坚持就印度支那问题形成书面协议的责任，而如今他反过来要求美国无条件撤出印度支那。周认为，尼克松来中国反映了美国国内舆论的一个重大变化。多年以来，周一直表示美国人民会推翻美国政府的遏制政策。他确实承认苏珊·谢克的观点，认为美国的“革命运动”尚未发展到“改变社会”的程度，但当时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

美国目前正处于巨大风暴的前夜。”

至于日本，周着重指出它的“军国主义”。这并不仅仅是个舆论宣传问题，这是个从战略上进行深思熟虑的计划问题。日本对尼克松主义紧密配合，及时作出了反应，并且全面开始了寻求同美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基辛格后来透露，周恩来和毛泽东关心的是“尼克松震动”会在日本社会引起不安，从而可能煽动起日本传统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后来，毛泽东要基辛格别迫使东京在华盛顿和北京之间作出选择。

当年作为一名学生身份的记者，周恩来对“垄断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相互关系感受极深。现在，周又同一群美国大学师生谈起了日本“军国主义”这个问题。当年，他说日本“军国主义者”缺乏资源，并将满洲和南亚看作是他们的“生命线”。接着周评论说：“如今，日本军国主义又在说马六甲海峡是他们的生命线。这个地方是生命线，那个地方也是生命线。”历史上得出关于战争的经济论点在当代还有某些相同之处，周推论道：“……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因为日本的经济发展不平衡。他们缺乏资源，他们得进口自然资源，而且他们还得依靠外国的市场。”

周承认，“朝鲜同志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日本问题是近期访问朝鲜期间议事日程上的一个重要问题。周并不完全悲观失望。他相信日本国内民众广泛厌恶“军国主义”。而且，随着战后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这类新兴国家的出现，地区局势已非同往昔了。

代表团成员指出，美国的“军工企业”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对此，周恩来置之不管，因为他没有直接经历过美国社会，

而且这是美国人根据自己的“自力更生”原则行事的事情。不过，周还是谈到了尼克松主义产生的主要动因。他认为美国将自己的资源都过于挥霍在国外了，他打比方说：

这就像中国的寓言所说的那样，用十个手指去抓十只跳蚤。你正要抓这个，那个却跳没了。到头来一只也抓不着。你要是腾出一只手来，放走五只跳蚤的话，你弄得好的话有可能抓到一只。

在8月9日接受美国《时代》周刊副社长和专栏作家詹姆斯·赖斯顿的采访时，周恩来对他的观点作了进一步阐述。采访一开始就谈到了美国国务卿罗杰斯打算在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上要花招，接纳中国进入联合国，同时允许台湾在联大保留一个席位。周恩来为东京和台北在这个问题上遥相呼应深感苦恼，但当赖斯顿询问罗杰斯的这个立场会不会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出现波折时，周说他目前还不能这么肯定。不过，他坦率地说：“至少这算不上向前迈出了一步。而且，在联合国和国际论坛上肯定会由此发生激烈的争论……”。周总理声明，只要联合国通过了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不进入联合国。

赖斯顿还要求周谈谈中国对外政策的原则，并问道：联合国宪章要求不以武力解决纠纷，而中国强调进行革命和民族解放，这两者之间有无冲突之处？周立即发起了攻势，他指出，中国仅仅是在美国军事力量进逼到鸭绿江之后才对美国在朝鲜的侵略行为作出反应的，他说，中国仅仅“在别的国家遭到侵略时”才去“帮助”他们。

周指出，尽管美国霸占了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一直保持了自我克制态度，而且，在中美讨论重要问题的议程上，印度支那问题还是放在了台湾问题的前面，这是因为在台湾地区不存在战争状态，而东南亚地区的战争却正在扩大。周接着说，尽管印度支那问题得优先解决，但中国并不想成为“任何形式的斡旋者”。他这么说可能是回答当时外界的一种推测，有人认为他和基辛格敲定了一笔交易，由他帮助解决印度支那问题以换取中美关系正常化。

赖斯顿直截了当地追问周：尼克松主义和中美关系正常化之间有无“冲突”？周毫不犹豫地承认有一个“矛盾”，那就是它可能会促使“日本军国主义化”的复兴。赖斯顿让周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战后以来，美国人民一直未对日本人民怀有任何敌意。周认为这种隐晦的比较“很不公平”，他反驳说：“这是不公正的。你并不了解我们的对外政策，你所听到的只不过是我們的一些口号而已”。

这次轮到周让赖斯顿注意中国和日本之间人民外交的发展形势，他指出要将反对“日本反动派”和“敌视日本人民”区别开来。至于尼克松主义所带来的“矛盾”，周说：“这需要有关各方经过长期努力加以解决”。

周对即将到来的同尼克松会谈的态度反映了他和往常一样的镇定沉着。就在官方宣布基辛格将第二次访问北京半小时之前，周告诉一群美国人——包括黑豹党*领导人休·P·纽顿和前美军迪克西小组成员之一约翰·谢伟思，北京愿意

* 英国的黑人组织。——译者

谈判这一点不算新奇。周说：“我们同蒋介石谈判差不多进行了十年。”这同当年在西安一样，尽管蒋介石欠了共产党累累血债，但周恩来还是表现出了非凡的仁至义尽的态度。

对即将到来的会谈，周的看法和尼克松的看法截然不同。尼克松曾声明当今时代是个谈判的时代。周既强调谈判，也强调“武装斗争”。他同时还指出，同莫斯科进行谈判也是中国的基本政策。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周都有备无患，正如他所说的那样：“谈成了，那很好；谈不成，那也没关系。”在7月份周与基辛格的秘密谈判时，周竟然曾若有所思地想到了欧洲、苏联、日本和美国将来有一天再次瓜分中国的可能性。

就周恩来这方面来说，没有必要作出什么妥协。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处境正在迅速恶化。甚至当基辛格还在北京的时候，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投票通过驱逐台湾当局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美国政策上出现的混乱使得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中获得了优势。对于手中握有这样—个结果，周仍然显得雍容大度。他本人并没有料到这次会赢得绝对多数。

10月28日，在接受《朝日新闻》在北京的记者采访时，周认为，中国进入联合国要“慎重”从事。他告诉这位记者，这并不是说中国缺乏信心，而是表明了中国要进行谨慎的研究。周解释说：

中国有句俗话说：“遇事要三思而后行”。对联合国情况我们了解不多，对联合国里出现的新情况我们不太熟悉。

在这个时候，周甚至尚不知中国将组成什么样的代表团。

他不得不同毛主席讨论此事。至于日本政府方面帮助美国提出“保留重要问题”议案，以允许台湾保留联大席位，周指出，尽管如此，他还是对绝大多数日本人民的支持表示感谢，他希望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将进一步推动中国和日本外交关系的恢复。

周重申，中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超级大国，中国将同亚非拉不发达国家团结在一起，抵制“大国”的“控制”和“强权统治”。周还指出，各类国家在“中国问题”上的投票对中国的既定立场将没什么影响。他以以色列投“赞成”票为例，坚持说，只要以色列还在中东进行侵略，中国就不可能同以色列有官方关系。他还提醒说，尽管葡萄牙也投了赞成票，但它别指望中国会减少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几内亚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支持。

尼克松痛骂反对台湾的代表投票结果公布后在联合国会场走廊跳舞行为不光彩，但他仍继续进行他的北京之行。阿尔巴尼亚同阿尔及利亚和其他18个提案国一起促成了美国在联合国的失败，终于得到了一个可以预料的结果。根据恩维尔·霍查所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恢复是个巨大的胜利，因为它既违反了美帝国主义的愿望，也违反了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意愿。”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相信，中国加入联合国将会“对建立国际新秩序作出有力的贡献”。诺罗敦·西哈努克热情洋溢地宣布，美国已丧失联合国大会的控制，并且将在亚洲走向惨败。

中国官方10月29日发表的声明宣布，10月25日的投票结果是“毛泽东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在外交上的胜利”。

这次投票被认为代表了一种“总趋势”，“……—两个超级大国正一天天失去阵地……”。周自己的“理想主义”在重申各国一律平等、要求“……联合国的事务必须由所有成员国一起来处理”上表现得十分清楚。后来，《人民日报》12月份发表的一篇社论对26届联大进行了总结，社论指出，联大投票反对“双重代表权”方案表明“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可以抵制得了的。社论说：“……两个超级大国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他们将继续以各种方式推行霸权政策。”

在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美国人和中国人都极其谨慎。双方都强调他们的双边互惠主义是个相互受益的问题，而不是一个针对苏联的三边之间举动。尽管如此，基辛格还是认为美国实际上在其同苏联打交道上要比先前“更加灵活”，“较少正面冲突了”。基辛格尽管确信周对势力均衡理论有着直观的理解，他对中苏敌视的解释还是大量归结于中苏意识形态上的争端。基辛格指出：“对周恩来来说，中国同苏联的冲突既根深蒂固又无力自行解决。”

基辛格对周恩来认为中国的对苏政策以谈判优先的说法提出了怀疑。周曾明确认为，主义上的问题没有必要混淆国与国的正常关系。这一点在1971年11月6日中国人大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贺电中再次得到强调：“中国政府一贯坚持，主义问题上的争论……不应当影响国家关系。”同苏联的“正常关系”可以不涉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而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到。

在某种程度上，基辛格还依赖于通过对“民主”和“极权”制度的区分解释中苏争端的意义。在“极权”制度下，“至尊

的真理”只可能有一种钦定的解释。一点不错，在文革期间，“多中心论”被指责为“无中心”论，这种理论否认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在另一方面，周恩来的意识形态色彩日益与毛泽东的延安辩证法相一致，这种辩证法既包括“对立统一”，又包括原则的灵活运用。在对中苏争端看法上，基辛格认为对纯粹的意识形态执着加强了中美关系中的积极趋势。基辛格得出结论说：“中国领导人看不出有什么妥协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最低目标就是孤立苏联……”。

在一篇据信是对外政策的报告中——这篇报告是周恩来在尼克松访华前的两个月作的，中美关系正常化被纳入了战略和意识形态框架中进行考虑。这篇报告大部分根据九大政治报告的说法，并将它当作解释毛泽东国际关系观点的指南。

在关于“世界大战的问题”上，毛泽东表现出了无产阶级的乐观主义态度，他指出只有“两种可能性”，那就是要么革命“制止”战争，要么战争导致革命。第一种可能性是五项原则的最初战略方针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方针认为社会主义和中立主义的大联合可以粉碎“战争狂”们的计划。第二种“可能性”是考虑到一旦发生巨大冲突，不管怎样它还是有希望成为革命的导因，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极大地推动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

毛泽东将国际事务中的矛盾划分成几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类，摆脱殖民压迫，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发展中国家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第二类，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内部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三类，帝国主义内部以及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第四

类，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

周恩来在1971年12月份作的一次报告中提到了这些矛盾类型，并且发展了毛泽东1970年5月份发表的声明，认为革命是“主要趋势”。他将世界划分为美国、苏联和第三世界“三个部分”。就“四大矛盾”而言，周将基辛格的美国战略看作是在未来世界斗争中以“南北美洲为基点”，以“西欧为中枢”，以“亚洲为侧翼”，以“中东为咽喉”，以及以“海洋为中心”的战略。在这种战略下，苏联将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和中东。周认为，由于苏联担心中苏边界争议，所以这不是他们战略中的中枢。照周看来，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构成了“主要力量”。同美国的结盟不可能，只有根据美苏为争夺“霸权”而发生的地区竞争规模进行有选择的联合。

报告透露，朝鲜曾想在亚非国家间开展乒乓外交以罗织“反美”力量，但周却在其“人民外交”中强调五项原则。中国同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关系被解释为“前方”和“后方”的关系。在这三个国家之间的矛盾问题上，周认为，对越南不要“过分称赞”。至于越南对尼克松访华所产生的顾虑，周只是说到：“我们已作了解释。如果它（越南）暂时想不通的话，那就让它看事实的发展好了。”

周承认，对越南得“一步步地进行说服”，但他否认林彪的谈话，林彪认为中美谈判是对越南的一种背信弃义，是对党的一种“侮辱”。谈判，这在毛主席的“重庆谈判”战略中就有实际先例了。无论怎样，美国和苏联仍旧是“主要敌人”。尼克松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将遇到在统战基础上又谈判又斗争方针针锋相对的挑战。

“两面政策”为党提供了邀请尼克松总统7月16日访华的正当理由。尤其是毛泽东在《论政策》这篇统战文章中，要求“既须统一，又须独立”，要对“主要敌人和次要敌人，暂时的同盟和间接的同盟”加以区别。在改变政治联盟问题上，毛指出：“现在的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结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尼克松来北京并没有改变美国在同苏联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内外交困。

“76精神号”于1972年2月21日，降落在北京机场寒风飕飕的柏油跑道上。上午11:30，尼克松总统走下飞机，有力地紧握着周恩来总理的手，想以此来抹去周对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杜勒斯那愚蠢而傲慢行为的回忆。尼克松的随行人员为没有发现“大批可供拍照的中国欢迎人群”而深感失望。中国给予尼克松的礼遇恰当而显冷淡。接待尼克松及其一行的工作全由中国官方人员尤其由外交部人员一手安排。文革“激进分子”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既没出现在机场，也没有出席晚宴。

2月21日中午餐之后，周叫基辛格留下来并告诉他，毛泽东要见见尼克松总统。尼克松、基辛格和温斯顿·洛德当天下午就匆匆去中南海拜会毛主席。毛泽东如此迅速地接见尼克松一行，被国际舆论普遍解释为表明了毛是支持这次访问的。

尼克松和基辛格后来都描述过和毛的会见。一开始，相互寒暄一番，说几句玩笑话。尼克松和毛泽东拿基辛格的女朋友开玩笑。毛尽管患有支气管炎，但他还是很活跃。他说，相比之下，他还是喜欢“右派”一些，他声称在上届大选中他就

投了尼克松一票。毛打了个干净利落的手势，说：“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介石委员长，可不赞成这件事啊！”周恩来谈到北京和台北之间怎样相互攻击，毛冷冰冰地说：“实际上，我们与他的交情要比你们与他的交情长得多。”毛泽东一直是研究中国统战历史的十分自觉的专家。

在动身去中南海之前，周恩来曾同意提供给基辛格他要在晚宴上讲话的稿子。尼克松研究了自己的讲话稿——这篇稿子是由基辛格给他准备的——增加了一些他自己的特色和毛的一些语录。周恩来在讲话中，几乎没有提到什么具体问题。周谈到两国人民要求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强烈愿望，并提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重要性。

周没有引用万隆会议期间的“求同存异”公式，他却引用尼克松在离开华盛顿进行他的“和平之行”之前作的谈话。在谈话中，尼克松希望双方可能有一些“分歧”，但“不是战争中的敌人之间的分歧”，周恩来据此表示希望通过“坦率地交换我们的分歧”，双方“努力寻找共同点”。

作为回答，尼克松大用特用了一些溢美之词。他只字未提中国在冷战中的形象——一个一心想把世界拖入核毁灭的庞然大物。尼克松称赞中国“无与伦比的殷勤好客”“举世闻名”，他说：“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将使世界改观。”尼克松认为，在中美新发展的关系中丝毫没有“霸权主义”可言。他认为，双方谁也不谋求对方的领土，也不谋求支配对方。他还谈到了分歧和原则：“使我们走到一起来是我们有着超越那些分歧的共同利益。当我们谈论我们的分歧时，我们谁也不会在原则上妥协。”

2月25日晚，尼克松再次提到：“你们深深地信仰你们的制度，而我们也同你们一样深信我们的制度。”周承认“我们双方有着巨大的原则分歧”，他转弯抹角地说，“……世界的总趋势必然是走向光明，而不是黑暗。”不过，在宴会交谈中，周告诉尼克松，美国在越南呆的时间越长，美国付出的代价将越大。他很赞赏地以戴高乐迅速撤出阿尔及利亚作为例证，他还心照不宣地指出，中国将继续反对尼克松主义。

“改变世界的一周”以签订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文件——中美《上海公报》——宣告结束。公报的实质内容已在1971年10月经过周恩来和基辛格谈判解决了。10月份，基辛格很担心中国方面可能在公报草案中塞进一些美国不能接受的宣传性内容，在他起草的公报中，他选择了一些温和的措辞以遮掩双方的分歧。

周反对给这份公报加上一个“不真实的外貌”，他提出在联合声明中列出我们的主要共同立场，也就是说，各方再分别表明各自的政治立场。周认为这是与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和独立的原则相一致的。而且，周也是有理由担心中国朋友们会持什么看法。正当美国对北越狂轰滥炸逐步升级的时候，周正在为反对苏联继续努力孤立中国而寻求支持。周拿出对应的草案使基辛格大吃一惊。本来，基辛格担心国际社会会将尼克松总统的访问看成是双方“一系列争执”的休止，但他现在倒热衷于这一系列争执了。他不愿接受世界革命的说法，而且正当美国军人在印度支那献身的时候，他也不愿接受中国作为“北越的可靠的后方”的立场。不过，不加渲染地总结概括各方的立场大有裨益。基辛格说：“将分歧公布出来可以

使盟国和朋友们放心，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保护；如果我们能使一些共同立场得到发展的话，这些立场就可以成为说服那些原则性强的领导人的可靠依据。”毫不虚饰的声明与现实主义是一致的。

公报有一部分概括了双方的一些共同观点，其中最重要的条文是反对“霸权”的共同声明。基辛格回忆说：“我们列出了主要的共同立场，特别是关于两国都反对霸权的那段话（霸权一词后来变成中国非常重视的字眼，但最初却是我们提出的）。”

中国人习惯于提“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基辛格甘愿用“霸权”这个词，这是一个引起势力均衡的词语。不过，在对中国用法的理解上，基辛格认为它专门是“对苏联扩张主义的一种委婉说法。”周在同盟国和朋友交谈中用这个词时指的是美苏两国。尼克松接受了基辛格的推理分析，他说：发表一项“含糊其辞”的公报与强硬的领导是不相称的，强硬的领导应毫不掩饰地承认“分歧”。

基辛格后来说，10月份，在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辞上出现了难以解决的分歧，基辛格巧妙的含糊其辞的说法给周恩来的印象特别深刻，他承认中国的统一，但并没明确提出是支持台北的统一，还是支持北京的统一。2月27日，在上海公布的公报写进了美国方面的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公报还提到了双方“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中国方面不明确提“美帝国主义”或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过，它却作

出了下列声明：“中国将永远不做超级大国，并且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和强权政治。”

公报并没出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但五项原则中的每一点都分别被用来指导中美关系。在2月27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基辛格被问及这项公报是不是表明了美国总统头一次“正式采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语言”，基辛格含糊其辞地回答说：

我不得不说我不怎么有把握……问题在于这项建议是谁提出的。问题在于：它包含的原则我们可不可以依靠，因为我们已说过，我们打算运用这些原则……，谁首先提出的，这实际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

使用这些原则反映美国态度的根本转变。基辛格终于丢掉了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幽灵。

尽管基辛格担心中国对苏联极度敌意，周恩来还是不希望促使同苏联的国与国之间关系的破裂。统一战线方针中的“独立自主”观念阻止了这种决然立场的产生，而且中国领导肯定还未打算将中国的国家安全寄托在中美关系正常化所产生的结果上。中苏边界的紧张局势通过周恩来—柯西金的会谈而得到部分消除，制止苏联鲁莽的冒险主义的最大因素在于中国的团结一致和在中国土地上打一场消耗战。

基辛格和尼克松都避免将“玩牌”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础。双方谁都不愿意承担一种绝对的联盟的义务。公报提到了共同“反对霸权主义”，它也指出任何一方都不准备“代表任何第三方进行谈判”，“也不准备同对方达成针对其他国家的协议

或谅解。”

即使作了这些声明，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还是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情。周曾对尼克松说：“你第一次来这儿，莫斯科有点精神失常了。”“第三方”所能作的选择确实少得可怜。葛罗米柯只好通过期望美国人会像苏联人一样“上当受骗”来聊以自慰。根据苏联的一份高层绝密材料透露，由于葛罗米柯对中美上海和陆未能未卜先知而受到勃列日涅夫狠狠的一顿剋。

而阿尔巴尼亚人，他们刚刚几个月前在联合国倡议接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对中美接近深感不快。即使在最好的时期，地拉那对中国统战方针范围的理解也是模糊不清的。恩维尔·霍查在他的政治日记中将中美接近描述成一件荒谬而邪恶的事件。北京对接特尼克松所作的保留和澄清是要掩盖其对阶级原则的背叛，按霍查的话说，那就是为什么“……尽管尼克松穿过的街道两旁空无一人，而他却仍然龇牙咧嘴地笑，快乐地放声欢笑……”。他写到，即使周恩来说世界正走向光明，他也已在他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游移不定的实用主义政策”上背叛了“世界革命”。苏联新闻界都一致将注意力集中在尼克松的访华恰好是在美国轰炸越南之际这个事实上。

尼克松访华使日本的政策左右为难。过去日本追随美国在联合国提出“重要问题”和“双重代表权”决议案曾使它疏远了中国人。(1971年)10月下旬，周恩来曾表示，中日关系正常化前进的步伐应迈出去，但他拒绝和佐藤总理大臣打交道。佐藤对尼克松主义作出的反应是借机进一步紧密了日本和台

湾的安全关系。

1971年10月以后，佐藤政府做出了一系列和解的表示，但周恩来置之不理。他同日本开展的“人民外交”十分活跃，但周在等待1972年7月日本政府的更迭。随着田中角荣政府的建立，中日正式联合公报立即于1972年9月29日达成。中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担心，促使日本方面在日本政党和群众组织同中国联合发表的宣言中，接连不断地为战时日本在中国扮演的角色进行道歉。周恩来和田中角荣签署的公报也包含有类似的道歉。周取消了对日本进行战争赔偿的要求，他表示1969年11月21日签订的美日安全条约不必成为改善中日关系的障碍。田中角荣反过来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且“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关于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立场。公报重申了中美《上海公报》中的反霸提法，同时作出了不针对“第三者”的保留。

周恩来、毛泽东的反苏“霸权主义”的统战战略在基辛格1973年2月中旬访问北京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基辛格刚刚于1月27日签订了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巴黎和平协议。尽管尼克松当局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前景已表示欢迎。周恩来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关注迅速降低和对日美根据苏联的“霸权主义”而作出安全安排表示理解这一点，使基辛格既感到愉快又感到惊奇。

基辛格这次访问结果达成一项协议，双方各自在华盛顿和北京建立“联络处”。这样周恩来和基辛格可以建立一个长期的政治接触点，以免由于过早的外交承认而导致付出巨大

的政治代价。基辛格认为，周很好地表现了“中央帝国的传统”，他使谈判看起来似乎是由基辛格提出的建议一样，而实际上，这“只不过勉强强地是这么回事儿。”不过，基辛格还是承认，是他“重新提起了联络处这个想法”，他过去曾向越南人提过这个建议，但越南人拒绝了它。周恩来要灵活得多。

基辛格对中美在关于印度支那问题上的默契程度感到惊奇。即使他认为，由于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不能现实地认识到一个统一而且支配着老挝和柬埔寨的越南会带来巨大的威胁，他还是认识到了中国将西哈努克当作反对“河内称霸印度支那”、“维护柬埔寨独立的最好保证”。事实正是如此，周恩来一直没有偏向他1954年坚持印支问题分别解决以保证三个国家成为确实无染的国家实体的立场。他同越南的意见有分歧，并且在拒绝联合国秘书长担任巴黎和谈会议主席方面也坚持他自己的上述立场，但周仍期望越南能追随胡志明的政策，在中国和苏联之间保持相对平衡的关系。

中国人鼓励越南人签订协议，使美国加速撤出印度支那，使越南人有6到12个月的时间休整，以准备解放南越。周相信美国人将再也不会派成千上万的人去越南了。

作为中共统治集团第二号最有实权的人物，周恩来于1973年8月29日向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作政治报告。周正式解释说明了“9·13事件”和林彪之死。林彪问题据称早在九大上就显露出来了。但周还是认可1969年建立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林彪及其支持者陈伯达是九大报告初稿的起草人，但后来由中央委员会，尤其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它进行了修改。

在认为林彪是反对毛的继续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理论的同时，周不失时机地将林彪的“反革命军事政变”归之于文革范围的“右”的一边。他还为当时盛行的批孔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定下了基调，将它同批判林彪联系了起来。这种政治手法巧妙而圆滑，它挡住了文革小组残余的恶毒指责，他们正设法将周恩来当作现代大儒来批判。通过证明自己同毛泽东是一致的，周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党内批判林彪的运动转变为一种通过“实事求是”，“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当然，对它的强调也曾用来阻止文革走向偏激。现在，又用它来批判林彪，据称林彪为了推翻毛的革命路线而对毛极尽拍马逢迎之能事。周谈到了毛的看法：在党的历史上，“常常是一种倾向压倒另一种倾向。”右倾主义的“一切联合，不要斗争”为左倾“机会主义”所用，他们在国际国内要么“一切斗争，不要联合”，要么相反。毛泽东正统的辩证法要求有灵活性，在联合的形势下，不忘“同资产阶级进行必要的斗争”；而在发生分裂的情况下，也不应忘记“在特定的情况下进行联合的可能性。”

周引用列宁关于“必要的妥协”的重要性来反驳阿尔巴尼亚对妥协的指责。阿尔巴尼亚人忘记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他希望他们注意列宁的话：“……妥协、再妥协。大家必须能对作出每项妥协或每种妥协的具体情况和形势作出分析。”

周一直很重视第三世界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抵制。周引用列宁的话说：“……帝国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而处于相互竞争之中”。在当代争夺霸权的形势中，周将欧洲列为“关键点”。这同基辛格的分析是

一致的，但周恩来认为苏联人正在“声东击西”的时候，西方却想把苏联的注意力从欧洲引向中国。正如他在1973年3月所说的那样，苏军在中苏边界上的集结尽管危险，但它并非苏联的战略重点；它只是在摆出一种“恫吓的姿态”，而不是认真准备打“大战”。尽管如此，周还是强调毛的教导，要做好帝国主义可能发动战争的准备，同时也要准备防止“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我国发动的突然袭击”。

至于美帝国主义，周宣称：“美帝国主义在侵略朝鲜的战争中战败之后，已开始走下坡路。它正在日益衰落，这是掩盖不了的事实……”，对“社会帝国主义”的罪行，周列出了一个清单：

对外，（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在中国边界集结军队，派军队进入蒙古人民共和国，支持朗诺美国集团，镇压波兰工人的反抗，干涉埃及，肢解巴基斯坦以及在许多亚非国家从事颠覆活动。^{*}

即使给苏联列出了这样一个清单，周还是指出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同苏联的关系。

周向十大简要地说明了几点新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已得到恢复，随着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越来越多的国家建立了关系，“孤立中国的政策”已“破产”；中美关系已得到“某种程度的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关系的改善并没有使周恩来在联合

^{*} 参见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译稿

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攻势有所动摇。例如，在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中，中国代表提出了周恩来1964年提出的对外援助和发展的“八条原则”。在纽约召开的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会议辩论中，中国代表团站在最前列。周的外交官们同第三世界国家代表要求参与管理国际金融、重新确定和降低“帝国主义”强加给第三世界债务国身上的利率。

从传统的“势力均衡”理论来理解周恩来关于中国和第三世界的“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观点是十分困难的，中国现代史就有其强烈的“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内容，这一点与周的思想紧密相关。周在1949年4月同国民党的谈判中就已强调过“自力更生”的概念，在1956年又进一步得到阐明，它并不反对国际交往和技术交流。它同“闭关自守”形成对照。

毛泽东的“革命外交路线”包括扩大国际交往，但这要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正如党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1974年1月发表的社论所指出的那样，适当的对外交往要同“盲目崇拜外国”区别开来。“自力更生”意味着：“我们将决不掠夺别国人民的财富，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也不依赖任何外来力量。”

对中国不做“超级大国”的强调是中国从理论上重构国际政治观念的中心点。1974年2月，毛泽东概括地向赞比亚总统肯尼思·卡翁达指出，国际政治结构可以分成“三个世界”。美国和苏联由于主张“霸权主义”属于“第一世界”；中国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中的一部分，毛希望这个第三世界同包括欧洲经济共同体和英联邦发达国家在内的“第二世界”联合起来。

中国在这项统战联盟中的中心立场与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自力更生”的理解紧密相联。在国际政治等级结构战略性转变中,第三世界将是个“主要力量”,被派去联合国解释这“三个世界”理论的不是别人,而正是邓小平。1974年4月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理论,对“三个世界”进行了分析。它表明了一种统战方针,第三世界将成为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邓小平既抨击了苏联鼓吹的“国际分工”,又抨击了美国提出的“相互依存”,将它们看作是“新殖民主义的”花招。

邓强调,中国既不“自我封闭”,也不“拒绝外援”,而要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寻求国际交往。他指出,各国特定的情况不同,对“自力更生”运用也将不同;不过,他劝告,要自力更生首先就要控制住自己的自然资源和粮食生产。邓提出了一项更巨大的南南合作模式,他称之为“个别或集体的自力更生”。

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成功的谈判是周恩来外交生涯中最为光彩照人的一部分,但赋予他谈判观点的现实主义并不是来自于基辛格所认为的那样对欧洲传统的势力均衡理论的本能理解。事实上,基辛格错误地理解了周恩来关于“霸权主义”的立场。周的对外政策远非仅仅是一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为了遏制苏联,而更多的是一项多维的政策,其基本目的并不是要与美国结盟,而是要在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基础上达成统一战线联盟。意识形态并不仅仅是用来“装潢门面”,它是周恩来个人“工作作风”的理性源泉。周的现实主义是从统战政治的实践经验中形成的严谨的思想体系。

八 周恩来的遗产：走向 “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周恩来逝世之后，中国共产党对他在60年代后期到70年代中期政治上的成就和方针政策作出了评估。1981年6月27日关于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治上的判断错误进行了毫不隐讳的批评，但避开对周恩来的任何指责。周恩来“……在整个文革期间的处境极其艰难……”，但他仍设法最大限度地减小穷凶极恶的极左势力带来的“损失”，在党内、党外保护了一大批人。决议同邓小平在1980年8月接受奥琳埃娜·法拉奇采访时作出的评价是一致的。当时，邓说周恩来是他的“兄长”，而他本人被普遍看成是“活着的周恩来”。

决议强调，“9·13事件”之后，周恩来一负责中央委员会的日常工作，他就设法将对林彪的批判集中在批判错误的“极左思潮”上。而毛泽东则注意“右”倾带来的政治危险。决议进一步确认，1972年，周尝试着提出1967年被当作“二月逆流”的追随者遭到批判的党员们的一些“正确建议”。他在四届人大这个政治场合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到了1975年他病情严重，不得不由邓小平接替党中央的工作。早在1972年，周就被诊断出得了癌症，1974年7月，他心脏病又严重

发作。

在他1973—1974年在北京同世界各国领导人进行的一系列会见中，周一直强调中国在国际关系上奉行“自力更生”立场。在会见第三世界国家代表时，他认为当前的国际形势是“天下大乱”。当然，按毛泽东的话来说，这种动乱为世界政治中独立力量的兴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文革路线是中国自己革命经验的实质表现。在谈到“山雨欲来风满楼”时，周恩来着重提到了中国现代史上争取独立的趋势，同时又强调在战略上巩固已摆脱了殖民压迫的第三世界政治联盟的重要性。

在1973年9月11日欢迎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的谈话中，周趁机接过客人关于“独立”的话题，概括性地解释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道理。他指出中国最基本的方针是“自力更生”，他同时也表示对欧洲与苏联的关系上联合一致、对美国保持独立感兴趣。

就连在同“第二世界”领导人谈话中，周也直言不讳地指出，中国既反对美国也反对苏联。1973年10月11日，他在欢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的致辞中提到了加拿大在对美“独立”中左右为难的处境。在历史上，加拿大依赖于英国，而美国如今正在修改和发展同其他国家更密切的关系。对这位“老朋友”特鲁多，周十分坦诚，尽管特鲁多有所保留，而且他还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国之一。周说：

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勾心斗角，互挖墙脚，任意侵犯别国的独立和主权。他们的胃口很大，手也很长，

……他们的争夺闹得当今世界不得安宁。

1974年2月21日，周同卡翁达谈论了毛的三个世界理论，并且将正在衰落而又动荡不安的超级大国美国和更为贪婪、更富侵略性的超级大国苏联作了区分。2月26日，周接见了阿尔及利亚总统布迈丁，主张在两国为促使联合国大会关注自然资源问题而作出的努力上坚持“独立自主”立场。3月24日，周接见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周对1967年尼雷尔的阿鲁沙宣言很感兴趣，他再度强调民族要独立，要“自力更生”。5月6日，在欢迎塞内加尔总理的讲话中，周阐述了“个别的或集体的自力更生”的重要性。

4月份，邓小平接过了周的部分工作，接待来访的外国客人。周在他的医院病床上继续工作。在他一再延长的住院期间，他做了多达十四次手术。他甚至还抱病出院主持召开了党的十届二中全会，随后于1975年1月，又在第四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作了基调发言。

1月13日，周集中全部的精力，支撑着最后一次出席全国人代会。他的报告是一个巧妙地将实现四个现代化和进行阶级斗争这两项相冲突的重点糅合在一起。阶级斗争后来成为批林批孔运动的中心议题。

周再次阐明了“自力更生”原则。这个原则防止产生极端的“崇洋媚外”和“爬行主义”“工作作风”。周引用毛的下列教导，以作为“自力更生”原则的权威解释：

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盲目崇拜，独立自主地发展工农业，开展科技文化革命，抛弃奴性思想和教条

主义，自觉地学习外国成功的经验，同时也研究他们的失败的经验，以便从中吸取教训。

在周看来，这条路线为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顶住社会帝国主义的压力”提供了武器。由于有了“自力更生”，中国才未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动荡”中去。周认为美苏争夺世界霸权斗争的重点是在欧洲。周再次强调，要么是战争导致革命，要么是革命制止战争。

周对中国的统战方针作了总结：“我们要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周谴责美国、苏联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剥削者和压迫者”，他同时强调将始终不渝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所有国家建立和发展关系。”在提到中美之间仍存在一些“根本分歧”这个事实的同时，周还批评苏联未能兑现柯西金做出的同中国签订一项确定边界现状协议的诺言。

他报告中的一些内容后来被纳入了1月17日通过的新宪法。宪法的序言确定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自力更生”原则，指出中国绝不做“超级大国”，强调在和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关系中贯彻五项原则的重要性，并且指出中国将为“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做出贡献。

在中国，周作为一位领导人给后人留下的遗产被强调是他的革命献身精神和他的“工作作风”。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外交不可避免的属于对内事务。周是一位机敏而见多识广的观察家，但他自己的国际关系观点基本上属于国产的。美国人，令人惊异的甚至于连苏联人，常常意识不到国内革命经验

同周恩来的外交有什么关系。也许对国内政治观的依赖使得在国际交流方面造成了一些困难，但周恩来还是能够根据国内“工作作风”和“方针政策”对力量均衡作出现实的评估。

在中国，周恩来对当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巨大贡献自80年代初以来一再得到强调。邓小平指出，周恩来和毛泽东创立了中国当代“独立外交政策”的基本框架。周恩来在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主要轮廓内，发展形成了对外政策；不过，当今赋予中国“独立外交政策”活力的具体方针却源于他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求同存异”方针。

当代中国外交政策在进一步贯彻“开放政策”的同时，将“独立自主”放入一个广泛的现代化过程中去表达，这包括更大范围地允许外国参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在作为反帝斗争的一个历史教训而提出的“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之间内在的不协调，从概念上由周恩来提出的“四点公式”解决了。这“四点”即：一用，二批，三改，四创。由于中国不一定要像西方大国那样走“外向型对外工业贸易道路”，中国意欲适当地利用外国的投资和贸易以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加以消化吸收。这四点正是对周恩来和毛泽东1948—1949年立场的高度概括，它也反映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中的辩证思想。

周的国际关系概念尽管是“现实主义的”，但在其试图转变国际关系结构方面基本上是“革命性的”。在他所做的这种努力中，他向第三世界国家强调“自力更生”的重要性。中国当今对外援助方针在概念上仍然是基于周恩来1963—1964年亚非之行中宣布的“八项原则”。这“八项原则”中关于中国决心不使受援国依赖于中国的第四条原则，反映了中国自己在

接受外援中得到的经验教训。1982年，中国总理赵紫阳将这八项原则进一步精炼为关于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技术合作的四点原则，也就是“平等互利，讲究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这四句话再次强调了在“南南合作”中贯彻“个别和集体的自力更生”的方针。

周的“现实主义”来源于他从意识形态上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理解，既不依赖美国，也不依靠苏联。1949年，周就警告要吸取“前车之鉴”。他不愿步国民党的后尘，但他和毛泽东确实尝试过“一边倒”，而最终获得的经验教训是要付出丧失中国独立的不可接受的代价。

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而开展的外交也是他独立自主方针的一种延伸。错综复杂的“反对霸权”的双边主义是以传统的统一战线政策中的“两面方针”为前提的。它并非梅特涅“均势”战略的直观翻版。周深知列宁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采用的策略。他的现实主义是在干革命的过程中挖掘出来的。中美关系正常化既包含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也体现了中共的统战策略。甚至中美签订了《上海公报》后，美国仍然被当作一个同苏联又竞争又勾结的“帝国主义”国家来对待。“反霸”并不是反苏的同义词。作为国际关系一项方针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发展相互合作，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推动政治多边化。甚至于在1973年欢迎法国总统蓬皮杜的宴会讲话中，周还是忍不住宣布：“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迟早必将被世界人民送进历史的博物馆，这是肯定无疑的。”

对周恩来来说，“自力更生”是一个在帝国主义问题上的意识形态观，是一个现实的战略方针。如果中国不死板地同

任何一个超级大国结盟，中国就可以有最大限度的“独立”，也可以保持更多的战略选择余地。一点也不奇怪，当今强调“实事求是”被当作一种根据美苏在不同地区进行区域性争霸而相机行事的方法，而“自力更生”原则则强调必须将中苏和中美双边关系严格区分开来。当然，打“中国牌”是对中国所强调的自身独立的冒犯，因此，赵紫阳将“等距离政策”指责为一种无原则的“强权政治”的表现。周恩来个人的“现实主义”，作为一种严谨的思想体系构想，包括了实力和原则，正是这种结合构成了当代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核心。

邓小平在1982年5月6日接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塞缪尔·多伊时指出，中国既遭受过美国的敌视，也遭受过苏联的敌意，但是，孤立无援却增强了“自力更生”的重要地位。他强调，中国将继续实施对外开放政策，但在奉行对外开放的同时，中国仍将坚持“自力更生”。邓总结说：

因此，从我们的经验中我们学到的，而且也是我们愿意向我们第三世界朋友建议的基本东西就是自力更生。当然，那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争取外援，但主要的还是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力量。

这种立场不仅排除了同苏联或美国结成军事联盟的可能，同时也排除了进行任何系统的三边战略合作的可能。

1982年9月1日，邓小平在一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再次讲到“自力更生”的问题。在提到“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是“我们的基本立场”时，他警告说：

任何国家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

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

周恩来所坚持的中国永不做超级大国经过演绎,成为当今主张的中国“永远不打牌”。尽管中国人对基辛格继续抱有好感,中国人还是不得不承认“均势体系”是现代国家体系的一个必然的需要,在这种现代国家体系中,缺乏安全保障的主权国家之间为了获得稀有资源而进行着自发的竞争。周恩来相信,同美国关系“正常化”并不能排除在政治上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这在他的“求同存异”方针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中国当今的“反对霸权主义”和“团结”第三世界是用一种更为精炼的外交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但它还是在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同周一毛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概念经过历史发展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

根据“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中国外交最终形成的整体理论突出地强调过去的历史教训,主张正常的双边关系,反对霸权主义;主张自力更生和集体的自力更生,反对旧的国际经济结构;主张独立自主和多边主义,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当前的“独立自主”说法来源于周恩来统一战线立场,这种立场呼吁反对美苏为争霸全球而进行的两极斗争,发展多极化和多边主义以改变国际政治结构,而在采取这种战略的同时,又对世界各种力量的均衡进行现实主义的分析。

* 此段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作者误为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译者

作者鸣谢

如果没有1984—1985年度加拿大社会人文学研究会提供的慷慨帮助,从事本书的研究和准备是不可能的。同时,书稿的最终完成还得益于1987年度卡尔加里大学科莱姆基金会的大力协助。

作者十分感谢胡佛研究所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提供的便利,并特别向胡佛和斯坦福东亚资料室以及华盛顿国会图书馆的图书管理人员们提供的合作和大力协助表示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于1985年冬季帮助组织了一系列会见和采访中国外交界人士和周恩来的同事的活动。当然,这并非表明作者意欲将书中的见解推诿于社科院,然而,所安排的会见和采访对我了解中国对外政策的详情大有裨益。

作者还十分荣幸地得益于两位勤勉的助手——杰弗·芬恩和林森(音译)的帮助。作者文责自负,对书中的解释、研究和翻译负完全责任。当然,尽管已事隔多年,作者我仍大大受惠于并十分感激斯图尔特·施拉姆、杰克·盖逊和维克多·福尔克海姆诸教授给予我的学术上的指导。

柯 让

译 后 记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林代昭副教授在百忙中审读了全稿并撰写了中译本序言,我还得到了本书作者柯让教授的直接帮助指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为了阅读和研究的方便,原书中的注释由译者作了必要的调整和重新编排。限于篇幅,原书后的参考资料索引未译出,敬请作者和读者谅解。

囿于水平与学识,本书的翻译中难免有疏失之处,敬希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1991年6月

The Diplomacy of Zhou Enlai

St. Martin's Press

据美国圣马丁出版社1989年第1版译出

周恩来的外交

ZHOENLAI DE WAIJIAO

著者/〔加拿大〕柯 让

译者/汪永红

责编/顾玉强

封面设计/金朔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冠中印刷厂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8.5 字数/174,000

版次/1992年5月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5,3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

ISBN7-5060-0266-3/D·85 定价3.40元

ISBN 7-80649-0288-3/D·66 定价 2.40 元